

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

China Account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特邀顾问

郭道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孙 铮(上海财经大学)
陈小悦(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陈毓圭(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周守华(中国会计学会) 张晓岚(西安交通大学)
王 华(暨南大学) 王建忠(天津财经大学)

编委会

主任委员

曲晓辉(厦门大学)

副主任委员

陈信元(上海财经大学) 戴德明(中国人民大学)
罗 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陆正飞(北京大学)
夏冬林(清华大学) 刘 峰(中山大学)

杨雄胜(南京大学)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善平(湖南大学) 王永海(武汉大学) 王竹泉(中国海洋大学)
刘 星(重庆大学) 刘永泽(东北财经大学) 刘志远(南开大学)
李若山(复旦大学) 张天西(上海交通大学) 孟 焰(中央财经大学)
徐国君(中国海洋大学) 储一昀(上海财经大学) 彭韶兵(西南财经大学)

编辑部

主 编 徐国君 王竹泉

副 主 编 罗福凯 张世兴 樊培银

主 任 李 雪

通讯地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

邮政编码 266071

电子信箱 careouc@yahoo.com.cn

联系电话 0532—859018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 第2卷第1辑/徐国君,王竹泉主编.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1067-562-8

I. 中… II. ①徐… ②王… III. 会计—中国—丛刊
IV. F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2427 号

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第2卷第1辑)
主编 徐国君 王竹泉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cbse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纪丽真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目 录

并购能够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吗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跨时序经验研究 杜兴强 聂志萍(1)

关于会计学学科建设与会计教育的若干思考 姜国华(18)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及其货币信息研究
——来自于日本企业环境报告书的启示 耿建新 夏文成 尚会君(28)

作业基础成本制的实施可行性分析
——某单车零件制造商个案研究 李超雄 黄劲彦 林琦珍 王润昌(39)

论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建立 张世兴(65)

股权分置改革中财务经济学规律探讨
——基于不同对价方式市场反应的经验证据 崔学刚 刘婷(73)

股权分置改革:程序公正、参与和回报 张继袖(88)

论企业柔性财务管理 王棣华(102)

美国内部控制执行机制研究 陈志斌 何忠莲(114)

审计意见与会计稳健性
——来自管理舞弊(风险)样本的实证检验 刘兴华 杨舒先(129)

试论价值链会计师能力框架的构建 刘秀丽(141)

Contents

Could M&A Improve Chinese-listed Companies’ Financial Performance
..... DU XingQiang & NIE ZhiPing(1)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JIANG GuoHua(18)

Research on The Pattern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Its Mone-
tary Information GENG JianXin XIA WenCheng & SHANG HuiJun(28)

A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 Implementaion
..... LI ChaoXiong HUANG ShaoYan LIN QiZhen & WANG RunChang(39)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Derivation System ...
..... ZHANG ShiXing(65)

The Rule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in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 CUI XueGang & LIU Ting(73)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Procedural Justice, Participation and Returns ...
..... ZHANG JiXiu(88)

Discussion on Corporate Flexible Financial Management ... WANG LiHua(102)

Th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l Control in U. S. A
..... CHEN ZhiBin & HE ZhongLian(114)

Audit Opinion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 LIU XueHua & YANG ShuXian(129)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 Chain Accountants’ Capability LIU XiuLi(141)

并购能够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吗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跨时序经验研究^{* 1}

杜兴强^① 聂志萍^②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摘 要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 172 家在 1998 ~ 2001 年间发生重大并购交易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综合评价样本公司在发生重大并购交易前后 3 年的业绩变化。研究发现,在总样本和子样本中都存在“并购后第三年”现象,表明大多数公司在并购后第三年业绩滑坡,业绩改善难以为继。此外,按照交易相对规模细分样本的研究,发现交易的相对规模可能预示着并购活动的成败。

关键词 上市公司并购 因子分析法 “并购后第三年”现象 交易相对规模

引言

并购作为资源重新配置的重要形式,历来是公司热衷但又颇遭人质疑的领域。对于并购活动能否真正改善公司长期经营业绩,国外的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而我国在此问题上的研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所得的结论多为公司业绩短期会明显改善,但长期业绩变动的方向不明。并购活动的成败体现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而日常经营并非完全受到并购活动的影响。为此,在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并购活动对上市公司长期业绩的影响时,样本的选取要能够确保并购交易的影响力以及长期业绩变化的持续性。我国上市公司现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筛选足够的样本进行检验、分析并购公司较为长期的业绩变化已初具条件,本文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以开展。

*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101087)及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NCET-04-0596)阶段性成果。

① 杜兴强 男,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② 聂志萍 女,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文献回顾

本部分的文献回顾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并购长期绩效研究结果的汇报,第二部分则侧重于关于研究并购的长期绩效所采纳的研究方法的综评。

(一) 国内外关于并购长期绩效的文献检索^①

国外早期的研究如 Ravenscraft 和 Scherer (1987) 以及 Herman 和 Lowenstein (1988) 主要采用比较合并前后会计盈余的变化,来考察合并的长期绩效,他们的结论是合并后的业绩并未增长^②。Healy、Palepu 和 Ruback (1992) 选择了 1979 年 1 月至 1984 年 6 月之间美国发生的金额最大的 50 桩并购交易,发现行业调整后的经营性现金流报酬率呈递增趋势,由于样本公司没有削弱资本性支出或减少研发活动经费,说明并购后公司在提高资产利用效率方面卓有成效。此外,还发现并购宣告时并购公司和目标公司的综合股价报酬显著为正,与并购后的经营业绩改善显著相关,说明市场预期到并购后公司的未来业绩会有所提升。Aloke Ghosh (2001) 用经配对公司合并后经营性现金流回报率和合并前经营性现金流回报率之差来衡量业绩变化,发现合并后企业经营业绩没有改进,这与 Healy 等人 (1992) 的研究结果不同。Bruner (2003) 列表小结了 15 篇关于并购财务业绩的研究,其中 2 篇报告的并购后业绩显著为负,4 篇显著为正,其他则没有明确结论,可见在并购后长期的财务业绩变化方面尚无一致结论。

国内的文献方面,檀向球等 (1999) 研究 1998 年发生资产重组的 338 家上市公司,以 1997 ~ 1998 年公司业绩排名的转变作为业绩改善与否的衡量标准,发现 194 家业绩明显改善。冯根福、吴林江 (2001) 以 1995 ~ 1998 年发生的 201 起并购事件作为样本,发现从整体上看并购当年和并购后第一年上市公司的业绩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但在接下来的年份里,其业绩又普遍下滑。范从来、袁静 (2002)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 1995 ~ 1999 年 336 次并购事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处于成长性行业的公司进行横向并购绩效相对最好,处于成熟性行业的公司进行纵向并购绩效相对最好,处于衰退性行业的公司进行横向并购的绩效最差,说明公司所处产业的性质(成长性、成熟性、衰退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不同类型并购的绩效。李善民、李珩 (2003) 使用 2000 年发生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将样本公司重组前 1 年和并购后 2 年的绩效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用得到的综合评分指标检验并评价这些公司绩效的变化,发现除了收缩类公司的绩效在重

① 部分国外文献涉及研究方法问题,则归类于下一部分进行文献检索。

② 参考了 Healy、Palepu 和 Ruback (1992) 以及 Bruner (2003)。

组第二年发生了显著改善之外,其他类型的资产重组并没有使得上市公司绩效发生显著变化。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课题组(2003)以1998年发生并购活动的10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它们并购交易前后3年内平均业绩的变化。他们综合对比并购前后的平均业绩,得出的长期业绩改善的结论,这与诸多国内文献颇不一致,可能是研究方法和选样的差异所致。益智(2005)发现被动式并购的上市公司在资产重组后第二年,财务指标就开始恶化,第三年更是有加剧的态势。

(二) 会计研究法与财务指标的选择

在研究企业并购绩效时,学术界的主流做法是寻找业绩参照、建立基准投资报酬率来检验股票报酬是否超出基准投资报酬率,投资者的财富增长是否高于基准投资报酬率。这种做法控制了并购之外的行业甚至整个经济对股价产生影响的因素,逻辑上更为严谨,但结果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准投资报酬率的合理选择。这类检验中常用的方法包括事件研究法、会计研究法、管理者问卷法和案例研究法(Bruner,2003)。并购活动中的会计研究法是指研究并购企业财务业绩在并购活动前后的变化,或者根据行业以及样本公司规模找到未发生并购活动的配对公司,对比样本公司与配对公司的财务业绩差异。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业绩参照标准,如前所述,一般思路是寻找历史业绩和同类企业业绩指标作为参照。但是,财务指标以及非财务指标众多,如何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非易事,除了参考以往研究和惯例外,还需借用一些统计、计量上的工具来进行筛选。

国外实证研究中,常用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有很多,这在 Bruner (2003) 中已经作了颇为全面的小结:Meeks (1977), Salter 和 Weinhold (1979), Muller (1980), Ravenscraft 和 Scherer (1987), Ravenscraft 和 Scherer (1987), Herman 和 Lowenstein (1988), Dickerson、Gibson 和 Tsakalotos (1997) 使用了资产报酬率(ROA)、权益报酬率(ROE)、销售利润率(ROS)、资本回报率(ROC)等报酬率衡量指标;Mueller (1985) 采用市场份额指标;Seth (1990) 运用预期现金流和要求的投资回报率构建了一种权益价值作为衡量指标;Healy、Palepu 和 Ruback (1992、1997) 以及 Parrino 和 Harris (1999、2001) 使用了资产周转率和(行业调整后的)经营性现金流回报率等指标;Sharma 和 Ho (2002) 还使用了毛利、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

国内实证研究中,采用单一指标衡量并购业绩并不常见。舒强兴、郭海芳(2003),王延召(2003)以及王晓芳、王刚、李建(2004)均采用经济附加值(EVA)作为并购业绩评价的指标;戴榕、干春晖(2002)使用 Tobin's Q 衡量不同并购模式下企业长期并购绩效;陈建梁和袁宏泉(2005)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考察并购效率。由于单一指标难以概括国内企业复杂的业绩状况,不少学者会选择多个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直接进行分析,如益智(2005)选取

净收益、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四项指标衡量并购企业的财务绩效。檀向球等 (1999) 选取了主营业务利润率、总资产利润率、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综评指标,并从偿债能力、资产管理能力、股本扩张能力、成长性、主营业务鲜明状况五方面选择了 11 项财务比率作为重组是否具有实质性特征的鉴别指标。冯根福、吴林江 (2001) 选取了经行业调整后的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净利润/总资产、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四个指标。单个指标的逐一比较有时难以得到一致的结论,更为综合的方法是选取多项指标建立财务指标体系,经过某种计量方法或者惯有的权重分配方式加工输出单个指标值进行企业间或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范从来和袁静 (2002)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以及总资产报酬率四项指标提取公共因子,求得度量并购绩效的单一指标。李善民、李珩 (2003) 选取了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作为适用于总样本的财务指标,又另外选取了 9 类分别适用于各个子样本的财务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加以评价。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课题组 (2003) 采用了数据包络法 (DEA 法),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为输入指标,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各项费用和总资产作为输出指标,得到综合评分。当然,多种方法应当殊途同归,对同一现象的分析不能矛盾甚至相反,否则,可能存在分析方法不恰当或者分析思路偏差等问题。

二、样本的选取、财务指标的设定与研究方法

(一) 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 CSMAR 兼并收购数据库中 1998 ~ 2001 年^①间发生的重大并购事件为样本,利用 CSMAR 财务年报数据库中的财务数据计算本文所需并购前后三年以及并购当年的财务指标。

为确保并购事件的确会与企业多年的经营业绩有较大关联,我们选择的是 1998 ~ 2001 年间重大的并购重组事件,样本具体筛选过程列示如表 1。

^① CSMAR 兼并收购数据库中统计的并购事件截至 2004 年,由于本文需要计算并购事件发生前后三年的财务指标,因此,最多只能研究到 2001 年的并购事件。

表 1 样本选择过程表

1998 ~ 2001 年间的并购事件	3083
剔除：	
未披露交易金额的事件	411
合并同一公司同一年度发生的同样类型的事件	617
非单一事件或者非规模占优事件 ^①	1377
非重大事件 ^②	324
数据库内的重复数据,有误	2
缺乏并购前后共 7 年财务数据或者所计算得到的财务数据为缺省值的事件 ^③	180
样本公司数	172 ^④

一般而言,研究并购长期业绩的文献都会对样本进行筛选,有的对交易金额进行限定,有的直接选取交易规模最大的几十家公司或上百家,有的则像本文这样,选取交易规模绝对额和相对额都重大的公司作为样本。无论哪种方法,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并购交易本身对公司经营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力。从选样的过程来看,本文所选择的并购事件均为交易规模绝对重大和相对重大的事件,这有点类似于短期事件研究中要保证一个清洁的“事件期”那样,突出所研究的对象。

① 单一事件指的是同一公司在 1995 ~ 2000 年间只在某一年度发生了一种类型的事件。本文界定的规模概念是从交易金额和交易金额占公司年初资产总额比重两方面来说,规模占优事件指的是当同一公司在 1995 ~ 2000 年间在多个年度发生多种类型的事件,或者在某一年度发生多种类型的事件,或者在多个年度发生一种类型的事件时,只选择其中规模最大的事件,而且该事件相对其他事件,规模至少为两倍以上。之所以排除非单一事件和非规模占优事件,目的是为了防止所研究的公司绩效是受多个性质不同的事件交互影响,以便捕捉到单项并购事件确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并可以对样本细分后研究并购的某些特征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

② 非重大事件指的是交易总额低于 1000 万或者交易总额占年初资产总额比重小于 10% 的事件。排除非重大事件是为了确保公司绩效的变动主要是受到并购事件的影响,而非其他无关事件。检查数据发现交易总额占年初资产总额比重大于或者等于 10% 的事件基本上都是交易总额超过 1000 万的事件,仅有一个事件的交易总额低于 1000 万,故实际筛选时应用的标准是交易总额占年初资产总额比重大于或者等于 10%。

③ 缺乏足够的财务数据,原因有的在于公司本身历史不长,有的是数据库缺失,或者计算得到的财务指标因分母为零出现缺省值。

④ 由于最后留下的样本中没有金融类的企业,也就不必像其他文献那样删除金融这一特殊类型的样本。此外,初始数据一般都要考虑删除极端值的问题,但我们没有进行类似的筛选。这是因为本文的初始数据为多项财务数据,如果将各类财务数据的极端值都删除,将无法得到具有并购前后 3 年完整数据的足够样本,并不可行。而且,在总体样本中为极端值的,在细分样本中未必是极端值。

表 2 样本公司的年度分布情况

年度	1998	1999	2000	2001	合计
样本公司数	3	22	60	87	172

从样本公司年度分布来看,随着年份的推移,样本公司数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1998 年仅有 3 家公司在前后数年间发生重大的并购事件(即交易规模绝对额和相对额都重大),而到了 2001 年,样本公司数已达到 87 家。这当然和上市公司数量增加有关,同时也反映出并购市场的扩张。

(二) 财务指标的设定

冯根福、王会芳(2001)对上市公司业绩进行多角度综合评价,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同一上市公司绩效评价结果并不相同,所关注的绩效评价指标也不一样。本文拟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角度出发,选取他们最为关注的若干财务指标,以分析发生并购交易的上市公司业绩是否改善,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否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综合以往研究,我们从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成长能力和主业利润贡献能力五个方面选取指标。具体选取的指标和计算公式见表 3。

表 3 财务指标评价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指标选取原因
盈利能力	营业毛利率	主营业务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反映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
	总资产利润率	净利润/[(资产期末余额 + 资产期初余额) /2]	反映资产的总体获利能力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股东权益期末余额 + 股东权益期初余额) /2]	管理层监管和企业融资时关注的盈利指标
	每股收益	净利润/期末总股数	反映投资者获利能力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总资产	反映一般的长期偿债能力
	流动比率	期末流动资产/期末流动负债	反映一般的短期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期末余额 + 资产期初余额) /2]	反映资产总体的管理效率
	存货周转率	主营业务成本/[(存货期末余额 + 存货期初余额) /2]	反映重点资产的运用水平
	应收账款周转率	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 应收账款期初余额) /2]	反映重点资产的运用水平

(续表)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计算公式	指标选取原因
成长能力	净资产增长率	$(\text{期末股东权益} - \text{期初股东权益}) / \text{期初股东权益}$	反映企业股本的扩张水平
	净利润增长率	$(\text{本年净利润} - \text{上年净利润}) / \text{上年净利润}$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发展水平
主业突出状况	综合杠杆	主营业务利润 / 利润总额	反映主营业务对企业总体利润的贡献程度

为计算出准确、可比的财务指标,本文在选取数据时作了以下调整:

(1) 考虑到宏观因素和行业特征的影响,本文在计算财务指标时都在公司财务指标的基础上剔除了行业财务指标的平均数。^①

(2) 1998 年财务制度发生变化,1998 年前主营业务利润等于“主营业务收入”减“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汇兑损失”、“进货费用”之差额,1998 年起变为“主营业务收入”减“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之差额。我们调整了 1998 年以前主营业务利润的数字,使得 1998 年前后期间的主营业务利润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3) 涉及存货项目时,本文选取的是存货总额数据。但 1994 年、1995 年部分企业只披露存货净额,且存货净额数据为零。经检查,这些企业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项目均为 0,故将这些样本的存货总额数据调整为存货净额。

(三) 研究方法

在我国,使用单一指标来研究并购活动是否改善业绩的文献较少,更多的是选取若干财务指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以期能全面地进行业绩评价。构建指标体系的研究步骤和方法如下:

(1) 选取公司并购前后三年年度财务报表中的若干财务数据,根据表 3 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计算财务比率,得到初始的财务指标体系。

(2) 为考虑宏观因素和行业特征的影响(industry effect),将所构建的财务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分别减去该公司所处行业当年该指标的平均数,从而得到经行业调整后新的财务指标体系。

(3) 将新指标按照并购前后 7 年分别作因子分析,构造一个综合得分模型,计算出各公司并购前后不同年度的业绩综合得分。

^① 行业财务指标的平均数是根据数据库中所有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计算出的财务指标求平均值得到的,如果某些公司计算出的财务指标为缺省值,则在求行业均值时剔除。

(4) 检验并购公司各年度综合得分是否存在差异,评价并购活动对公司财务业绩的影响。

由于财务指标体系包含诸多指标,如果进行单一比较显然无法得到一致的结论,因而需要从财务指标体系推导出一个综合得分模型,将多个指标值浓缩成一个综合得分,以便进行样本间的比较。构建综合得分模型的关键在于为各项财务指标或者经转换后的财务指标赋予合理的权重。经验做法是按照以往惯例直接给各项指标赋予权重,加总计算求得综合得分,而利用统计方法进行指标的变换、压缩则会更为科学,因子分析法则是目前较为理想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因子分析法的主要步骤实施如下:

(1) 建立财务指标体系的矩阵

将经过行业调整后的财务指标原始变量 $X_1, X_2, \dots, X_n$ 表示成向量的形式,那么整个财务指标体系则可以表示成矩阵 X ,即

$$X = (X_1, X_2, \dots, X_n)$$

(2) 消除量纲,得到标准化后的矩阵 X^*

$$X^* = (X_1^*, X_2^*, \dots, X_n^*), X_i^* = \frac{X_i - E(X_i)}{\sqrt{\text{VAR}(X_i)}} \quad (i = 1, 2, \dots, n)$$

标准化的处理可以使主成分分析能够均等地对待每一个原始的财务指标,防止因量纲的差异带来不合理的影响。

(3)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

①首先,计算矩阵 X^* 的特征值 $\lambda_1, \lambda_2, \dots, \lambda_n$ ($\lambda_1 \geq \lambda_2 \geq \dots \geq \lambda_n$),以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e_1, e_2, \dots, e_n$,得矩阵 X^* 的第 i 个主成分 Y_i 。

$$Y_i = e_i X^* \quad (i = 1, 2, \dots, n)$$

相应的 λ_i 即为 Y_i 的方差。

②然后,计算第 i 个主成分 Y_i 的方差占总方差的比重 W_i ,它代表了第 i 个主成分 Y_i 对原始数据的综合能力,也被称为主成分 Y_i 的贡献率。

$$W_i = \frac{\lambda_i}{\lambda_1 + \lambda_2 + \dots + \lambda_n} \quad (i = 1, 2, \dots, n)$$

③再次,确定公共因子的提取数目。一般的原则是,提取 m 个公共因子 $Y_1, Y_2, \dots, Y_m$,使得这 m 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即 $W_1 + W_2 + \dots + W_m$) 在 80% ~ 90% 之间。

④最后,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使得每个因子都具有高载荷,简化对因子的解释。根据旋转后得到的相应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C 。

$$C = A^T \times R^{-1}$$

其中, A 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R^{-1} 为原始变量 $X_1, X_2, \dots, X_n$ 的相关系数矩阵的逆矩阵。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和原始变量的观测值,可以计算出各个观测量

的因子得分。

$$Y = C \times X = A^T \times R^{-1} \times X = (Y_1, Y_2, \dots, Y_m)$$

(4) 计算综合得分

根据各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得出 7 个综合得分函数,计算各样本公司并购前后 3 年以及并购当年的业绩综合得分 S_t 。

$$S_t = \sum_{j=1}^m W_j Y_{jt} \quad (t \text{ 为并购前后的年份}, t = -3, -2, -1, 0, 1, 2, 3)$$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 综合得分函数的建立

本文以累计贡献率大于 80% 为提取公共因子的标准,从并购前第 3 年、前第 2 年、后第 2 年的原始财务比率中提取了 6 个因子,从其他年份的数据中提取了 7 个因子,构建并购公司业绩的综合得分函数如下:

$$\begin{aligned} \text{并购前第三年 } S_{-3} = & 0.32565 Y_1 + 0.14737 Y_2 + 0.10675 Y_3 + 0.08737 Y_4 \\ & + 0.08347 Y_5 + 0.07970 Y_6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并购前第二年 } S_{-2} = & 0.37057 Y_1 + 0.13782 Y_2 + 0.10732 Y_3 + 0.10040 Y_4 \\ & + 0.07803 Y_5 + 0.05862 Y_6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并购前第一年 } S_{-1} = & 0.28304 Y_1 + 0.11505 Y_2 + 0.10822 Y_3 + 0.08878 Y_4 \\ & + 0.08353 Y_5 + 0.08280 Y_6 + 0.06736 Y_7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并购当年: } S_0 = & 0.23890 Y_1 + 0.15289 Y_2 + 0.11945 Y_3 + 0.09447 Y_4 \\ & + 0.08113 Y_5 + 0.07797 Y_6 + 0.06772 Y_7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并购后第一年 } S_1 = & 0.23347 Y_1 + 0.13705 Y_2 + 0.10344 Y_3 + 0.09367 Y_4 \\ & + 0.08411 Y_5 + 0.08132 Y_6 + 0.07553 Y_7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并购后第二年 } S_2 = & 0.30240 Y_1 + 0.15577 Y_2 + 0.11418 Y_3 + 0.09968 Y_4 \\ & + 0.07432 Y_5 + 0.06521 Y_6 \end{aligned}$$

$$\begin{aligned} \text{并购后第三年 } S_3 = & 0.23211 Y_1 + 0.12645 Y_2 + 0.10358 Y_3 + 0.09961 Y_4 \\ & + 0.08802 Y_5 + 0.08540 Y_6 + 0.07688 Y_7 \end{aligned}$$

(二) 总样本的检验结果

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年度间的综合得分差值的均值极小,几乎都为 0,而中位数也较小,与零十分接近,且大部分为负值。正值百分比指标基本上都在 40% ~ 55% 之间变动,正值比重略少。为确定总体的分布是否为正态分布,我

们利用 SAS 软件的单变量进行了正态性检验,表 4 中所报告的 P 值^①均表明总体的分布并非正态,故下文的检验中没有报出参数 t 检验的结果^②。

表 4 总样本各年间业绩变化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综合得分差值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方差	正态检验的 P 值	样本数	正值百分比
$S_{-2} - S_{-3}$	- 5.46236E - 17	0.3650	- 0.0158	0.1332	0.0100	172	45.35%
$S_{-1} - S_{-3}$	- 5.80931E - 17	0.4171	0.0041	0.1740	0.0100	172	50.58%
$S_0 - S_{-3}$	- 4.51835E - 17	0.4987	- 0.0375	0.2487	0.0100	172	45.35%
$S_1 - S_{-3}$	- 3.48558E - 17	0.5013	- 0.0548	0.2513	0.0100	172	43.02%
$S_2 - S_{-3}$	1.80734E - 17	0.5237	- 0.0284	0.2742	0.0100	172	46.51%
$S_3 - S_{-3}$	- 2.13008E - 17	0.5096	- 0.0293	0.2597	0.0100	172	48.26%
$S_{-1} - S_{-2}$	1.03277E - 17	0.3352	- 0.0198	0.1124	0.0100	172	47.09%
$S_0 - S_{-2}$	4.26016E - 17	0.5177	- 0.0579	0.2680	0.0100	172	44.19%
$S_1 - S_{-2}$	0	0.5371	- 0.0317	0.2884	0.0100	172	43.60%
$S_2 - S_{-2}$	1.06504E - 16	0.5679	- 0.0476	0.3225	0.0100	172	44.77%
$S_3 - S_{-2}$	4.4538E - 17	0.5251	- 0.0308	0.2758	0.0100	172	44.77%
$S_0 - S_{-1}$	- 8.71396E - 18	0.4082	0.0253	0.1666	0.0100	172	53.49%
$S_1 - S_{-1}$	- 3.22739E - 17	0.4940	- 0.0213	0.2441	0.0100	172	48.84%
$S_2 - S_{-1}$	3.45331E - 17	0.5173	- 0.0318	0.2676	0.0100	172	47.09%
$S_3 - S_{-1}$	3.51786E - 17	0.4919	- 0.0205	0.2420	0.0100	172	45.35%
$S_1 - S_0$	- 1.65404E - 18	0.3790	- 0.0123	0.1437	0.0100	172	47.67%
$S_2 - S_0$	6.51933E - 17	0.4597	0.0037	0.2113	0.0100	172	50.00%
$S_3 - S_0$	1.93644E - 17	0.4744	0.0346	0.2251	0.0100	172	52.91%
$S_2 - S_1$	6.58388E - 17	0.4002	0.0031	0.1602	0.0100	172	50.58%
$S_3 - S_1$	2.54964E - 17	0.4696	- 0.0076	0.2205	0.0100	172	47.67%
$S_3 - S_2$	- 3.92128E - 17	0.5209	- 0.0511	0.2713	0.0100	172	40.70%

从表 5 明显看出,对于绝大多数年度间的综合得分差值而言,符号检验的统计量和符号秩检验的统计量都不具有显著性。仅仅并购后第三年和并购后第二年之间的综合得分差值在检验时,符号检验和符号秩检验的统计量才一

① 文中报告的 P 值为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其他检验方式的 P 值更低,更明显表明总体的分布并非正态。

② t 检验的结果和非参数检验的结果类似,但参考意义不大,故未在文中进行报告。

致,表明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且为负值,说明并购活动总体上并未改变公司的业绩,甚至在并购后第三年出现业绩下滑的公司较多。

表 5 总样本综合得分差值均值为 0 的检验结果

综合得分差值	符号检验统计量	P 值 (双尾)	符号秩检验统计量	P 值 (双尾)
$S_{-2} - S_{-3}$	- 8	0.2527	- 130	0.8431
$S_{-1} - S_{-3}$	1	0.9393	- 477	0.4674
$S_0 - S_{-3}$	- 8	0.2527	- 757	0.2482
$S_1 - S_{-3}$	- 12 ^c	0.0792	- 936	0.1530
$S_2 - S_{-3}$	- 6	0.4017	- 291	0.6577
$S_3 - S_{-3}$	- 3	0.7031	- 351	0.5930
$S_{-1} - S_{-2}$	- 5	0.4927	- 606	0.3557
$S_0 - S_{-2}$	- 10	0.1472	- 807	0.2182
$S_1 - S_{-2}$	- 110.1091	- 810	0.2165	
$S_2 - S_{-2}$	- 9	0.1947	- 457	0.4863
$S_3 - S_{-2}$	- 9	0.1947	- 741	0.2584
$S_0 - S_{-1}$	6	0.4017	- 8	0.9903
$S_1 - S_{-1}$	- 2	0.8191	- 373	0.5700
$S_2 - S_{-1}$	- 5	0.4927	- 114	0.8622
$S_3 - S_{-1}$	- 8	0.2527	- 341	0.6035
$S_1 - S_0$	- 4	0.5936	- 587	0.3710
$S_2 - S_0$	0	1.0000	243	0.7114
$S_3 - S_0$	5	0.4927	73	0.9115
$S_2 - S_1$	1	0.9393	669	0.3077
$S_3 - S_1$	- 4	0.5936	- 405	0.5373
$S_3 - S_2$	- 16 ^b	0.0178	- 1288 ^b	0.0486

注 b,c 分别表示在 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将并购后 3 年的综合得分均值与并购前 3 年的综合得分均值回归^①,也可得到类似的结论。

$$S_{\text{post},i} = 2.16222E - 17 + 0.06259S_{\text{pre},i} \quad (1)$$

(0.00) (1.21)

$$R^2 = 0.0086 \quad N = 172 \quad DW = 1.664$$

(1) 式中的 $S_{\text{post},i}$ 指的是并购后 3 年各公司的综合得分均值, $S_{\text{pre},i}$ 指的是并购前 3 年的综合得分均值,回归的结果截距项和系数很小,且均不显著,表明并购前后的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购活动并没有带来上市公司整体的业绩改善。

(三) 不同并购类型的子样本检验结果

图 1 描绘的是按照并购类型划分的子样本公司年度业绩均值变化情况。从图上来看,资产收购类的样本公司变化最为剧烈,其业绩综合得分从 0 处上升至 0.2 以上,但最终又回落到 0 点以下。置换类的样本公司变化较为平缓,从并购后第二年开始稳步上升。从表 6 的统计检验结果也可以看出,有关并购后各年度与并购前一年和并购当年的综合得分差值,其符号秩检验的统计量较为显著,但对应的符号检验则不明显。不过,由于这两类样本公司的数目不到 30 个,对其进行的统计研究仅能略作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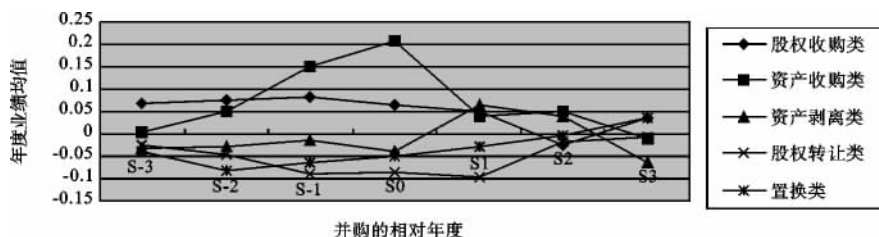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并购类型的样本公司年度业绩均值图

股权收购类和股权转让类的样本公司变化较为平缓,而且在 $[0, 0.1]$ 和 $[0, -0.1]$ 有些对称变化的趋势,均在并购后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发生显著波动。从表 6 的统计检验结果来看,股权收购类的样本公司在并购后第三年和并购前第二年间的综合得分差值,其符号秩检验统计量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股权转让类的样本公司在并购后第一年和并购前第一年间的综合得分差值,其符号检验统计量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① Healy, Palepu 和 Ruback (1992) 的文章中采用的是对并购前后 5 年经行业调整的经营性现金流的中位数进行回归,发现回归的系数显著为正。本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发现了显著为正的系数。之后,我们又将并购后三年的综合得分与并购前三年的综合得分均值或者中位数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总体而言,并购前后的业绩没有显著关联。

资产剥离类的样本公司在交易发生的以前年度综合得分差值变化最为平稳,但并购后则呈现大起大落的态势,从表 6 来看,两种检验方法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果,即并购后第三年与并购后第二年的统计量分别在 1%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

表 6 不同并购类型的样本公司综合得分差值均值为 0 的检验结果^①

综合 得分 差值	股权收购类 (样 本数 = 48)		资产收购类 (样 本数 = 17)		资产剥离类 (样 本数 = 41)		股权转让类 (样 本数 = 49)		置换类 (样本数 = 16)	
	符 号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秩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秩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秩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秩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检 验 统 计 量	符 号 秩 检 验 统 计 量
$S_{-2} - S_{-3}$	- 3	- 9	1.5	16.5	- 1.5	- 16.5	- 3.5	- 57.5	- 2	- 16
$S_{-1} - S_{-3}$	3	4	2.5	26.5	- 2.5	- 78.5	- 0.5	- 87.5	- 1	- 7
$S_0 - S_{-3}$	- 2	- 36	0.5	12.5	- 3.5	- 52.5	- 3.5	- 129.5	0	- 9
$S_1 - S_{-3}$	0	- 53	- 1.5	- 4.5	- 3.5	- 22.5	- 6.5 ^c	- 156.5	0	- 2
$S_2 - S_{-3}$	- 1	- 47	0.5	1.5	0.5	9.5	- 4.5	- 52.5	- 1	- 3
$S_3 - S_{-3}$	- 2	- 66	- 0.5	- 4.5	- 1.5	- 45.5	- 2.5	- 30.5	3	16
$S_{-1} - S_{-2}$	- 1	- 19	1.5	21.5	- 1.5	- 39.5	- 3.5	- 107.5	0	- 5
$S_0 - S_{-2}$	- 2	- 55	- 0.5	0.5	- 1.5	- 30.5	- 4.5	- 138.5	- 1	- 3
$S_1 - S_{-2}$	- 1	- 79	- 2.5	- 22.5	- 1.5	30.5	- 5.5	- 120.5	0	3
$S_2 - S_{-2}$	- 4	- 92	- 1.5	- 17.5	1.5	42.5	- 4.5	- 41.5	0	11
$S_3 - S_{-2}$	- 5	- 161 ^c	- 2.5	- 25.5	- 0.5	- 34.5	- 3.5	- 37.5	2	18
$S_0 - S_{-1}$	2	- 5	0.5	6.5	2.5	2.5	- 0.5	- 19.5	1	- 5
$S_1 - S_{-1}$	0	- 71	- 2.5	- 37.5 ^c	2.5	60.5	- 3.5	- 23.5	24	
$S_2 - S_{-1}$	- 5	- 95	- 2.5	- 41.5 ^c	2.5	87.5	- 1.5	39.5	1	4
$S_3 - S_{-1}$	- 4	- 121	- 4.5 ^b	- 55.5 ^a	1.5	12.5	- 2.5	69.5	1	19
$S_1 - S_0$	- 4	- 160	- 3.5	- 49.5 ^b	1.5	88.5	1.5	- 54.5	1	9
$S_2 - S_0$	- 4	- 91	- 3.5	- 44.5 ^b	0.5	85.5	4.5	110.5	3	20
$S_3 - S_0$	0	- 99	- 2.5	- 38.5 ^c	0.5	21.5	3.5	117.5	3	27
$S_2 - S_1$	- 2	- 29	- 0.5	- 3.5	- 1.5	- 27.5	5.5	210.5	- 1	1
$S_3 - S_1$	- 3	- 85	1.5	- 3.5	- 4.5	- 116	0.5	74.5	1	11
$S_3 - S_2$	- 6	- 111	- 0.5	- 16.5	- 9.5 ^a	- 183 ^b	- 2.5	- 79.5	2	21

注 a,b,c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① 此处的样本数为 171 家,比总体样本 172 家少 1 家,原因在于存在一种债务重组的并购类型,且样本数只有 1 家,所以无法对这类并购活动进行检验统计。

(四) 不同规模子样本的检验结果

图 2 描述的是按照交易规模分类的样本公司年度业绩均值趋势图,对比十分醒目。交易相对规模 $\leq 50\%$ 的样本公司比交易相对规模 $> 50\%$ 的样本公司业绩波动幅度要小许多,而且前者在并购事件前后呈先升后降的形态,后者则为先降后升。从表 7 的统计检验结果来看,交易相对规模 $\leq 50\%$ 的样本公司在并购前后业绩的变化大都显著,说明并购后业绩下滑的趋势明显。交易相对规模 $> 50\%$ 的样本公司在并购前后业绩的变化也有许多显著的统计量,说明并购后业绩上升的趋势明显,不过,并购后第三年和并购后第一年、第二年间的业绩下滑态势在两种检验方法下也都具有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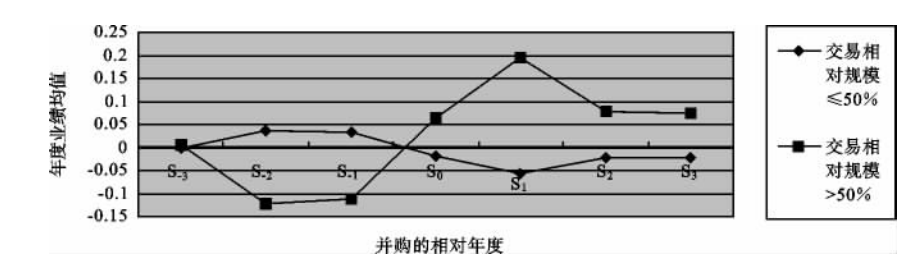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交易相对规模的样本公司年度业绩均值图

表 7 不同交易相对规模的样本公司综合得分差值均值为 0 的检验结果

综合得分差值	交易相对规模 $\leq 50\%$ (样本数 = 133)		交易相对规模 $> 50\%$ (样本数 = 39)	
	符号检验统计量	符号秩检验统计量	符号检验统计量	符号秩检验统计量
$S_{-2} - S_{-3}$	- 1.5	380.5	- 6.5 ^c	- 127 ^c
$S_{-1} - S_{-3}$	1.5	- 85.5	- 0.5	- 87
$S_0 - S_{-3}$	- 11.5 ^c	- 893.5 ^b	3.5	69
$S_1 - S_{-3}$	- 18.5 ^a	- 1359.5 ^a	6.5 ^c	164 ^b
$S_2 - S_{-3}$	- 13.5 ^b	- 889.5 ^b	7.5 ^b	150 ^b
$S_3 - S_{-3}$	- 7.5	- 557.5	4.5	60
$S_{-1} - S_{-2}$	- 5.5	- 455.5	0.5	- 4
$S_0 - S_{-2}$	- 14.5 ^b	- 1184.5 ^a	4.5	148 ^b
$S_1 - S_{-2}$	- 20.5 ^a	- 1599.5 ^a	9.5 ^a	234 ^a
$S_2 - S_{-2}$	- 18.5 ^a	- 1304.5 ^a	9.5 ^a	211 ^a
$S_3 - S_{-2}$	- 14.5 ^b	- 1190.5 ^a	5.5	141 ^b
$S_0 - S_{-1}$	- 2.5	- 643.5	8.5 ^a	171 ^b
$S_1 - S_{-1}$	- 11.5 ^c	- 1190.5 ^a	9.5 ^a	230 ^a

(续表)

综合得分差值	交易相对规模 $\leq 50\%$ (样本数 = 133)		交易相对规模 $> 50\%$ (样本数 = 39)	
	符号检验统计量	符号秩检验统计量	符号检验统计量	符号秩检验统计量
$S_2 - S_{-1}$	- 12.5 ^b	- 909.5 ^b	7.5 ^b	195 ^a
$S_3 - S_{-1}$	- 10.5 ^c	- 749.5 ^c	2.5	120 ^c
$S_1 - S_0$	- 9.5	- 858.5 ^c	5.5	117
$S_2 - S_0$	- 0.5	15.5	0.5	56
$S_3 - S_0$	2.5	143.5	2.5	- 33
$S_2 - S_1$	4.5	760.5 ^c	- 3.5	- 66
$S_3 - S_1$	- 0.5	228.5	- 3.5	- 155 ^b
$S_3 - S_2$	- 7.5	- 317.5	- 8.5 ^a	- 198 ^a

注 a,b,c 分别表示在 1% ,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四、小结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综合上述总样本和三类子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1. 就总样本而言,在绝大多数年度间的综合得分差值的统计量不具有显著性,业绩变化不显著,说明并购活动总体上没有对公司业绩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并购后第三年和并购后第二年之间的综合得分差值检验显著,表明大多数样本公司在并购后第三年出现业绩下滑的现象。这种“并购后第三年”现象说明并购活动整体而言并未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即使改善,也不具有持续性。

2.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交易相对规模会显著影响并购事件的成败。交易相对规模大于 50% 的公司不仅业绩波动剧烈,而且改善明显;交易相对规模小于或等于 50% 的公司不仅业绩波动较小,而且下滑明显。之所以出现如此鲜明的对比,可能在于交易相对规模大的公司往往在并购交易发生前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不通过这种“阵痛”的方式,公司根本难以为继。并购后的业绩改善可能是由于地方的扶持而有新资金注入,也可能是买壳上市引起控股股东发生变换等原因。不过,这类样本明显具有“并购后第三年”现象,说明改善乏力,短期或者再融资的投机行为严重制约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 在按照并购类型划分的子样本中,只有资产剥离类的样本公司得到较为确定的检验结果,即具有“并购后第三年”现象。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在于大多资产剥离活动为关联交易,公司的经营基础在并购后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无法支撑长久的业绩改善。

重大的并购交易实际上是一种“休克疗法”,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阵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并购后的业绩。我国上市公司出现明显的

“并购后第三年”现象,表明业绩缺乏持续的改善,第三年可能是并购活动影响力维系的一个槛,这有可能和某些制度安排有关,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对此问题进行发掘。

参考文献

- [1] 陈建梁、袁宏泉. 上市公司并购扩张是否产生效率 [J]. 南方金融, 2005, (3).
- [2] 戴榕、干春晖. Tobin 'Q 不同模式下企业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 [J]. 上海管理科学, 2002, (5).
- [3] 范从来、袁静. 成长性、成熟性和衰退性产业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 (8).
- [4] 冯根福、吴林江.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1, (1).
- [5] 李善民、李珩. 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3, (11).
- [6] 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课题组.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J]. 上证研究, 2003, (1).
- [7] 舒强兴、郭海芳. 中国上市公司并购价值创造的实证研究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3, (9).
- [8] 檀向球、提云涛、强立. 上市公司报表性和实质性资产重组鉴别与分析 [N]. 证券市场导报, 1999, (6).
- [9] 王廷召.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D]. 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03.
- [10] 王晓芳、王刚、李建.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 [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3).
- [11] 益智. 中国上市公司被动式资产重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5, (1).
- [12] Alope, G. Does Operating Performance Really Improve Following Corporate Acquisitions?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01, (7).
- [13] Bruner R. Chapter3 : Does M&A Pay? version 2.6 final june30, 2003, (one chapter of Appli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06750.
- [14] Dickerson, A., H. Gibson and E. Tsakalotos. The Impact of Acquisitions on Company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Large Panel of U. K. Firms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July 1997.
- [15] Healy, P., K. Palepu and R. Ruback. Does Corporate Performance Improve After Merger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April 1992.
- [16] Healy, P., K. Palepu and R. Ruback. Which Takeovers are Profitable: Strategic or Financial? [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Summer 1997.
- [17] Herman, E. and L. Lowenstein. The Efficiency Effect of Hostile Takeovers, In J. C. Coffee, Jr., L. Lowenstein, and S. Rose-Ackerman, eds., Knights, Raiders, and Targets [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8] Meeks, G. Disappointing Marriage: A Study of the Gains From Merger [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9] Mueller, D.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Merger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M]. Cam-

- bridge :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0.
- [20] Mueller, D. Mergers and Market Share [M],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May 1985.
- [21] Parrino, and R. S. Harris. Takeovers, Management Replacement, and Post-Acquisition Operating Performance : Some Evidence from the 1980 s [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Winter 1999.
- [22] Parrino, J. D. and R. S. Harris. Business Linkages and Post-merger Operating Performance [R]. Working Paper, Charlottesville VA : Darden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2001.
- [23] Ravenscraft and Scherer. Life After Takeovers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December 1987.
- [24] Ravenscraft and Scherer. Mergers, Sell-Offs, & Economic Efficiency [M].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1987.
- [25] Salter, M. S. and Weinhold W. A.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Acquisition [Z]. New York : Free Press, 1979.
- [26] Sharma, D. and J. Ho. The Impact of Acquisitions on Operating Performance : Some Australian Evide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March 2002.
- [27] Seth, A. Sources of Value Creation in Acquisitions :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6.

Could M&A Improve Chinese-listed Companies '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Time-series Empirical Research Using Factor Analysis

DU XingQiang & NIE ZhiPing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We choose 172 large M&A conducted by Chinese - listed companies between 1998 ~ 2001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se companies ' performance changes between 3 years prior to and 3 years subsequent to large M&A with factor analys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s discovered both in the whole sample and in the sub - samples. This phenomenon may be called "declining performance in the 3rd year after M&A", which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most sample firms '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an't last more than 3 years. Besides, after examining the sub - samples divided by the relative scale of transactions, we conclude that the relative scale may strongly associate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sample firms m&a.

Key words listed Companies m&a factor analysis a phenomenon called "declining performance in the 3rd year after m&a" relative scale of transactions

关于会计学学科建设与会计教育的若干思考^{* 1}

姜国华^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

摘 要 本文首先讨论了结合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发展会计学科的问题,然后讨论了关于会计学学科建设和会计行业自律建设的一些观点。会计行业的发展依赖于行业自我升华、自我约束和不断创新。

关键词 会计学 学科建设 行业发展

引言

15 年前,当我这个年纪的人进入大学的时候,社会对会计和会计学的认识和今天有巨大的差别。当时,会计人员在人们头脑中的形象是一群戴副大眼镜、用个铁算盘,在单位的某个角落里日复一日地面对着一批又一批单据的枯燥的人群。会计学则是研究会计工作怎样配合国民经济计划需要的学问。

今天,会计和会计学的地位在社会中有了巨大的提高。会计在企业单位中的地位变得很重要,总会计师、首席财务官等高级管理职位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中设立起来。会计学科系在高等院校中也逐渐普遍起来,在科系之间的地位正逐步提高,并成为商学院和管理学院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央政府在财政部下面建立了三个高标准的国家会计学院,作为培养会计人才的基地,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会计工作的重视。

本文的目的是表达一些我对新形势下我国会计学学科建设与会计学教育的思考。我认为,我国会计行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在面临着机遇的同时,也面对着挑战。市场化、国际化情况下的会计行业和计划经济下相比将有着巨大的差别,而我们现在对行业发展的思考和观念将影响整个行业、

* 本文是作者的一些粗浅想法,写出来与会计界前辈及同仁商榷,欢迎批评和指正。感谢陈冬华、崔学刚、方红星、何玉润、鲁桂华、陆正飞、田志心、王立彦、岳衡、曾铁兵、朱红军,尤其是财政部王军副部长和北京突破电器有限公司由磊总经理等对本文写作的贡献,同时感谢财政部“全国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培养项目”的大力支持。

① 姜国华 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整个学科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一、会计学的核心内涵与信息经济学、管理学的关系及其影响

会计工作本身是一个流程:从开始的原始信息采集,到分析、衡量、分摊、记录,再到汇总,集合并产生报表。实际上,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会计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当作流程来看待,会计教育者们也据此理念进行会计学教育。

但是,如果我们把会计工作当作流程来看待,我们就还停留在“数豆子”(bean counting)的状态。“数豆子”会计可以满足简单、原始的经济组织和管理活动的需要,却远远满足不了现代的、复杂的经济组织和管理活动的需要。现代的管理活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确定性,如生产过程、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决策者对信息的需求大大增加了,会计信息成为满足他们信息需求的最重要渠道。同时,不确定性下的会计信息不仅要衡量过去,而且要能够帮助信息使用者预测未来。所以,会计工作已经不再仅是一个流程的概念,而且是经济和管理工作的决策基础。它不再仅是向后看的,而且还是向前看的。

因此,我们会计学科应该更广泛地借鉴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核心内容,丰富会计学的内涵,拓展会计学的外延。

结合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来看待会计学对我们的科研、教学以及学科建设的其他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会计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历史,而是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发挥更大的预测未来的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会计是在不确定环境下为经济决策者提供信息的工具,会计工作就不可避免地蕴涵了更多管理的因素。我们的会计人员不能仅仅把自己定义为信息采集员和整理员,而应该把自己作为管理人员。高级财会人员应该是企业管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充分发挥出价值,才能够充分为企业管理层所重视,而会计行业才能够在经济中享受应有的地位。

第二,在以预测未来,支持管理为目标的会计环境下,会计报告的质量也有很大的不同。会计信息不仅要具有可靠性,还要具有决策相关性。如果会计报告不能够帮助决策者判断未来、正确决策的话,即使它很可靠,也不见得是一份高质量的会计报告。

第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指导原则也和以前有区别。会计报告应该是帮助外部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的工具,因此,我们在制订会计准则时就要判断当准则要求企业计量、报告一条新的信息时,它会如何影响到信息使用者的行为。

第四,审计工作的目的也就不仅仅是检验会计报告是否遵循了会计准则的规定,而是检验企业是否全面、完整地反应了和其相关的、影响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的重要信息。

第五,结合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会计教学将对我们提出很大的挑战性。会计教师的视野不能再仅仅局限于借贷、计算等会计流程概念,而是要把会计学教育纳入更广的企业管理中去。我们的会计从业人员要掌握充足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从而不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了解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对会计教学来说,在任何一门课中,我们都应该假设自己是,或主要是,会计信息的某一类使用者,并把对会计学的讲授和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过程、决策难点等方面结合起来。如果一个会计学教师只是在试图教会学生怎样计账,那么这种教学就是失败的教学。大部分会计课本的内容都是不需要讲授,学生自学就可以掌握的。教师的作用是比较学生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指导学生为什么学会计知识,怎样使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如何在会计教育中充分地体现管理因素、决策因素,应该是我们整个行业思考培养未来高素质会计人才的重要题目。

第六,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视野为会计学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当会计信息成为经济与管理决策的主要信息来源后,会计学学者凭借着对会计信息理解上的优势,可以在学术研究上作出重要的贡献。姜国华(2005)分析了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投资的关系,并指出了在我国开展基于财务报表的证券投资策略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的研究即是信息经济学视角为会计学研究开辟的新的研究领域之一。

以上六个方面只是从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角度看待会计学科而带给我们的新的理念的一部分,但却是最主要的部分。我认为在这六个方面确立起新的观念,将对我国会计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会计学学科建设,会计学研究和实践在过去 15 年中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成绩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我们的学科正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上,并会在未来继续取得重要的发展。

第一,我们有一个成熟的、有良好组织能力的、有共同目标和标准的会计学术“圈”。这在新兴的各个管理学科中几乎是唯一的。当其他管理学科还在筹建类似的学术“圈”时,我们的“圈”已经在有效地发挥着功能了。

第二,会计业界也具有以中国会计学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代表的良好的行业组织。这些行业组织能够有效地定义行业的标准,约束违背行业利益的个体行为,并制定、执行行业长远的发展目标。

第三,会计行业有我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和强有力的支持。三大国家会计学院的建立体现了政府对会计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同时,会计学科在未来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我国经济发展给会计行业创造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二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进入了健康、高速的发展轨道。从纵向上来看,我国经济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将继续大幅膨胀;从横向来看,我国经济正在迅速和国际经济接轨,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并将最终完全融入国际经济中去。开放的经济环境和较高的发展速度增加了

我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正逐步被我国企业应用起来。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成为企业管理和企业成败的决定因素。

会计信息无疑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的工具之一。而我们会计学术界和会计业界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我们的作用将随着会计信息作用的增大而提高。可以说,“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刘玉廷,2006)。

之所以说会计学科正处于为经济发展做出千载难逢的重大贡献的时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国其他管理学科发展的相对滞后。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科,如金融、市场营销、组织行为或战略。这些学科基本上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商学院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和这些管理学科想对应的企业职能部门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会计部门的发展。因此,会计行业就有可能、有潜力、有机会发挥比在其他国家更大的作用。我们会计行业有机会、有能力拓展会计学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会计工作的市场。比如说,我国的会计学术界所涉猎的研究领域要大于美国会计学术界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在很多方面进入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领域。而在工业界中,会计人才往往更容易成为金融行业或管理行业的中坚力量。

会计学科对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来源是通过会计信息加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这种功能的边际贡献最大的时候就是经济中资源配置最缺乏效率的时候。我国的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恰恰还很低。在这种时候,会计信息的贡献才最大。

综合来讲,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我们应该结合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来看待会计学,并论述这个观念对我们如何看待会计学科的影响。在这样的视角下,我认为会计学科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上。我们这个行业有责任抓住这个机遇,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会计学教育问题,第三部分讨论会计行业的自我保护与发展问题,第四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会计学教育

我国的会计学教育体系经过几代会计学者几十年的辛勤努力,已经具有最先进的学科体系,为我国的会计、财务、金融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本部分的目的是提出一些我的建议,为进一步讨论如何发展会计学科作引子。在会计行业面临着巨大发展机会的今天,在会计职能发生着根本性改变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展开建设性的讨论,以使我们的会计学教育为未来会计行业的健康、高速发展做好准备、培育人才。

首先,不论针对的是本科项目学生,还是普通硕士、MBA或MPACC项目学生,授课教师都要在传授会计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会计与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的关系问题。学生不仅要学到知识(如何做会计分录),更重要的是掌握见识

(这个分录的经济意义是什么,对企业管理决策有什么影响)。会计知识是学生自己看书就可以基本掌握的,所以仅仅传授会计知识的教学是低层次的教学。教师的贡献在于能够传授见识,更好的教师能够帮助学生从学习中自己提高见识,并掌握提高见识的方法。

我们从会计报表的字面上得到的不是会计信息,只是数字,是历史记录。会计信息是这些历史数字背后反映的企业的经营业绩,揭露的经营问题,和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预测,是管理者可以依赖做经济决策的工具。而我们的教学就是要使我们的学生能够从数字记录中挖掘其背后的经济含义。

只有我们能够帮助学生把会计学习上升到这样的层次,我们才能算是为社会培养了优秀的会计人才,我们会计教育的价值才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只有这样,我们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企业里管理层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田茂永(2005)的问卷调查显示 43% 的企业一把手在做决策时不咨询财务部门的意见,这一方面反映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财务工作理解的偏差,但是也可能反映了我们财务部门对企业决策的贡献较小,不能引起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视。我国的现实情况是 CFO 是个“位高权不重”的位置,这不符合我们会计工作应该具有的潜力和贡献。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个普通的会计人员在企业里面也要是“人微言不轻”。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本科的会计学教育开始。我们的学生要既会“数豆子”,也要懂管理。要我们的学生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的会计学教师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讲义、课程安排、讲课方式,都应该体现出以上这些教育的目标。我们还应当组织教学经验交流,课程建设交流等活动,交流经验,共同提高。

课程建设是提高会计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我们还应该探讨会计国民教育系列的合理结构和安排。在这后一方面上,会计教育界应该和会计业界、会计行业组织、商学院等相关组织和部门协调,以取得合理的改革。

在本科会计教育的问题上(下一部分中还将进一步分析),我们主要是要控制会计毕业生的供给量和毕业生的质量。一味地追求招生规模不见得是对会计教育和会计行业发展有利的行为。

MPACC(会计专业硕士)应该是我们大力加强的一个项目。虽然这个项目才刚刚开始,但是它的发展前途应该是宽广的。为了提高 MPACC 项目的成果,我觉得两点问题很值得注意。第一,在招生过程中要“不拘一格选人才”。不必要在入学考试过程中设立过高的会计知识门槛。MPACC 的招生应当创造条件让优秀的本科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或以前不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进入会计行业。MPACC 为这些会计行业以外的人员提供了一个在工作几年后从其他行业转入会计行业的机会。这将极大地提高 MPACC 项目对会计行业的贡献。这些从别的行业通过 MPACC 学习转入会计行业的学生将给我们会计行业带来十分广泛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验,对丰富未来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经验有很大帮

助,对提升会计人员的管理能力也有很大帮助。

第二,MPACC 的教学目的应该以培养高级财务、会计人才为目标。虽然我国会计人员众多,但是高级财务、会计人员缺乏,不符合我们“引进来”、“走出去”的强国政策的需要。通过 MPACC 项目,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熟悉国际市场运作法则,通晓跨国资本运作渠道,并培养他们掌控现代外向型企业财务工作的能力。从 MPACC 项目中,成长出一批纵横国际市场的高级财务管理人员,将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最大贡献。

在大力发展 MPACC 项目的同时,我们要有意识地逐渐缩小普通会计硕士的规模。普通会计硕士是在博士项目还不普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学术硕士项目。现在,在博士项目已经普及,MPACC 项目蓬勃发展的情况下,普通会计硕士项目的存在已经过多地占用了宝贵的教师资源和教学资源,实际上不利于我们专心发展 MPACC 和博士项目。

会计博士项目应该以培养会计教师和开展会计学研究为目的。毕业生是否主要成为优秀的大学教师和会计学者是衡量一个学校会计博士项目成败的唯一指标。大量博士毕业生进入政府或工业界只能说明一个博士项目的失败。博士生从入学第一年开始,就应该算是进入了会计学术“圈”,要以研究和教学为自己的事业目标。

我们的会计系和教授应该有意识地在博士招生和培养过程中贯彻这个目标,并为博士生创造研究的生活上的保障。所以,会计博士项目应该小,应该本着有能力帮助博士毕业生都找到教学、研究职位为原则。博士生的培养要本着专、精的标准,宁缺毋滥。

美国的会计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供小于求的状态,所以令很多人不解的是,难道会计真的这样重要,以至一个刚毕业的会计博士、新的助理教授的工资比一个大牌的物理、工程或经济学教授的工资还高。但是,这就是美国会计学界的现实。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会计学术界才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从物理、工程或经济学等其他学科转过来的人才。

所以,如果我们的会计学术界要成为吸引优秀人才、产出一流成果、培育代英才的学科,成为受社会广为尊敬的学科,成为对国民经济做出重大贡献的学科,我们必须重视我们的博士项目,提高博士项目的毕业生质量,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会计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让我们的文章更多地被别人引用;让我们的学生更多地被社会重用;让我们的成果更多地影响会计以外的领域(王军,2006)。要作出这样的成绩,在会计教育方面,我认为我们要升华会计教育的目标,并用其指导我们的教学。在学科设置方面,本科教育要规模适度、研究型硕士项目要缩小、专业硕士(MPACC)项目要扩张,博士项目要小、专、精。

三、会计行业的自律建设与行业发展

自从 Luca Pacioli (1445—1517) 发明了复式记账法以来,会计行业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稳定、行业界限明确的技术性行业。会计行业的发展较少受经济周期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形式的蓬勃发展,美国经济对会计人员的需求,像对金融、计算机等技术行业人员的需求一样,增长很快。但是,在随后而来的经济衰退中,对金融、计算机等行业的人才需求锐减。随着安达信公司的倒闭和会计行业声誉的受损,人们以为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也会锐减。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据报道,美国进入经济衰退后,社会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反而增加了。社会需要更多的会计人才去处理“网络泡沫”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萨 - 奥法案”的实施也要求企业扩大会计部门的规模和提高会计部门的人员素质。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经济越发达,会计人员的报酬越高,并且在中、初级位置上平均水平高于企业其他职能部门。例如,本科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平均报酬要高于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而企业中级会计管理人员的报酬也要高于大部分类似级别的企业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会计行业的这种地位呢?答案当然首先是社会、经济对会计行业的需求是稳定的、必须的,并且是经济越发展,对会计工作的需求越大。但是,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会计人员的供给控制和质量提升同样是重要的原因。

在第一部分中,本文已经论述了社会和经济对会计工作的需求,并且提出了在我国现在的经济现实下,我们会计行业有可能、有潜力、有机会发挥比在其他国家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结合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来发展会计学,我们会计行业有能力拓展会计行业的内涵和外延,扩大会计工作的市场,创造社会对会计工作的需求,因此从需求方面提高会计工作在经济中的地位。

在这部分中,本文论述从供给方面提高会计行业地位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影响社会对会计工作的需求的能力有限的话,我们应该完全有能力更好地控制会计行业的数量供给和人员质量。

会计工业界的供给主要来自于各个大学及专科学校的会计系、会计专业。学位项目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包括普通会计硕士和专业硕士 MPACC)。当然,非会计专业的人员也可以通过参加会计课程学习或自学而从事会计工作,但是这样的人员应该是少数。

在控制会计从业人员规模和提高从业人员质量的问题上,行业自治组织(如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首席财务官 CFO 协会等)应该成为最主要的力量,同时,各级学校会计系、会计专业也具有重要的责任。

会计从业人员的合理规模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决定,但是这个过程

不应该完全交由市场决定。市场的均衡需求的结果可能是大量的、低成本的、低质量的会计从业人员。这样的结果不仅对会计行业不利,而且对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不利。很显然,低成本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会计人员的低素质。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将因为会计行业的低回报而流向其他专业,从而导致会计毕业生的低素质,和会计工作的低水平,进而导致会计人员和会计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低地位,然后进一步证明了会计工作应该低成本。本文第一部分中论述了会计工作在现代经济和管理中的重要性,所以一旦我们陷入高供给——低成本——低素质——低地位的恶性循环,我们将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管理造成重大的伤害。

因此,会计行业应该通过行业组织、通过会计教育的权威会计院、系,通过有影响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高瞻远瞩、集思广益,共同建立会计人才培养的长远、均衡计划。避免恶性循环、建立良性循环要求各个会计行业的参与者的努力、参与和自律。

良性循环的建立首先应该从对我国当前会计行业的供给与需求现状做一个全面、清醒的评估开始:我们会计行业的供给需求是否平衡?会计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大学中会计专业是否在吸引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会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在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中的地位如何?注册会计师等行业认证资格是否具有较高的含金量?会计人员升迁到企业高级管理部门的前景如何?社会对会计行业的印象是什么样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会影响到我们会计行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建立。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大学会计系一味地追求扩大招生规模,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或企业财务部门一味地追求降低人工成本,一个行业认证机构一味地追求认证考试通过率,都是对会计行业长远发展不利的行为。

在提高会计从业人员质量的问题上,会计业界还应该充分认识到会计学术界的重要性,并加大对会计学术界及大学会计系的支持。

会计学术研究的价值绝对不仅仅只有益于学术界自身,它对会计行业的贡献是巨大的。第一,会计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丰富会计行业的内涵和扩大会计行业的外延。例如,最近二十几年来的会计学者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奠定了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会计计量原则的采用,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会计行业的业务。又例如,会计学术界对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投资的研究成果被投资行业广为采用,极大地增加了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说,会计学术研究和业内实践创新是推动会计行业前沿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第二,会计学术研究可以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素质。会计研究的成果被会计教授们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从而提高了学生对经济和管理问题的认识高度,提高了他们对会计信息的认识,建立了高屋建瓴的会计观。这些对他们从事会计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三,会计学术研究是提升会计行业声誉的重要力量。会计学术研究正在逐渐改变社会对会计工作的认识,使社会不再把会计工作作为“数豆

子”的流程,而是作为经济工作和管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会计学术界、会计行业团体和会计师事务所(及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建立顺畅、持续的交流机制,及时沟通会计行业的情况、会计学术的成果、人才教育的进步等问题。会计学术界、行业团体和会计事务所应该成为会计行业发展的“三驾马车”,缺一不可。

同时,会计业界应该加大对会计学术界的财政支持。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在美国几乎是惯例性地对主要大学的会计系和行业学术组织进行捐赠。这些支持帮助各个会计系能够加大对博士生的培养力度,提高会计学教授的待遇,从而吸引更多优秀的学者从事会计学术和教学工作,并进而提高了会计毕业生的质量。

除了直接捐赠以外,中国注册会计师学会应该建立会计师继续教育制度,要求注册会计师每年参加一定学时的培训。这些培训应该尽量通过当地的大会计系进行。这样,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财政上支持各个会计系。会计行业的从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不应该把这个建议当作会计系赚钱的机会,而应该当作会计业界支持会计学教育,支持行业后备人才培训的投资机会。会计业界应该认识到,会计行业最重要的资产是人才,而会计学教育的质量是培养优秀会计人才的关键。

总之,在本部分中,我主要论述了会计行业自我保护和发展的的问题。我认为会计行业正处于一个确立自身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关键时刻。良好的自我保护和发展的意识可以使我们这个行业成为人才荟萃,受社会尊重,又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行业。反之,我们则可能变成经济中的“廉价劳动力”行业。

四、结论:创新、再创新、继续创新

我们会计行业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了。但是,我们同样应该重视创新,尤其是在现在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就需要在会计实践和理论上不断创新。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到既来源于实践,但又能领先于实践。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我问人们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说要跑得更快的马(If I had asked people what they wanted, they would have said faster horses)。”因为亨利·福特的创新,我们有了汽车。

我们会计行业在研究、教学、实践中的创新将同样为经济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姜国华. Stephen Penman 著《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定价》推荐序 [Z].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 [2] 姜国华. Rick Antle, Stanley Garstka 著《财务会计》第二版序 [Z].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 [3] 姜国华. 基于会计信息的证券投资策略研究: 分析及展望 [J]. 会计研究, 2005, (11).
- [4] 刘玉廷. 在财政部会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培养项目开班仪式上的讲话 [Z], 2006.
- [5] 鲁桂华、孟焰. 财务会计模式历史变迁: 分析视角的考察 [R]. 中央财经大学工作论文, 2006.
- [6] 迈克尔·戴尔蒙德. 新形势下的会计教育、研究和实务 [J]. 会计研究, 2005, (12).
- [7] 聂萍、张天西. 会计博士生培养与会计理论研究 [J]. 会计研究, 2004, (4).
- [8] 田茂永. 2005 年中国 CFO 生存状况调查 [J]. 首席财务官, 2005, (10).
- [9] 王海民、郑佩荣. 对我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几个问题的思考 [J]. 会计研究, 2005, (7).
- [10] 王军. 让你的文章更多地被别人引用, 让你的学生更多地被社会重用 [J]. 会计研究, 2006, (5).
- [11] Buchheit, Steve, Denton Collins and Austin Reitenga. A Cross - discipline Comparison of Top-tier Academic Journal Publication Rates: 1997-1999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Education, 2002, (20) : 123 ~ 130.
- [12] Brown, Lawrence and Indraini Laksmana. Accounting Ph. D. Program Graduates: Affiliations and Publications in Premier Accounting Journals [M]. Working Paper,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005.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in Accounting

JIANG GuoHua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Guanghua

Management Institution, Bei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Firstl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developing of accounting discipline based on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 then discussed some viewpoints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discipline and self-policing of accounting industry.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industry depends on the self-sublimation, the self-constraints, and constant creation.

Key words account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及其货币信息研究

——来自于日本企业环境报告书的启示

耿建新^① 夏文成 尚会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

摘 要 本文通过介绍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指南——日本环境省《环境会计指南(2005年版)》,并以日本东芝公司根据该指南编制的最新环境报告书为例,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及其货币信息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基础,本文还对中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进行了评价,为改进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高会计在我国企业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环境会计信息 货币信息 信息披露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国际社会对环境会计问题的重视,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计组织和国家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大范围的探索。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已在连续几次会议上讨论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并建议各国研究相关的会计准则。例如,1995年3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13届会议上把环境会计作为中心议题,会上讨论了“对各国环境会计法律法规情况的调查”、“有利和有碍于跨国公司采纳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因素”、“跨国公司环境绩效指标与财务资料的结合”、“跨国公司年度报告中对环境事项的披露”等文件,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已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且对其研究已向纵深发展。在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这一研究领域,笔者认为目前主要存在两大问题:(1)在实践方面,虽然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知名企业进行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尝试,但由于缺乏共同接受的标准,因此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披露模式^②。在通过财务报告披露环境信息这一方面美国和加拿大领先一步,而在通过环境报告书披露环境信息这一方面日本已占头筹。(2)在理论研究方面,各国对处于环境信息披

^① 耿建新 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审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② 本文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概念主要是指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是通过补充报告模式(即非独立报告模式)还是通过独立环境报告书模式来进行披露,以及每种模式下具体的披露格式和内容。

露核心地位的货币信息^①关注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结合我国的情况来看,了解国外最新指南、并结合企业实践来讨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及其货币信息问题,目前尚属空白。因此,本文在大范围搜索国外知名企业的环境报告书以及相关规范、指南的基础上,通过解读日本环境省《环境会计指南(2005年版)》,并以日本东芝公司根据该指南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书为例,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及其货币信息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践有所裨益。

二、日本《环境会计指南(2005 年版)》和东芝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书解读

(一) 日本环境省环境会计指南(2005 英文版)^②

从物量和货币两方面对实施环境对策所需的投资和获得的效益进行确认和计量,是环境会计的重要作用之一。日本环境省的指南正是以此为焦点。相比较来看,日本的指南在国际上已有的环境会计指南中最为详细,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该指南的主要内容由 10 个部分组成:(1) 环境会计的定义、职能、基本条件、构成要素;(2) 环境会计的基本事项;(3) 环境保全成本;(4) 环保效果;(5) 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6) 对合并环境会计的处理;(7)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8) 内部管理的应用;(9) 利用环境会计数据进行分析的指标;(10) 环境会计披露格式与内部管理表格。

就该指南的具体内容而言,有三个核心概念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密切相关,即环境保全成本、环保效果和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

1. 环境保全成本。是指用于预防、减少或避免环境影响、消除上述影响、对引起的环境危害进行补救以及其他活动的投资和费用,以货币单位计量。

根据业务活动的不同,环境保全成本可以分为与环境有关的经营区域内活动成本、上/下游成本、管理成本、研发成本、社会活动成本、环境修复成本和其他成本。根据环境保护措施的应用范围不同,又可将其分为防止全球变暖成本、保护臭氧层成本、提高空气质量成本、防止噪音与震动成本、减少废弃物和回收成本、减少化学物质成本、保护自然环境成本、保护水面地面和地质环境成本以及其他成本。

由于环境成本有些直接与环境相关,而有些处于灰色地带——部分与环境相关,部分与环境不相关。前者被称为“直接成本”,后者则被称为“复合成本”(包括投资和费用)。直接成本可作为环境保全成本核算,而复合成本的核算方法则包括差额合计(即扣除非环境保全成本部分,计算其成本差额)与成本分配

① 本文中的环境会计信息可以分为货币信息、物量信息(即非货币信息)和记述性信息三类。货币信息是指以货币单位表示的会计信息,物量信息是指以实物单位或其他物量单位表示的相关信息,记述性信息则泛指仅用文字表述的信息。

② 该指南来源于日本环境省的网站:<http://www.env.go.jp/en/rep/eco> 中的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Guidelines 2005。

(即根据确定的标准进行分配核算)两种方法。

2. 环保效果。是指企业通过预防、减少、避免环境影响,消除上述影响,修复环境损伤和其他活动所取得的成效,以物量单位计量。

根据环保效果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关系,可将其分为四类:(1)与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源投入相关的环保效果;(2)与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废弃物或环境负荷相关的环保效果;(3)与生产经营活动中生成的产品和服务相关的环保效果;(4)其他环保效果。

上述四个分类的每一类都有相应的具体指标,都以物量单位计量,一般通过基期环境影响量与本期环境影响量的差额来计算,即 $\text{环保效果} = \text{基期环境影响量} - \text{本期环境影响量}$ 。

在计算基期环境影响量时,有必要根据实际生产量来调整基期环境影响量,即 $\text{环保效果} = \text{基期环境影响量} \times (\text{本期生产量} / \text{基期生产量}) - \text{本期环境影响量}$ 。

3. 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是指企业或其他机构实施环保活动所获得的收益,用货币单位计量。

根据所依数据可否直接确定,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可被分为实际效益和推算效益。实际效益是根据确凿数据计算出的经济效益,包括由于环保活动在本期实现的收入和确属本期节约的费用;推算效益是根据一定假设得出的经济效益,包括根据一定假设估计出的属于本期的环保活动收入和节约的费用。

该指南没有确定推算效益的核算方法,只对实际效益的核算方法作了叙述:

(1) 在收入方面,环保活动的结果可由本期财务报表中与环保相关的收入列示;
(2) 在节约的费用方面,可参考环保效果的计量方法,即 $\text{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 (费用减少额)} = \text{基期费用} - \text{本期费用}$ 。若根据基期生产量来调整基期费用,则:
 $\text{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 = \text{基期费用} \times (\text{本期生产量} / \text{基期生产量}) - \text{本期费用}$ 。

以这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日本的环境会计报告指南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及其格式也做了全面、清晰的安排。

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亦即应披露的关键事项,具体包括统计期间、核算范围、环境保全成本的内容和核算标准、环保效果的内容和计量标准、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的内容和核算标准、合并环境会计的核算标准、重要环境会计政策的修订等。

2. 环境会计信息对外披露的格式。该指南推荐了一些通用的披露格式,并指出不要求所有企业对环境保全成本、环保效果和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都予披露,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只披露环境保全成本,然后再逐步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主要是由下述三张表格组成:

(1) 环境保全成本表。该表对不同类别(即上述根据经营活动进行的分类)的环境保全成本,分别披露其投资额、费用额、关键活动及其效果。其中,投资额与费用额以货币信息表示,关键活动及其效果的表述则以记述性信息为主。

(2) 环保效果表。该表对不同类别(即上述根据环保效果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关系进行的分类)的环保效果,分类披露具体的环境业绩指标、基期环境影响量、本期环境影响量以及本期与基期的差异。在计算环保效果时,采用了简单的计算方法,即环保效果等于基期环境影响量与本期环境影响量之差,并没有根据实际生产量来调整基期环境影响量。

(3) 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表。由于该指南没有对推算效益的核算方法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该表仅列示了实际效益(包括收入和减少的费用两方面)的具体内容和金额,但在备注中指出企业如果要披露推算效益,应注明所选择的核算方法的假设条件及其合理性。

上述三大报表的表头均注明了核算范围、统计期间及货币单位。除此之外,该指南还要求报告单位将这三张表汇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一览表。

(二) 东芝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书(对该公司 2005 英文版的解释)^①

就笔者所收集到的国外各知名企业的环境报告书而言,东芝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书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及其货币信息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在整体框架方面,该报告书分别披露了企业的经济业绩、社会业绩和环境业绩,体现了“三重底线”的报告框架(即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纬度来综合反映企业业绩),本文主要介绍其中的环境业绩,并结合上述指南进行相应分析。

1. 环境业绩。具体见表 1。

表 1 东芝公司环境会计报表

●环境保全成本			单位:百万日元		
类别	投资	费用	与 2003 年度 费用的差异	2005 年度投 资预算额	2005 年度 费用预算额

^① 该报告书来源于东芝公司网站 http://www.toshiba.co.jp/csr/en/report/pdf/report05_all.pdf。

经营区域内成本		10418 (7948)	18749 (11906)	Δ2594 (2091)	7273 (4458)	43250 (20326)
具体内容	防污成本	6450 (5542)	11191 (7958)	Δ1708 (1426)		
	地球环保成本	3127 (1980)	2338 (1211)	36 (454)		
	资源循环成本	841 (426)	5219 (2737)	Δ923 (210)		
上/下游成本		470 (0)	2065 (263)	669 (55)		
管理成本		233 (78)	5027 (2376)	Δ208 (288)		
研发成本		919 (468)	10073 (4512)	1735 (432)		
社会活动成本		22 (0)	728 (681)	565 (573)		
环境修复成本		196 (0)	2300 (390)	1535 (Δ310)		
合计		12259 (8494)	38941 (20127)	1703 (3129)		

＊ 0 中的数字是东芝公司在非合并基础上计算出来的。

(续表)

●环境效益 (即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

百万日元

类别	内容	东芝公司	分支机构	合计	核算依据 ^①
(1) 实际效益	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额的效益,如减少的电费、水费等	550	2203	2753	
(2) 推算效益	用货币额表示的环境负荷量的减少所带来的效益	6284	1010	7294	
(3) 顾客效益	以货币额表示的使用阶段环境负荷量的削减	380	5449	5829	
(4) 防范风险效益	与对投资进行计量前相比,投资风险减少的程度	1280	3284	4564	
合计		8494	11946	20440	

此外,东芝公司还进一步对实际效益、推算效益和顾客效益的具体内容分别披露了集团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环境负荷削减量(以物量单位表示)和效益货币额。

2. 结合日本环境会计指南对东芝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分析。东芝公司的环境会计报表有着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1) 单独列示了环境保全成本和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虽未单列环保效果,但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中以物量单位表示的部分其实就是环保效果。因此东芝公司的环境会计报表事实上包括了日本环境会计指南中所规定的三大主要报表,即环境保全成本表、环保效果表和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表。

(2) 结合产品生命周期,将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分为实际效益、推算效益、顾客效益和防范风险效益,并对前面三种效益分别以物量单位和货币单位分明细项目进行核算,同时还详细说明了四种效益的核算依据。而日本环境会计指南中只是将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分为实际效益和推算效益两类,因此东芝公司在这方面做得更加细致,也更有利于公司对环境的管理。

① 实际效益的核算依据为:与前期相比减少的电费、水费的货币总额以及有价物的销售收入。推算效益的核算依据为:计算以“镉”——一种由环境标准和 ACGIH - TLV (美国管制行业的卫生学家会议)所规定的每种物质可容许浓度——这一重量单位表示的各种物质的货币额,并且当存在镉污染时,要在上述货币额中增加赔偿额;大气、水和土壤的环境负荷削减量以物量单位表示,与前期进行比较,并将其转化为货币额,从而与前期的环境负荷在相同基础上进行比较。顾客效益的核算依据为: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环境负荷削减的效益,该效益以物量单位和货币单位计算。一个生命周期包括原料采购,制造,运输,使用,收集,再循环,适当的处理 7 个阶段。东芝公司的环境会计侧重于使用阶段环境负荷削减所带来的效益。节能效益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效益(日元) = $\sum [(旧模式下电力年消耗量 - 新模式下电力年消耗量) \times 年销售量 \times 电费单位标准价]$ 。防范风险效益的核算依据为:防范风险效益 = 化学物质累积量 $\times$ 净化与修复所需的标准金额(货币单位) $\times$ 影响系数 $\times$ 发生系数,净化与修复所需的标准金额以及发生系数都是东芝公司自定的。

(3) 在披露环境保全成本时区分了合并与非合并两种情况,在披露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时也分别列示了集团公司与分支机构的情况。由此可见,东芝公司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非常全面、详尽,也充分考虑了不同读者的需求。

3. 报表中的货币信息与传统财务信息^①的关系。环境会计报表中的货币信息与企业传统财务信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具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有些传统财务信息可以直接成为环境会计信息中的货币信息,这些货币信息就构成了第一类货币信息。例如,东芝公司披露的实际效益就是与前期相比减少的电费、水费的货币总额以及有价物的销售收入,而这些货币信息可以通过传统财务信息直接得到。

第二类:在进一步分析之后,有些传统财务信息可被分门别类地列入环境会计信息中的货币信息部分,这些货币信息就构成了第二类货币信息。例如,东芝公司在其环境会计报表中列示的“环保成本”,就是根据传统财务数据中与环保活动相关的经费、人工费、折旧费等费用以及资本性支出得到的。

第三类:环境会计信息中的部分货币信息,不能利用传统财务信息得到,而需要将物量单位的会计信息采用一定的核算方法(或换算系数)转化为货币信息,这些货币信息也就构成了第三类货币信息。比如,东芝公司在披露其环保效益中的推算效益、顾客效益和防范风险效益时,就是将物量单位的会计信息乘以特定的系数,从而转化为货币信息。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日本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践的先进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根据相应指南以独立环境报告书模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更为关键的是它们在核算与披露其中的货币信息方面付出了努力。这一点也正是我国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最大不足。

三、中国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

(一) 在采用非独立报告模式方面

上市公司(尤其是强污染行业)在其财务报告、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中都或多或少有环境会计信息方面的披露,其演变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环保信息披露逐年详尽,内容逐年增加(耿建新、焦若静,2002),但其披露的货币信息基本上属于第二类货币信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指引,还存在披露不全面、不规范、不可比等问题,尤其对其中货币信息的披露还远远不能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① 本文中的“传统财务信息”是指对因环境问题导致的财务影响未单独进行确认、计量和核算的会计核算系统中的会计信息。

(二) 在采用独立报告模式方面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采用独立环境报告书模式披露环境信息的很少,且其中货币化的会计信息基本没有。下文以属于重污染行业的宝钢股份环境报告书(2004 中英文对照版)^①和中石油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书(2004 中文版)^②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1. 宝钢 2004 年度环境报告书。作为国内率先发布环境报告书的企业,宝钢股份发布了 2003 年与 2004 年度的环境报告书。本文主要对宝钢 2004 年度环境报告书中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分析。

该报告书有关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集中于“影响环境的因素”与“污染控制措施”两部分,且基本上是以物量单位表示的信息,仅在其中的“环保投资”部分指出:“宝钢股份一、二、三期环保投资为 43.4 亿元,占基建总投资的 5%,建成大型环保设施 316 套,其中除尘设施 219 套,废水处理设施 64 套,其他环保设施 33 套。2004 年,重大项目投资 70.74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3.83 亿元,占年度总投资的 5.4%。2004 年,主要环保改造项目投入环保资金 9642 万元。”该报告书对主要环保改造项目分明细进行了列示,但没有披露对每一明细项目投入的环保资金。

2. 中石油 2004 年度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书。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没有单独发布环境报告书,但从 2000 年开始,连续 5 年发布了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书(简称 HSE 报告)。本文也主要对中石油 2004 年度 HSE 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分析。

该报告书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集中于“环境表现”和“继续加大环保投入”、“清洁生产审核成效显著”、“污水深度处理回用一举两得”这些部分,但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的物量单位信息(如以“吨”为单位的各类废弃物排放量),其货币信息不仅量少,而且极为简略,几乎是一语带过。如该报告书在“继续加大环保投入”部分仅做这样的说明:“中石油 2004 年用于环境保护投入资金达到 13.45 亿元,2000 年至 2004 年连续五年累计投入达到 61.42 亿元”在“清洁生产审核成效显著”部分也只提了一句:“吉林石化分公司投资 2143 万元”在“污水深度处理回用一举两得”部分也仅提到:“新疆油田分公司深度处理回用热采锅炉给水技术,年节约新鲜水用量 700 万吨,取得热能利用经济效益 2450 万元”。

3. 对比东芝公司的情况,对宝钢环境报告书和中石油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书

① 该报告书来源于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 <http://news.baosteel.com/plc/05development/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

② 该报告书来源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 <http://www.petrochina.com.cn/chinese/jkaqhjhj/pdf2004/jkaq2004.pdf>。

的评价。

(1) 从环境报告书的结构与内容来看,与东芝公司的情况相比,宝钢环境报告书和中石油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书的结构和内容还是比较完整、全面的。

(2) 从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格式与内容来看,宝钢、中石油与东芝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优秀实践相比,差距非常明显:

①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格式方面,东芝公司设计了专门的环境会计报表进行系统、综合的反映,而宝钢环境报告书和中石油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书中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均以物量信息为主,并没有以环境会计报表的格式综合列示。

②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方面,东芝公司分明细项目披露了环境保全成本、环保效果和环保效益,内容详尽完整,并力争将物量单位的信息转化为货币单位,凸现了会计在企业环保活动中的预测、反映和监督功能;而宝钢和中石油所披露的货币信息,仅局限于第二类货币信息,且少得可怜;至于在将物量单位的信息转化为货币单位方面,更是没有涉及,这将极大削弱会计在企业环境保护与管理方面的作用。

③东芝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书经过了第三方审验,而宝钢环境报告书与中石油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书均未经过独立验证,因此在信息的可信性方面也有很大差距。

总之,目前我国通过环境报告书模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很少,而编制环境报告书的企业由于缺乏相应准则或指南的指导,加之经验不足,其环境报告书的环境会计信息尤其是货币信息的含量很少,可以说“徒具形而不具其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报告书。

四、对改进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建议

(一) 有关政策制定机构应借鉴国外相关指南及其实践,尽快制定我国的企业环境会计披露指南

面对企业激烈的国际竞争及其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高度关注,我国环境保护机构应借鉴日本环境省的做法,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一起,参考日本环境省《环境会计指南(2005年版)》以及日本企业在编制环境报告书方面的实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我国的企业环境会计披露指南。

虽然目前我国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基本上还是通过年报或招股说明书等非独立报告模式披露,但鉴于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书是大势所趋,笔者建议相关政策制定机构在制定我国企业环境会计披露指南时,可以区分非独立报告模式与独立环境报告书模式分别进行规范。

1. 非独立报告模式

(1) 在现有的会计核算中增加与环境信息相关的会计科目,单独立账核算,如资产类增设“环境投资”、负债类增设“环境负债”、损益类增设“环境费用”、“环境收益”等,并在会计报表中单独列示。争取通过单独立账核算与披露,对传统的会计核算系统进行必要的修正,这样,环境会计信息中的许多货币信息就能直接与传统的会计信息相呼应。

(2) 在三张主表以外,再增加环境会计报表。环境会计报表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点,也是货币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环境会计报表的编制可参考日本环境会计指南的编制指导以及东芝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书中环境会计报表的格式。

此外,在环境会计报表的备注部分,应说明报表的统计范围、统计期间、参考指南、环境保全成本的核算方法(包括与环保活动有关的各种费用与投资及相关的折旧费)、环保效果的计算方法、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的核算方法等(若已在环境会计报表中注明,则不必重复说明)。

(3) 在财务报表附注部分,可以增加企业的环境目标、环境政策等定性环境信息,从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背景。

2. 独立环境报告书模式

(1) 整体的内容结构方面,可以参考东芝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书的格式,采用三重底线的报告结构,分别披露经济业绩、环境业绩和社会业绩。

(2) 在披露环境业绩时,其框架又可以参考日本环境会计指南的结构,对于其核心——环境会计报表的编制,则应该与在非独立披露模式下编制环境会计报表的要求相同。

(二) 政府监管机构应强制要求企业披露其环境报告

国外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动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意义重大。但我国的事实是,受利益驱使,我国企业在近期内很难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即很难通过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来使企业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李建发、肖华,2002)。因此,我国政府监管机构如环保部门、证监会等应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处于强污染行业(如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电力、电子、建材、造纸、酿造、制药、纺织、制革、采矿等行业^①)的上市公司加强监管力度,强制要求强污染的上市公司按照我国环境会计披露指南或准则编制环境报告,并向社会公众公布;对于强污染的非上市公司,也要求其编制环境报告或补充披露模式下的环境会计报表,向有关监管部门报送。

^① 关于强污染行业的划分标准,具体参见耿建新,焦若静,2002,“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初探”,《会计研究》,2002(1)。

(三) 企业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异,采用灵活的方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基本上还集中于非独立报告模式,编制环境报告书的企业凤毛麟角,而且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报告书。但我国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局面,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和不同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因时而异,采用灵活的方式披露企业环境会计信息。具体而言:

1. 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际惯例编制环境报告书。从短期来看,由于上市公司一般实力雄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有能力编制环境报告书,因此属于强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应当编制和披露独立的环境报告书,从而满足环保意识日益高涨的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也与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现行做法接轨。

属于强污染行业的非上市公司如果有能力,当然最好是通过编制环境报告书来全面反映企业环境业绩,若暂时做不到,可以通过补充报表模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但无论怎样都应在环境会计报表中详细披露环境保全成本、环保效果和伴随环保活动的经济效益等核心的环境会计信息,以充分发挥环境会计信息在企业持续经营、业绩评价和投资决策中的作用。

2. 企业应当顺应市场和政府管理的要求编制环境报告书。从长期来看,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全社会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尤其是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日益偏好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压力日益明显,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无论是否属于强污染行业,笔者认为企业都有动力、也有能力通过编制独立环境报告书来更有效地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3. 货币信息应当在企业的环境报告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无论企业采取哪种模式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对于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货币信息,都需要深入认识三类货币信息与传统会计信息的关系,并在企业环保管理经验日益丰富的基础上,尽量将物量单位的信息科学地、合理地转化为货币信息,从而使会计工作真正突破传统角色的束缚,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耿建新、焦若静. 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初探 [J]. 会计研究, 2002, (1) 43 ~ 47.
- [2] 耿建新、刘长翠.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J]. 审计研究, 2003, (3) 19 ~ 23.
- [3] 李建发、肖华. 我国企业环境报告: 现状、需求与未来 [J]. 会计研究, 2002, (4) 42 ~ 50.
- [4] 李连华、丁庭选.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J]. 经济经纬, 2001, (1) 58 ~ 64.
- [5] 李静江. 企业环境会计和环境报告书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6] 孟凡利. 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 [J]. 会计研究, 1999, (4) 16 ~ 25.

- [7] 邵毅平、高峰. 关于我国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 [J]. 财经论丛, 2004, (2) 50 ~ 56.
- [8] 王立彦等. 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实务调查分析 [J]. 会计研究, 1998, (8) 17 ~ 23.
- [9] 冯子敏. 国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管理启示 [J]. 经济研究参考, 2001, (29) 32 ~ 40.
- [10] 肖序. 环境会计研究的国际比较分析. 环境会计专题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 [11] 张白玲. 环境核算体系研究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 [12] [日] 井上寿枝、西山久美子、清水彩子著, 贾昕、孙丽艳译. 环境会计的结构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 [13] Rob Gray, Jan Bebbington 著, 王立彦、耿建新主译. 环境会计与管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4] 宝钢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度环境报告书 [Z]. <http://news.baosteel.com/plc/05development>.
- [15] Brehm, John, Hamilton, James T. Noncompliance in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re violators ignorant, or evasive, of the law? [J]. Austin, May 1996, Vol. 40, Iss. 2.
- [16]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Guidelines [Z] 2005, <http://www.env.go.jp/en/rep/eco/eag2005.pdf> <http://www.env.go.jp/en/rep/eco/eag2005.pdf>.
- [17] Efan Schaltegger and Roger Burritt.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ssues, Concepts and Practice [M]. Creeleaf Publications Ltd, 2000.
- [18] Tephania Stray, Joan Ballantine. A sectoral comparison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nd disclosure [J]. Eco - Management and Auditing, Dec 2000.
- [19] TOSHIB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N] 2005. http://www.toshiba.co.jp/csr/en/report/pdf/report05_all.pdf.

Research on The Pattern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Its Monetary Information ——Inspiration From The Japanese Company's Environmental Report

GENG JianXin XIA WenCheng & SHANG HuiJun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xample of how the famous Japanese company TOSHIBA published it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is paper gives a good introduction of the Japane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guideline (2005).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models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n the basis of this, suggestions are made on how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which can be used widely to prompt the enterprises to protect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monetary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作业基础成本制的实施可行性分析

——某单车零件制造商个案研究

李超雄^① 黄劭彦^② 林琦珍^③ 王润昌^④

(中正大学会计与信息系 逢甲大学会计系
静宜大学会计研究所 中正大学会计与信息研究所)

摘 要 本研究采用 Roztocki 等 (2004) 的研究模式,以自行车产业的主要零件制造商进行个案分析,并采用层级分析法 (AHP) 将现有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成本的作业分类。由作业基础成本制下所计算出的制造费用转为单位成本,再与标准成本、传统成本相比较,帮助管理者对产品的成本进行作业分析与检讨。本研究可作为中小企业在导入作业基础成本制的参考依据,并作为一个快速与简单的导入作业基础成本制的个案研究。

关键词 作业基础成本法 传统成本制度 层级分析法 小规模制造业

一、绪论

在竞争激烈的企业环境中,处于微利时代的生产活动,使价值工程显得日渐重要。随着科技的进步,自动化机器已逐渐取代人工,使直接人工成本降低,相对的制造费用成本提高,对于管理者而言便越来越重视成本结构的改变。鉴于国际化与竞争障碍的趋势,台湾制造业为取得成本领先的优势,被迫采用国际分工方式进行生产。虽然在取得原料与人工资源的低廉成本下,可以制造出低价的商品,但是随着后期竞争者通过模仿进入市场,原本的竞争优势已渐渐转变为劣势,各国劳工权益的日益高涨,促使劳工基本工资日渐调高,当初在当地政府所提供的优惠税率也逐步取消。在这些因素的改变下,所有的资源优势消失后,唯一可以管理的就是“制造费用成本”。

虽然财务报表是为提供正确的信息给管理者,但是也必须使用正确的成本管理制度才可彰显。由于使用过时的信息分析,或使用扭曲真相、缺乏时效性、

① 李超雄 中正大学会计与信息系副教授。

② 黄劭彦 逢甲大学会计系副教授。

③ 林琦珍 静宜大学会计研究所硕士。

④ 王润昌 中正大学会计与信息研究所硕士。

过于笼统的信息,从而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管理者在销售的活动中也常以错误的成本信息作出错误的决策,造成企业在亏本销售产品中并无警觉。而企业若能使用正确的“成本管理制度”,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Kaplan 和 Cooper (1998) 提出将“制造费用”分摊到产品身上的成本制度,这种方法并不能提供管理者有用的参考信息,因为用于营销、业务与通路的企业资源都属于非存货性质的成本,所以在财务报表上并不列为成本项目。尽管这些资源显然帮助企业满足顾客、营销、通路与市场的需求,但是在传统的财务系统上,并不会将其成本分配到资源使用者身上。由此,欲了解正确的“成本管理制度”,必须将所使用的“资源成本”合理地分配给真正使用者,提供出正确的产品“制造费用成本”。

自行车产业现正面临纷乱时期,又遭逢受到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消费者在紧缩消费性支出,许多自行车组装厂不敌价格的竞争与市场的萎缩,被并购或关厂,如美国 Cannondale 于 2003 年破产、奥地利 Bikedrive 于 2003 年破产、比利时 United Bicycle 于 2003 年破产、美国 Rock Shox 于 2002 年被 SRAM 并购、英国 RALEIGH 于 2002 年关厂、美国 Brunswick 于 2001 年关厂等。在此经济萧条时期更应该把握生产的制造成本,实行正确的“成本管理制度”,找出浪费资源的发生原因,看清楚企业营运的经济效益。

欧嘉瑞 (2004) 指出,在台湾的既有产业 (俗称传统产业) 中,能成功转型而且产品朝高级化发展者,首推自行车产业,这个产业也是最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局推动许多产业政策,在推动时并没有产业类别之分,只有是否有附加价值之分,因为产业唯有朝高质化发展,才能产生更佳竞争力,尤其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后,任何产业已进入价值化竞争,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对台湾自行车产业而言,正确的成本管理将影响其竞争力。

现在有不少关于作业基础成本制的个案研究,但迄今仍无关于自行车业的研究。本研究除探讨个案自行车零件厂的成本状况以外,还以作业基础成本制度实施的可行性,提出建议与参考。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的动机以自行车产业的零件厂为个案研究对象,了解公司目前的成本计算与作业流程,尝试改以作业基础成本的管理制度,比较出两者成本上的差异,回馈给管理者,作为作业基础成本制是否可以在自行车产业中实施的决策参考依据,进而探讨出更有效益与更精确的成本制度。

后续的部分中,首先将针对过去学者所做研究的相关文献加以整理;其次说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再次,描述个案公司背景以及对目前所实行的成本会计制度、分摊方式、制造流程等现况进行成本探讨,并依照 Roztocki 等 (2004) 作业基础成本制度的设计步骤执行,配合层级分析法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pproach, AHP) 算出成本动因的权重,计算出单一产品成本,以此探讨出新旧成本制度间的差异;最后则为结论与建议。

二、作业基础成本制的演进

作业成本制度(作业基础成本)及作业制管理(ABM)已在美国发展十多年,自从 Cooper 和 Kaplan (1988,1991) 首先提出此概念后,其成本管理技术对管理会计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它让公司更正确地了解了企业流程和费用。Joyce (1999) 定义作业基础成本制度(Activity-Based Costing Accounting, ABC) 为一种成本模式,它可以确认组织中的成本库(Cost pools)、作业中心(activity centers)以及分配成本到产品和服务(成本动因)。

作业基础成本制亦可针对企业的商业流程,分析其所有产生或支持的作业活动(activity),及每一项的成本动因(cost driver),以作业活动累积成本,再以成本动因作为分摊基础,将成本分摊至各个成本标的。随着制造环境的改变、生产技术的更新、企业竞争激烈、产品种类增加、产品生命周期变短、数据搜集与处用降低等,实在有必要对传统成本会计制度重新作评估。在传统劳工密集制造生产公司,依 Hardy 和 Hubbard (1992) 的调查,直接人工占 40% ~ 60% 的总制造成本,直接材料占 30% ~ 40%,而制造费用较 8% ~ 12% 还低,在面临成本巨大的转变后,资本密集制造产业有不同的成本结构,其制造费用可以占总制造成本达到 50% 以上。因此 Cooper 和 Kaplan (1988) 提出作业基础成本制,拟对制造费用之分建立一更合理之基准。作业基础成本制与传统基础成本制最大的差异在于对成本分摊观念的不同,作业基础成本制强调成本分摊时的因果关系,而传统基础成本制则以财务为主导。

基本上,作业基础成本制度与传统成本制度皆为两阶段的成本分摊,但成本分摊的基础不同。作业基础成本制度是一套用来衡量产品成本、作业绩效、资源耗用及成本标的之方法。其最大特色是于第一阶段时,将所耗用之资源归属至作业中心(成本库),再于第二阶段分摊时,将各成本库依作业成本发生的原因(成本动因)归属至成本标的中。作业基础成本制度的确更适合于目前激烈竞争、产品种类多样化、重视质量、策略长期规划等特质的市场环境。

目前全球已有许多家公司开始实行作业基础成本制度。作业基础成本制度可根据良好的成本信息制订适当的定价决策,根据良好的获利能力信息制定适当的产品组合,以及借由作业及成本动因来达成良好的成本管理(Burch 1996)。

当一个产业具备产业多样化、制造费用比重过高、竞争激烈、对成本控制的企图强烈时,则该产业适合推行作业基础成本制度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Cooper 和 Kaplan,1991)。然而,Greenwood 和 Reeve (1991) 指出,施行作业基础成本制度有助于成本的改善,但仍存在许多客观的限制,如附加价值作业的划分过于简化、绩效的回馈信息不足、制度的设计显然过于复杂等。

传统成本制度与作业基础成本制度在成本分摊上,皆采用两阶段分摊程

序,主要的差异在于第二阶段的分摊方式。传统成本制度采用单一的分摊基础,主要为与生产数量有关的基础,如直接人工、机器小时、原料成本等。而作业基础成本制度在第二阶段有关作业与成本标的的关系,则依各种作业层级与作业动因的不同,而使用不同分摊的基础。作业基础成本制度是将作业区分成四个层级,其目的是将作业划分成不同层级,可以提供管理者一个结构化的思考方法,让管理者更能了解作业与其所消耗资源二者之关系,并寻找与其变动有因果关系的分摊基础,而非仅就单位成本观点 (unit-cost perspective) 来思索成本发生原因 (Cooper 和 Kaplan,1991)。作业基础成本制度的作业是描述企业耗用资源的因果关系,以及将资源归属至产出的方法。有关作业层级的探讨,Cooper 和 Kaplan (1991) 以制造业为例,将其分为四个层级:

1. 单位水平作业 (unit-level activities) :作业为重复发生的,每生产一单位即需作业一次。此类作业所消耗的资源将随产品数量而异,而此作业层级所发生的成本与产品的生产量有直接的关系。

2. 批次水平作业 (batch-level activities) :作业每批产品的生产,均需执行的作业,而批次层级的成本受其所处理的批次数影响,但不受到各批次中数量多寡的影响。如订购燃料的处理成本与订购的次数有关,而与每次订购的数量无关。

3. 产品支持作业 (product-sustaining activities) :是指为支持某特定产品而需执行的作业,而其成本与其支持的特定产品有关,与其他产品无关。

4. 厂务支持作业 (facility-sustaining activities) :此类作业是为维持工厂一般营运而生,其与产品或顾客并没有直接之关系存在,因此仅能用较武断之方法将厂务支持作业成本分摊至产品或顾客身上 (Turney,1991)。为支持企业一般性制造过程的作业,其成本与产品的关联性较低。

实施作业基础成本制的步骤主要分为:(1) 作业分析 定义作业分析范围→定义作业分析单位→定义作业→作业合理化→分类为主要及次要作业→制作作业图→结论和作业书面化。(2) 重组分类账:合并相关会计科目→细分至部门层次→调整不经济的项目。(3) 建立作业中心(依同构型的程序) 将作业放入部门化的作业中心→依订定属性,建立作业中心→建立作业分类系统。(4) 确定第一阶段资源动因与建立作业成本库。(5) 确认各作业中心的相关作业项目。(6) 确认各项作业的作业流程及细目作业。(7) 确定第二阶段作业动因与分摊成本到成本标的。(8) 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选择一最适合的作业基础成本制度之模型。(Turney, 1991; O'guin,1991; Brimson, 1991; Cooper 和 Kaplan, 1991; Hicks, 1992; Miller 等,1985; Kaplan 和 Cooper, 1998; Horngren 等, 2002; Burch, 1996 吴安妮, 1997)

三、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个案 (Case Study) 方式来进行,参考 Roztocki 等 (2004) 研究有关中小型企业之作业基础成本制的实证分析,并依据 Roztocki 等 (2004) 的研究方法进行个案公司的成本分析。

(一) 研究对象产业

以自行车产业供应链中零件厂为研究对象,个案公司符合 Burch (1996) 所述适合作业基础成本制度的情况:(1) 竞争激烈。(2) 产品生命周期短,例如三年或更短。(3) 产品组合以批次量及复杂程度来区分,而且原料均不相同。(4) 数据的收集与操作都是以整体计算机基础信息系统来执行。

自行车产业在 2001 年全球的不景气下,台湾自行车产值与出口值也衰退超过 30%,2002 年自行车产业出口金额衰退 1.39%。大陆自行车产值稍有减缓,但是出口值仍然持续成长,成车市场在低价竞争下对台商冲击也最大,各组车厂也对零件厂年年要求降价,使得营业利润日渐下滑。对进入障碍低的自行车产业而言,如何有效降低成本、缩短交期、加速顾客回应、提供顾客客制化的创新产品,都是促进产业发展及创造国际竞争优势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若能运用降低成本并有效利用作业基础成本制度配合流程再造、创新研发与国际市场接轨,则在激烈的削价竞争中,为自行车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二) 研究架构与模式

本研究需先了解个案公司的成本结构与生产流程,针对其产品的生产作业流程发展“作业基础成本制度”,并依照 Roztocki 等 (2004) 学者建议的实施步骤执行中小型企业的作业基础成本制。在此将“资源动因”与“作业动因”两阶段的成本归纳到“作业标的”为本研究首要学习重点。其后再以其结果与标准成本、传统实际成本做比较,让成本管理者了解其中成本计算所造成的成本差异,更可有效的管理与调配资源或作业,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以提升经营的绩效。

依据 Cooper 和 Kaplan (1988) 之作法第一阶段为将成本以“资源动因”分配到作业中心之成本库中,第二阶段为成本分配,将成本库中的成本分配到产品,其基础在于产品必须有消耗作业。

制造费用科目如管理、利息、运费、保险、修缮费等,这些数据可以自传统财报中取得。只要追溯成本信息去决定主要作业,如此即可完成将各种活动转到作业(或成本库)和作业转到作业中心(产品),接近作业基础成本模式作业。在小型制造业的作业中如客户拜访、客户报价、产品管理、运送产品,制造费用科目都可以在事前将第一阶段成本动因定义好属于哪一个作业,第二阶段决定

表 1 个案公司制造成本比率分析

年度	直接人工	委外材料	直接材料	制造费用
1992	5.33%	7.66%	56.75%	30.25%
1991	3.69%	10.17%	39.44%	46.70%
1990	4.26%	7.35%	65.84%	22.54%
1989	4.77%	6.06%	74.39%	14.78%
1988	4.83%	7.26%	73.86%	14.05%
1987	3.97%	8.01%	77.09%	1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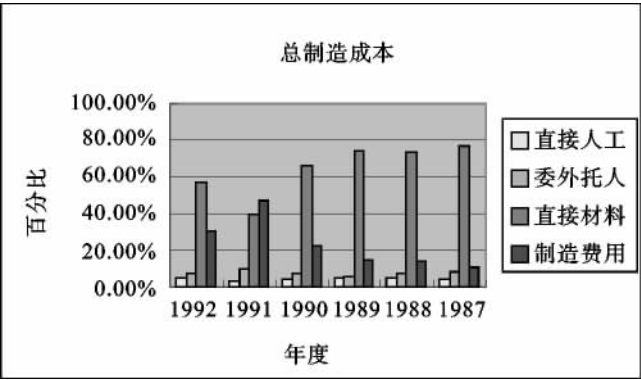


图 4 个案公司制造成本比率分析图

进一步分析 FW 产品的领料程序与生产流程,以利后续资源动因与作业动因的分析。

传统成本制度下,以“生产数量”为成本计算分摊基础:

实际总成本 = 直接材料 + 工资及附加 + 制造费用 + 材料损(益)
+ 包装费 + 外部加工费

材料单位成本 = 直接材料 / 产量

实际单位成本 = 实际总成本 / 产量

工资及附加 = 某产品数量 / 同类产品总数量 * 总工资及附加

制造费用 = 某产品数量 / 同类产品总数量 * 总制造费用

材料损(益) = 某产品数量 / 同类产品总数量 * 总材料损(益)

实际总成本 = 直接材料
+ (某产品数量 / 同类产品总数量 * 总工资及附加)
+ (某产品数量 / 同类产品总数量 * 总制造费用)
+ (某产品数量 / 同类产品总数量 * 总材料损(益))
+ 包装费

(二) 作业成本动因分析

依照 Roztocki 等 (2004) 研究模式,步骤 1 是收集 2003 年财务报表 (表 2),以个案公司的制造费用明细表汇整出资源动因。步骤 2 是定义主要作业与第二阶的成本动因,表 3 为主要作业与第二阶层成本动因,图 5 为费用类别 (结构树)。可以看出费用类别、作业、产品的结构树关联图,其中作业贡献到费用类别中。表 4 为个案公司对生产产品数量与耗用工时的汇集表,以利第 4 步的权重参考。

表 2 制造费用与资源动因

项目	制造费用	千元	Cost Drivers	项目	制造费用	千元	Cost Drivers
1	水电瓦斯	2868	生产产品数量 (q)	9	什费	184	NONE
2	杂项购置	2587	NONE	10	修缮费	174	生产时间 (Hr)
3	进口费用	1627	重量 (kg)	11	旅费	154	重要客户水平 (%)
4	折旧	1119	使用资源的费用 (\$)	12	文具印刷	83	办公室资源使用水平 (%)
5	薪资支出	1066	时间 (Hr)	13	邮电费	43	活动的成本 (\$)
6	各项摊提	606	Space (坪)	14	模具费	38	生产产品数量 (q)
7	间接材料	469	生产产品数量 (q)	15	运费	36	距离 (里)
8	燃料费	421	生产产品数量 (q)	16	交通费	21	重要客户水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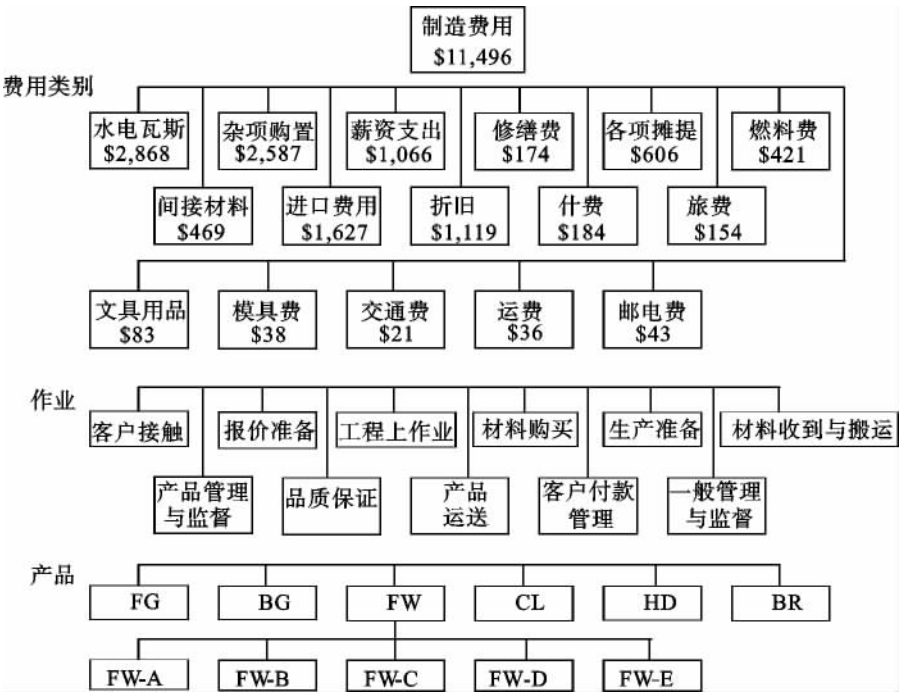


图 5 费用类别 (结构树)

表3 主要作业与第二阶层成本动因

作业	Cost Driver	作业	Cost Driver
客户接触	客户接触次数	产品管理与监督	产品复杂
报价准备	报价次数	质量保证	产品复杂
工程上作业	工程小时	产品运送	距离
材料购买	采购单次数	客户付款管理	付款次数
生产准备	生产批次	一般管理与监督	活动强度
材料收到与搬运	接收次数		

表4 产品生产数量

组别	实际耗用工时	完工产量	产量比率
前变速	11594.50	365730	0.2300
后变速	32150.51	546937	0.3440
变速杆	12205.00	677171	0.4259
小计	55950.01	1589838	1.0000
夹器	4518.00	90880	0.3096
手把	3537.50	202674	0.6904
小计	6631.50	293554	1.0000
脚刹	68523.00	1564,736	1.0000
轮	45352.00	531200	1.0000
合计	176456.51	3979328	4.0000

(三) 费用—作业—从属 (EAD) 矩阵

步骤3是将费用分配至作业建立EAD矩阵表(表5)。行代表费用种类,列是由第二步中定义的作业为主。如作业*i*与所提供的费用种类*j*,表中位置为(*i*,*j*)。若是作业对费用种类有贡献就以“▲”表示,如客户接触作业有发生薪资支出的费用产生。

步骤4,利用层级分析法(AHP)进行比对,计算每一格所提供贡献比率权重的衡量。让每一费用类别能够分摊到所贡献的作业中,必须要注意的是每一行的费用类别加总为“1”。

表 5 费用 - 作业 - 从属 (EAD) 矩阵

费用种类/作业	水电瓦斯	杂项购置	进口费用	折旧	薪资支出	各项摊提	间接材料	燃料费	什费	修缮费	旅费	文具印刷	邮电费	模具费	运费	交通费
客户接触					▲	▲		▲	▲		▲	▲	▲			▲
报价准备					▲	▲			▲			▲	▲			
工程上作业	▲	▲	▲	▲	▲	▲	▲		▲	▲	▲	▲	▲	▲		▲
材料购买					▲	▲						▲	▲			
生产准备	▲	▲	▲	▲	▲	▲	▲	▲	▲	▲		▲	▲	▲		
材料收到与搬运	▲				▲	▲		▲	▲			▲	▲		▲	
产品管理与监督	▲	▲			▲	▲			▲			▲	▲			
质量保证	▲	▲	▲	▲	▲	▲			▲			▲	▲			
产品运送			▲		▲	▲		▲	▲			▲	▲		▲	
客户付款管理	▲				▲	▲			▲			▲	▲			
一般管理与监督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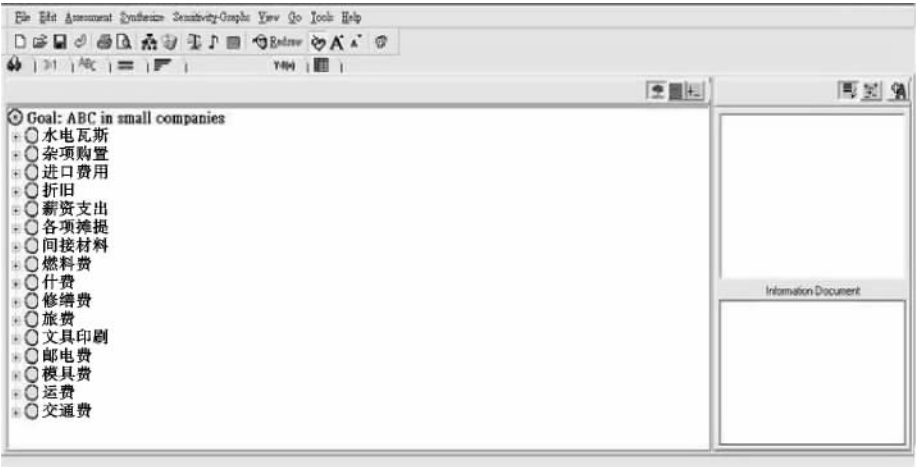


图 6 层级分析法 (AHP) Expert Choice 软件中建立第一阶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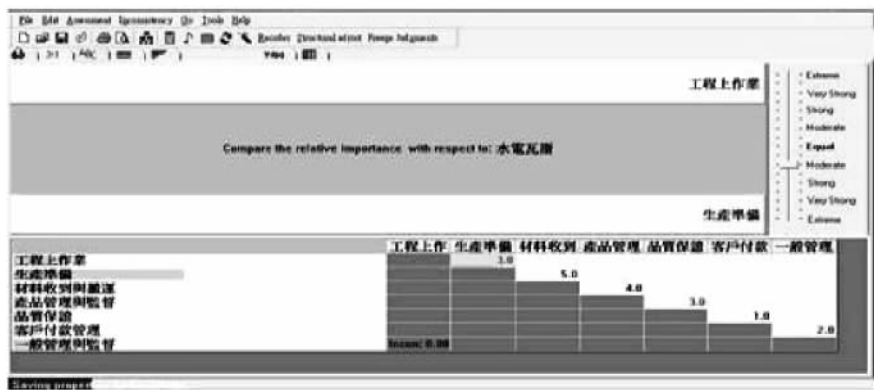


图 7 层级分析法 (AHP) Expert Choice 软件中两对作业比较



图 8 层级分析法 (AHP) Expert Choice 软件中“水电瓦斯”作业权重

利用层级分析法 (AHP) 时,借由 Expert Choice 软件工具的帮助,可以很正确的获得每一个作业的权重 (图 6 ~ 图 8)。两两作业比较后可计算出该作业的权重。该软件采用 9 级衡量标准的问卷方式如表 6 所示,可以利用该软件工具并参考生产数量与生产工时等数据,进行点选自己正确的级数后计算即可完成费用—作业—从属 (EAD) 矩阵的分析。

对于作业与费用种类的解释如下：

1. 进口费用 报关费用等。
2. 间接材料 润滑油、车刀等。
3. 交通费 车资、路费等。
4. 旅费 差旅费等。
5. 运费 海空运费等。
6. 燃料费 加油、发电机柴油等。

- 7. “工程准备”视为模具与治具的制作。
- 8. “生产准备”为生产线的料件搬运与在线模具更换。
- 9. “质量保证”为检验产品的设备与过程。
- 10. “产品管理与监督”为产品的库存管理,标准作业管理,成本管理,生产实时系统管理。
- 11. “一般管理与监督”为行政事务与幕僚性事务管理。

从表 5 中得到各作业与费用的关系后,利用 Expert Choice 软件计算得到表 7 的各项最后权重结果,再以 Excel 软件将该费用种类的金额乘上该字段权重,就可计算出表 8 的费用金额。

表 6 Expert Choice 软件的衡量尺度表

衡量级数	权重分数
Extreme	9.00
Very Strong to Extreme	8.00
Very Strong	7.00
Strong to Very Strong	6.00
Strong	4.00
Moderate to Strong	4.00
Moderate	3.00
Equal to Moderate	2.00
Equal	1.00

表 7 费用—作业—从属(EAD)矩阵

费用种类 作 业	水电 瓦斯	杂项 购置	进口 费用	折旧	薪资 支出	各项 摊提	间接 材料	燃料 费	什 费	修 缮 费	旅 费	文具 印刷	邮 电 费	模 具 费	运 费	交通 费
客户接触					0.05	0.033		0.064	0.005		0.637	0.018	0.005			0.528
报价准备					0.026	0.067			0.012			0.037	0.016			
工程上作业	0.153	0.667	0.037	0.235	0.114	0.207	0.25		0.069	0.167	0.105	0.074	0.009	0.75		0.14
材料购买					0.042	0.088						0.037	0.022			
生产准备	0.458	0.167	0.185	0.652	0.23	0.323	0.75	0.325	0.256	0.833		0.114	0.013	0.25		
材料收到 与搬运	0.092				0.047	0.074		0.083	0.073			0.058	0.008		0.2	
产品管理 与监督	0.023	0.056			0.079	0.035			0.133			0.119	0.021			
质量保证	0.069	0.028	0.102	0.113	0.203	0.098			0.066			0.244	0.053			
产品运送			0.675		0.089	0.031		0.383	0.106			0.111	0.135		0.8	
客户付款 管理	0.069				0.041	0.015			0.053			0.05	0.298			
一般管理 与监督	0.137	0.083			0.078	0.03		0.146	0.228		0.258	0.136	0.419			0.333

表 8 费用—作业—从属(EAD)矩阵

费用种类 作业	水电 瓦斯	杂项 购置	进口 费用	折旧	薪资 支出	各项 摊提	间接 材料	燃料 费	什费	修缮 费	旅费	文具 印刷	邮电 费	模具 费	运费	交通费
客户接触					53.3	20		26.94	0.92		98.1	1.494	0.215			11.09
报价准备					27.72	40.6			2.208			3.071	0.688			
工程上作业	438.8	1726	60.2	263	121.5	125.4	117.3		12.7	29.06	16.17	6.142	0.387	28.5		2.94
材料购买					44.77	53.33						3.071	0.946			
生产准备	1314	432	301	729.6	245.2	195.7	351.8	136.8	47.1	144.9		9.462	0.559	9.5		
材料收到 与搬运	253.9				50.1	44.84		34.94	13.43			4.814	0.344		7.2	
产品管理 与监督	65.96	144.9			84.21	21.21			24.47			9.877	0.903			
质量保证	197.9	72.44	166	126.4	216.4	59.39			12.14			20.25	2.279			
产品运送			1098		94.87	18.79		161.2	19.5			9.213	5.805		28.8	
客户付款 管理	197.9				43.71	9.09			9.752			4.15	12.81			
一般管理 与监督	392.9	214.7			83.15	18.18		61.47	41.95		39.73	11.29	18.02			6.993
费用小计	2871	2590	1625	1119	1065	606.6	469	421.4	184.2	174	154	82.83	42.96	38	36	21.02

(四) 作业—产品—从属矩阵 (APD) 计算

步骤 6 定义哪一作业是被哪一项产品所消耗,从作业成本中去追溯到每一产品,此为第二阶段成本动因分析,与第一阶段第三步骤非常相似,从表 9 作业—产品—从属 (APD) 矩阵先设定产品与作业种类的消耗关系,以“▲”表示,行是代表作业,列是代表产品,如产品 i 与所消耗的作业 j ,表中位置为 (i,j) 。

步骤 7 为 APD 矩阵表内容改变为检核权重。采用层级分析法 (AHP) 进行成对比较,然后计算出各产品的权重,每一行必须加总和为 1。

首先用 Expert Choice 软件建立第二阶关系 (图 9),然后再进行作业的两两权重相比对,计算出每一产品中作业的权重。例如:质量保证作业中的 FG 产品之权重为 0.207, BG 产品之权重为 0.207, G-lever 产品之权重为 0.105, CL 产品之权重为 0.064, HD 产品之权重为 0.078, BR 产品之权重为 0.175, FW 产品之权重为 0.164。图 10 为“质量保证”作业权重结果。



图 9 层级分析法 (AHP) Expert Choice 软件中建立第二阶关系



图 10 层级分析法 (AHP) Expert Choice 软件中“质量保证”作业权重

步骤 8 为计算出产品的金额价值,利用步骤 7 所计算出的作业—产品—从

属 (APD) 矩阵 (表 10) ,并依照前述步骤 8 之公式,作业金额价值乘上 (i,j) 之作业—产品—从属矩阵权重数值,就可以得到产品 i 之制造费用 (表 11)。

表 10 费用 - 作业 - 从属 (EAD) 矩阵

费用种类 作业	客户接触	报价准备	工程上作业	材料购买	生产准备	材料收到与搬运	产品管理与监督	质量保证	产品运送	客户付款管理	一般管理与监督
FG			▲	▲	▲	▲	▲	▲	▲	▲	▲
BG			▲	▲	▲	▲	▲	▲	▲	▲	▲
G-Lever			▲	▲	▲	▲	▲	▲	▲	▲	▲
CL	▲	▲	▲	▲	▲	▲	▲	▲	▲	▲	▲
HD	▲	▲	▲	▲	▲	▲	▲	▲	▲	▲	▲
BR	▲	▲	▲	▲	▲	▲	▲	▲	▲	▲	▲
FW	▲	▲	▲	▲	▲	▲	▲	▲	▲	▲	▲

表 11 费用 - 作业 - 从属 (EAD) 矩阵

费用种类 作业	客户接触	报价准备	工程上作业	材料购买	生产准备	材料收到与搬运	产品管理与监督	质量保证	产品运送	客户付款管理	一般管理与监督
FG			0.143	0.144	0.173	0.154	0.13	0.207	0.09	0.133	0.144
BG			0.143	0.176	0.276	0.154	0.165	0.207	0.195	0.185	0.175
G-Lever			0.071	0.071	0.106	0.077	0.196	0.105	0.139	0.232	0.142
CL	0.444	0.157	0.036	0.115	0.097	0.077	0.102	0.064	0.059	0.126	0.059
HD	0.222	0.163	0.036	0.06	0.091	0.077	0.085	0.078	0.107	0.114	0.137
BR	0.111	0.417	0.143	0.195	0.172	0.154	0.232	0.175	0.28	0.151	0.251
FW	0.222	0.262	0.429	0.237	0.084	0.308	0.09	0.164	0.13	0.059	0.091

表 12 作业 - 产品 - 从属 (APD) 矩阵

费用种类 作业	客户接触	报价准备	工程上作业	材料购买	生产准备	材料收到与搬运	产品管理与监督	质量保证	产品运送	客户付款管理	一般管理与监督
FG			421.507	14.705	677.68	64.609	45.696	180.75	129.29	36.894	127.93
BG			421.507	17.973	1081.1	64.609	57.999	180.75	280.12	51.319	155.47
G-Lever			209.28	7.2505	415.22	32.305	68.896	91.685	199.67	64.357	126.15

(续表)

费用 作 业 种 类	客户 接 触	报价 准 备	工程上 作 业	材料 购 买	生产 准 备	材料 收到 与搬 运	产品 管理 与监 督	质量 保 证	产品 运 送	客户 付 款 管 理	一般 管 理 与 监 督
CL	94.155	11.663	106.114	11.744	379.97	32.305	35.854	55.884	84.754	34.952	52.416
HD	47.077	12.108	106.114	6.1272	356.47	32.305	29.878	68.109	153.71	31.624	121.71
BR	23.539	30.977	421.507	19.913	673.76	64.609	81.55	152.81	402.22	41.887	222.99
FW	47.077	19.463	1264.52	24.202	329.04	129.22	31.636	143.2	186.75	16.367	80.845

(五) FW 产品中细项产品展开

以上八步骤完成后,得到个案公司七个产品大分类的成本金额,再进行“FW 产品”单一产品的展开细分。Roztock 等 (2004) 之研究中只有进行到以上步骤,并未进行后续的展开,但本研究为配合实际的状况,必须要继续展开到单一细项产品,才可计算出单一产品成本,以比较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差异。

图 11 ~ 图 13 为 Expert Choice 软件建立细项产品第二阶作业—产品、两两比较权重、计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单一产品中 FW-A、FW-B、FW-C、FW-D、FW-E 五项 FW 产品的各项作业权重。因为各单一产品皆与各作业有关所以省略第六步骤的图示。再利用 Expert Choice 软件所建立的数据,填入作业—产品—从属 (APD) 矩阵可以得到表 13。其中各单一产品的作业权重,在每一作业加总为“1”。



图 11 Expert Choice 软件建立细项产品第二阶作业与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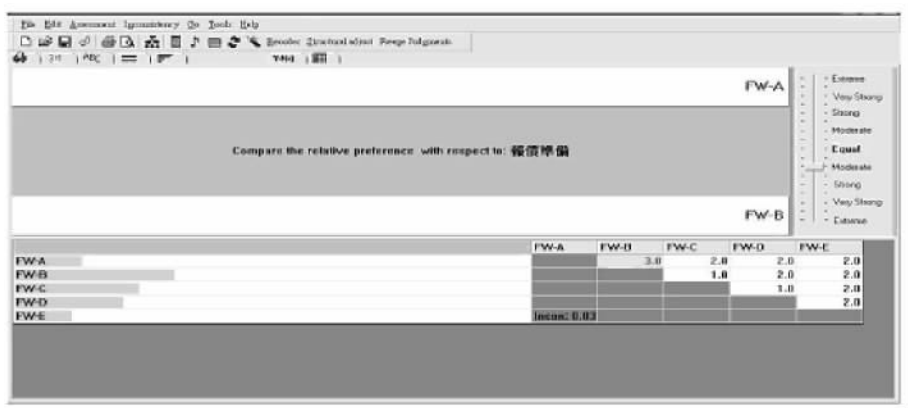


图 12 Expert Choice 软件建立细项产品第二阶“报价准备”之产品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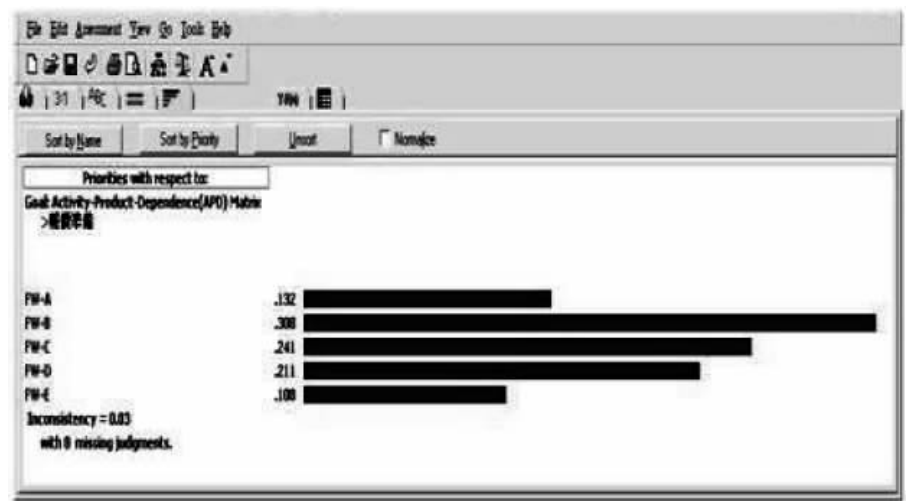


图 13 Expert Choice 软件建立细项产品第二阶计算“报价准备”结果

表 13 作业 - 产品 - 从属 (APD) 矩阵

费用种类 作业	客户 接触	报价 准备	工程上 作业	材料 购买	生产 准备	材料 收到 与搬运	产品 管理 与监督	质量 保证	产品 运送	客户 付款 管理	一般 管理 与监督
FW-A	0.200	0.132	0.200	0.129	0.222	0.133	0.129	0.188	0.129	0.129	0.125
FW-B	0.200	0.308	0.200	0.387	0.222	0.400	0.387	0.375	0.387	0.387	0.250
FW-C	0.200	0.241	0.200	0.194	0.222	0.200	0.194	0.188	0.194	0.194	0.250
FW-D	0.200	0.211	0.200	0.194	0.222	0.200	0.194	0.188	0.194	0.194	0.250
FW-E	0.200	0.108	0.200	0.097	0.111	0.067	0.097	0.063	0.097	0.097	0.125

再以表 11 中的大分类中之 FW 产品金额与表 12 的各产品权重相乘,可以获得表 13 各单一产品的成本数据 例如:客户接触在 FW-A 的权重为 0.2,大分类 FW 产品为 47.077,得出 FW-A 的客户接触权重为 $0.2 \times 47.077 = 9.415$ 。

表 14 作业 - 产品 - 从属 (APD) 矩阵

费用种类 作业	客户接触	报价准备	工程上作业	材料购买	生产准备	材料收到与搬运	产品管理与监督	质量保证	产品运送	客户付款管理	一般管理与监督
FW-A	9.415	2.569	252.90	3.122	73.047	17.186	4.081	26.922	24.091	2.111	10.106
FW-B	9.415	5.995	252.90	9.365	73.047	51.688	12.243	53.700	72.272	6.334	20.211
FW-C	9.415	4.691	252.90	4.695	73.047	25.844	6.137	26.922	36.230	3.175	20.111
FW-D	9.415	4.107	252.90	4.695	73.047	25.844	6.137	26.922	36.230	3.175	20.111
FW-E	9.415	2.102	252.90	2.347	36.523	8.658	3.069	9.022	18.115	1.588	10.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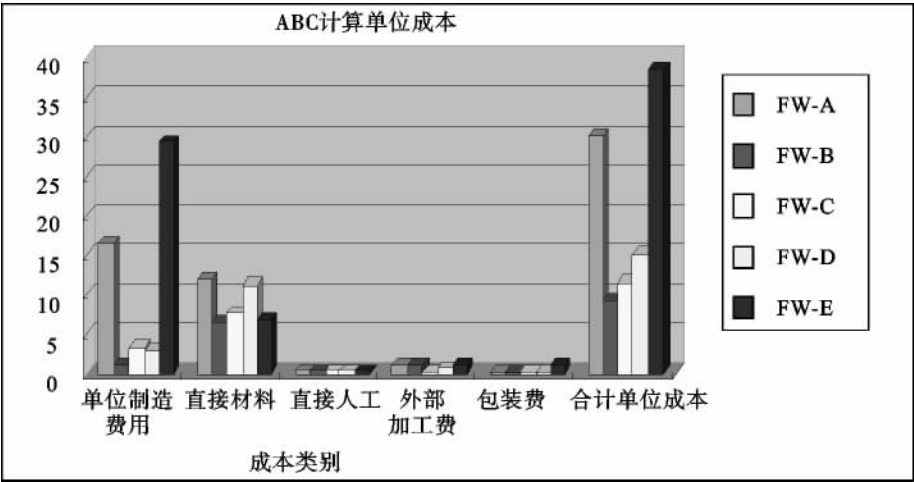


图 14 单一飞轮产品的作业基础成本之成本分析

将表 13 各单一产品的加总得到表 14 中该产品的“制造费用合计”,再以生产数量相除得到单位制造费用,然后将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外部加工费、包装费加总,得到单一产品作业基础成本的单位成本,利用已收集到的传统成本会计数据与工程上标准成本加以差异比较 (表 14、图 14),提供给决策者的参考依据。

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以作业基础成本制中的 FW-A 与 FW-E 的成本与传统单位成本差异很大,多达 20.5 与 25.16 ;在和标准成本比较也发现有 18.68 与 29.86 的差异,其中原因为工程上作业、生产准备、质量保证的作业费用较高所致。

五、结论与建议

本部分综合了论文中以作业基础成本制为方法、以个案方式进行实证分析的有关研究内容,并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研究结论、研究贡献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个案公司的成本研究采用 Roztocki 等 (2004) 的研究模式,每一步骤都依照该研究模式进行,可以很容易建立起作业基础成本的观念;而在 Cooper 和 Kaplan (1988) 的推广下,常在一般大型企业成功的采用与导入作业基础成本制,对于中小企业的导入因为需要较多的资源投入,并且需要借助软件进行数据收集,常会遇上阻碍。然而本研究的作业基础成本导入模式中利用层级分析法 (AHP) 的技术,简易的以现有财务报表数据就可以进行作业基础成本制,并且获得正确的制造费用,帮助管理者对产品的成本进行作业分析与检讨,更进一层在从传统成本制转变到作业基础成本制时,可以采用本方法,在导入“过渡阶段”中更平顺且能成功执行。其结果如下:

1. EAD 与 APD 矩阵配合作业成本制的作业动因 本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矩阵为费用—作业—从属 (EAD) 矩阵与作业—产品—从属 (APD) 矩阵,这两矩阵利用费用与作业、作业与产品的关联,将资源动因与作业动因由基本作业基础成本制的基础纳入,简易的由财务报表中取得各制造费用科目数据,分析权重后就可以求出作业成本与产品的制造费用,此过程可以了解制造费用成本是如何产生,并对于高成本的作业进行改善以降低费用。在 APD 矩阵中,各产品作业费用最高,如 FG、BG、BR 与 FW 产品的工程上作业费用, C-Lever、CL 与 HD 产品的生产准备费用,和 FW-A 至 FW-D 之单一 FW 产品中的生产准备费用,都可以进行 ABM 的管理控制;FW-A 与 FW-E 的传统与标准成本差异颇大,在本个案公司成本计算都是以生产数量为分摊基础,会造成产品成本在产品间成本互相补贴的效果,也就是有些产品会高估,有些产品会低估现象。在产品的生产程序难易度或多样化上也未加考虑,无法提供各产品之正确获利情况,与提供改进之方向,严重地扭曲了各种产品的真实成本,更会影响管理阶层对产品定价等决策错误的决定。作业基础成本制度就是以作业为区分方法,去计算各作业的成本动因与作业数量,来理清成本分摊基础,去除产品的补贴效果,真实的呈现产品成本,减少单位成本过度扭曲的现象。

2. 研究方法的八个标准步骤简单明了 研究中的八个步骤可以很清楚进行的方向,特别适用于中小型企业或作业基础成本制度导入前的教育训练,让管理者容易了解到成本由作业产生,作业是由作业动因作为分摊基础。此次个案公司在进行分析过程中,曾发生需克服作业基础成本的成本数据来源、无人力与时间、收集方法和个案公司上级沟通问题滞碍难行,但经导入国外 Roztocki 等 (2004) 学者的方法让导入作业基础成本制更加简单且容易明白,并大幅缩短

导入的时间与成本,让本研究能继续完成。

3. 本研究增加一个 APD 矩阵可更进一层探讨。利用此矩阵可以展到大类产品的下一阶产品,可以计算出单一产品的制造费用,然后与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外部加工费、包装费全部加总计算后得出单位成本,再和传统成本、标准成本作出比较,提供个案公司管理者的作业成本控制参考,并且对个案公司在价格策略上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与管理。

对于本次个案公司的可行性分析,认为是可以继续导入作业基础成本制,帮助个案公司做精确的成本控制。

本研究经过两阶段成本分析,与使用层级分析法(AHP)的技术,汇总个案公司的产品成本与制造费用关系,进而计算出单一产品的制造费用与单位成本,其贡献有:(1) 个案公司对于产品成本的计算更加准确,并作为绩效管理的基础。(2) 中小企业为导入作业基础成本制的参考依据,尤其是小型制造业。(3) 快速与简单的导入作业基础成本制的个案研究,并作为过渡阶段的方法。(4) AHP 方法可减少许多收集资料的困难性与导入的成本,帮助了解作业成本的归属方向与成本的控制。(5) 该方法提供非常简单清楚的计算过程,将两阶段的费用—作业—产品展开并连结一起,再利用管理者、财务人员与使用者结合组成一“成本中心”小组,对其关联的权重评估后更加准确。

研究限制方面,因个案公司未曾导入作业基础研究,对于此资料的收集只能由现有成本报表中分析出有关作业的成本,虽不能尽其完美,但对日后推行更繁杂的作业成本制度有利观念的改善,减少阻力。再者,因 Roztocki 等(2004)之方法较适合于小型企业(100 人以下员工),所选定的个案公司属于中小企业符合研究条件,且没有导入作业基础成本法的经验,与一直使用传统成本制度,为改善个案公司成本特以此简单有效的方法建立,对该企业有所帮助。本研究所选定为个案公司的海外分公司数据,货币单位以“人民币”为主,至于有关产品名称与成本仅提供研究参考,读者需道德上保密,以保障个案公司的权益。最后,生产流程在每一制造公司都不尽相同,所产生的成本亦不可能相同,本研究是针对个案公司所做的分析,其整个过程方法可作为其他产业的参考,但确实无法完全的套用与运用。

日后可将 ABM 或 BSC 绩效管理制度扩展,达到完整的成本管理。对于本研究的层级分析法(AHP)可以采取其他相关权重技术,提高其关联比率的正确性。

对于本研究方法与实际导入一般作业基础成本制度的差异性比较,实施本研究方法时必须要对参考数据探讨,以作为权重评估重要的指标,更加客观的评估。对于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采用本研究方法的差异性比较,本研究仅对中小型制造业做个案分析,可扩大范围,以其他行业或产业做为研究对象,了解本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 [1] 吴安妮. 由中信银的企业改造解析作业基础成本在台湾金融业之应用 [J]. 会计研究月刊, 1997.
- [2] 欧嘉瑞. ITIS 鼎谈会—我国自行车产业全球运筹策略 [N]. 经济日报, 2004, (33).
- [3] Burch, J. G. 管理会计 (杨振昌译) [M]. 沧海书局, 1996.
- [4] Horngren, C. T. S. M. Datar, and G. Foster. 成本会计—强调管理 (叶金成、颜信辉、罗玫甄译) [M]. 东华书局, 2002.
- [5] Brimson, J. A. Activity Accounting :An activity-based costing approach. Wiley, 1991.
- [6] Cooper, R. The rise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part one :What is an activity-based cost system? [J]. Journal of Cost Management, 1998, (Vol, 2. No. 2) :45 ~ 54.
- [7] Cooper, R. and R. S. Kaplan. How cost accounting distorts product costs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1988, (April) 20 ~ 27.
- [8] Cooper, R. and R. S. Kaplan. Measure cost right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8, (Sept/Oct) :96 ~ 103.
- [9] Cooper, R. and R. S. Kaplan. Profit Priorities from activity based costing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1, (May/june) :130 ~ 135.
- [10] Cooper, R. and R. S. Kaplan. The Design of Cost Mangement System [J]. Prentice-Hall, 1991.
- [11] Greenwood, T. G. and I. M. Reeve. Activity-based cost management for continous improvement : A process design frame [J]. Journal of Cost Management, 1991, (Winter) :22 ~ 40.
- [12] Hardy, J. W. and E. D. Hubbard. ABC :Revisiting the Basics [J]. CAM Magazine, (November) 1992 :24 ~ 28.
- [13] Hicks, D. T. Activing-Based Costing for small and Mid - sized Business :An Implementation guide [J]. Wiley, 1992.
- [14] Kaplan, R. and R. S. Cooper. Cost & Effect :Using Integrated Cost Systems to Drive Profi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J].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 [15] Miller, J. G. and T. E. Vollman. The hidden factory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85, (Spetember) :142 ~ 150.
- [16] O'Guin, M. The Complete Guide to Activity-Based Costing [J]. Prentice-Hall, 1991.
- [17] Roztocki, N. J. D. Porter. R. M. Thomas. and K. L. Needy. A procedure for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activity - based costing in small companies [J]. Enginerring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December) pp :19 ~ 27.
- [18] Satty, T. L. Multi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J]. McGraw - Hill, 1988.
- [19] Turney, P. B. B. Common Cents :The Activity-basd Costing Performance Breakthrough [M]. Cost Technology Published, 1991.

A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 Implementaion ——A Case - Study in Bike Parts Maker

LI ChaoXiong HUANG ShaoYan LIN QiZhen & WANG RunChang
(Chong Cheng University, Feng Jia University,
Providence University, Cho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model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 by Roztocki et al. (2004) , the author tried to analyze the fesibility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in a bike parts maker listed on Taiwan Exchange. And the author also makes good use of costs data from the current finanancial statements of this bike parts to excute the activity analysis by Analytic Hierachy Process (AHP) . It would be helpful to management for analysis of product costs by comparing the overhead costs by Activiy-based costing to the original overhead costs by traditional costing system. This research could be a guideline for a small-scale company that wants to implement the 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 and be ease to adopt the 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 by using actual cost data from a sma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Key words Activity-based costing system Traditional costing system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Sma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论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建立^{* 1}

张世兴^①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

摘 要 会计职业判断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性因素,即使是完善的会计标准也不能消除它。当前我国已进入会计职业判断的重要历史时期,建立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按照我国目前的会计环境设计出台一套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以弥补中、短期内我国会计人员业务素质较低的不足,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会计信息中充斥错误判断的现状,不仅是我国会计改革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会计标准自身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 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职业判断 导引

会计职业判断是在会计准则出现、判断的主体和判断信息的使用者出现分离并且两者之间的利益存在冲突使得会计职业判断有了经济后果性之后才引起广泛关注的。它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程序,广泛存在于会计信息生成的全过程,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因素之一。本文从会计标准和会计职业判断的自身发展规律出发,探讨在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基本趋同的同时,如何建立我国的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构筑会计职业判断的支撑环境。

一、会计职业判断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性因素

关于会计职业判断,目前理论界尚无权威定义。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下的会计准则委员会(ACSC)1988年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调查报告《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中将其定义为“对一个财务报告问题决策的过程被描述成‘会计职业判断’,前提是这个过程是经过分析的,是以经验和知识(包括一个人自身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关的准则)为基础的,是客观地、谨慎地、被完整地执行并充分认识到结果所可能带来的责任。这种职业判断在复杂的、难定义的或动态的情况,特别是准则并不完整的情况下最为有价值,而且通常需要包含

* 本文系张世兴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课题《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与会计标准执行机制研究》(批准号 D4BJZ42)的成果之一。

① 张世兴,男,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向其他专业人士的咨询,结合自己的分析程序共同得出结论。”^[1] 本文认为,会计职业判断应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微观会计职业判断是站在会计主体层面进行的一种会计专业判断,它是指会计人员在日常业务处理中面临不确定情况时,根据会计理论或会计标准,结合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特点,运用职业规则和自身经验,对企业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和最终的财务报表编制等所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等方面进行判断与选择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计人员应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和职业道德,以公允表达、并为决策提供有用信息为最终目标。宏观会计职业判断则是站在国家或地区的层面对一定时期的会计模式、会计标准形式等所作的判断与选择。一般情况下,会计职业判断多取微观之义。本文提到的会计职业判断,仅取此义。

站在会计主体的层面看,会计执业的过程也就是会计判断的过程,会计职业判断贯穿于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其实是一门貌似精确但事实上并不精确的科学,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取舍标准,因此会计过程的最终产品——会计信息多半是主观判断的产物(张为国等,1997)。”^[2] 而不同主体作出的会计职业判断有可能产出不同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说,会计职业判断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最基础因素。这一点从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类别能够印证得十分清楚。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主要包括失实与造假两大类。其中,会计信息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标准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会计信息与经济活动本意之间的出入。这种失实具有当事人无造成失真的主观意愿的特点。而造假则不同,它是责任人为达到某种目的,事先经过周密安排而故意造成的信息虚假。可见,撇开会计故意造成的信息虚假来讲,导致会计信息失实的基础因素是会计职业判断。

二、我国已进入会计职业判断的重要历史时期

西方国家大都很早就认识到了职业判断对会计工作的特殊作用。比如,英国会计准则在序言中指出:“会计准则并非僵硬不变的条文的汇总,它不能取代根据各种信息作出判断的活动。”加拿大在会计建议的介绍中也指出“没有一种规则能适用于所有情况,也没有任何事物能替代职业判断”。相比而言,我国对会计职业判断的认识则是在1993年7月1日“两则”、“两制”实施以后才逐步提出来的。当时,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部适时地对我国的会计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和大行业会计制度等,且会计准则和大行业会计制度等会计标准对某些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都有多种备选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这就为会计人员的

职业判断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和选择空间。由此以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估计为主要内容的会计职业判断问题便跃出水面。

近几年,随着《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实施,我国的企业会计核算标准在形式上“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大同(盖地,2000)”^[3],但国际会计准则是一套以原则为基础的准则,职业判断在准则的执行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能否建立严格的专业判断执行机制在相当大程度上将决定着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进程(王跃堂,2003)^[4]。因此,我国现行会计核算标准的实施,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依赖于会计职业判断。所以,笔者赞同夏博辉同志提出的“当前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首要任务,不是加快会计标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着力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问题(2003)”^[5]。换句话说,随着新的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与实施,目前我国已进入会计职业判断的重要历史时期,根据我国的会计环境,及时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建立我国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1. 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迫切要求有关方面给予会计引导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每个利益集团、每个利益层面、每个利益个体都在追求如何利用会计信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冯淑,2003)”^[6]问题尤其突出,出现了许多“钻会计准则空子、打擦边球、粉饰财务成果”的案例,如银广夏、郑百文、蓝田股份等,无一不是在满足一方利益的同时却极大地危害了社会公众利益。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这种现象,有关部门通过修订相关的会计标准来达到限制或尽可能地避免利用会计职业判断来操纵盈余,但也同时导致了“我国会计实务中大量绕过利润表而直接计入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存在,使境内外净资产差异与境内外净利润差异的相关性很低”^[7],使我国在会计标准国际化的道路上出现了一定的形式与实质上的背离嫌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变换一种视角,针对我国会计环境的特殊性,借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之机,通过建立一套会计职业判断的引导体系,引导会计人员更好地按照既定的会计标准和相关的会计理论、会计核算原则进行选择和处理,从而形成以会计标准为核心、会计职业判断引导体系为辅助的强制与引导相结合的会计核算机制,其效果要比单纯地依靠唯一的会计标准可能会更好。

2. 现阶段我国的会计职业判断主体迫切需要会计引导

现阶段,作为会计职业判断主体的会计人员其综合素质尚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良好、公允的会计职业判断不仅需要会计人员对会计理论体系、会计核算原则及会计核算标准等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而且也需要会计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环境与管理目标有一个透彻切肤的了解。但现阶段我国企业会

计人员的素质却相对偏低,要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短期内具备会计职业判断的相应素质几乎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借助“桥”的衔接原理,通过设计一套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引导会计人员在面临不确定的会计事项时因循导引作出正确的会计职业判断,从而把现行的会计标准与会计实务成功地衔接起来。

3. 建立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符合国际会计标准的发展规律

总结国际会计标准的发展及对会计职业判断的基本态度,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应扩大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二是认为应缩小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种更加符合国际会计标准的发展规律。而仔细回顾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发展历程,都会发现同样的轨迹,即伴随着会计标准的发展,会计职业判断都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尽量遏制、再到正视并鼓励的过程,“这就如同人的成长是一样的道理,当他处于婴、幼儿及少年等无民事行为能力时期,明确的、无弹性的规则是最好的准则;当其成年以后,原则的、有弹性的规则则是最好的准则。但人总要从幼儿、少年长到成年,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而会计准则的发展它也有这样的规律”^[8]。

事实上,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等的发展无一不与这一发展规律相契合。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自 1973 年成立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3 年至 1989 年的主体准则制定阶段。在这一时期,IASC 共颁布了 27 个会计准则。这些早期的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上是罗列了当时发达国家会计实务中流行的有效方法,虽然具有代表性但人们普遍认为它给予会计职业者过分的判断空间,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第二阶段是 1989 年至 1995 年的提高国际会计准则可比性阶段。1989 年 IASC 发起国际会计准则可比性运动,对十项争议较大的准则进行改进,旨在提高国际会计准则的质量,主要是可比性。改进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在某些情况下,对同类交易或事项只允许两种处理方法,即用于通常所有情况的基准处理方法(benchmark treatment)和用于特殊而类似情况的备选方案。这一时期国际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以增强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第三阶段是 1995 年起的制定核心准则阶段。IASC 1995 年与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就制定“核心准则”工作计划达成协议,核心准则分五大类 40 个项目,2000 年 30 个核心准则项目通过 IOSCO 的审核并开始向成员国推荐。核心准则使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提高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实现了质的飞跃。本世纪之初 IASC 改组为 IASB 后,更明确了制定准则的思路。其中包括:(1) 取消基准处理法和备选处理法同时并存的做法,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2) 不再对黑体字与非黑体字段落的准则地位进行区分,以免产生误解;(3) 确立了原则基础的准则制定模式,鼓励专业判断。经过了上述三阶段的发展,国际会计准则现在已经将以原则为基础的制定模式、鼓励会计职业判断

作为他们的优势。正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恩尼沃尔森所说“粗一点、原则一点并不是国际会计准则的错处,反而是它的优势所在,为会计师的职业判断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反之,太细、太具体只能挂一漏万,反而违背了会计准则的初衷。

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作为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第一个制定机构,它所制定的“会计研究公告”(Accounting Research Bulletins)备选方案较多、矛盾较大、可比性不够,留给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也较大。20世纪60年代会计原则委员会(APB)替代会计程序委员会后就开始致力于缩小矛盾、减少备选方案、提出优选方法,尽量削减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但他们的努力受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而一再受挫。70年代开始在财务会计准则委员(FASB)的努力下,GAAP逐渐发展成了今天详细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安然事件让美国以及全世界重新审视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和会计职业判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会计职业判断是一种必要的技术手段,要遏制会计造假,必须正视会计职业判断,引导会计职业判断。所以,美国从2002年也开始着手进行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转换的研究,提出要由规则导向转向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与国际会计准则相“趋同”。

而客观地看,无论是以原则为导向的国际会计准则,还是现行的以规则为导向的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顺利执行都离不开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维护。在以规则为导向的准则体系下,准则制定者希望用繁多的条文规范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消除会计职业者的主观判断,减少诉讼风险和监管难度;但是会计处理方法的多样性、大量例外事项的存在,使详尽的规则永远代替不了会计师在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仍然需要应用大量的职业判断,只是这种判断的焦点不在于抓住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而是在许多复杂例外的情况和互相冲突的应用指南中确定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SEC, 2003)”^[6]。而在以原则为基础的准则体系下,准则制定者并不力图回答所有问题或对每种可能情况均提供详细规则,而是给予会计职业者较大的自主判断空间。如果准则执行过程中缺乏足够的引导,将会导致不同企业在应用上出现差异,从而降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比性。所以,以原则为基础的准则体系的执行同以规则为基础的准则相比会更加离不开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维护。

上述分析表明,纯粹的以规则为导向和与以原则为导向的准则制定模式各有利弊,如果极端地使用任何一种准则制定模式,都存在与此种准则特征相契合的财务操纵行为,而且会片面扩大一方的风险与责任,所以会计执业界与监管者都不希望单纯使用一种导向的准则体系。对此,我们既不苟同“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将占据未来会计准则的发展主流”的观点,也不认可“会计准则规则导向将是一种必然的结果”的说法,而是认为未来会计准则的发展趋势将是混合导向模式。

混合导向具体又有“以原则导向为主、兼顾规则导向”和“以规则导向为主、

兼顾原则导向”两种模式。混合模式的关键是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状态,相对于以规则为导向的准则,它能摆脱大量规则的束缚并能反映交易和事项的经济实质;相对于以原则为导向的准则,它的可操作性更强并能相对减少会计职业判断的范围。鉴于我国会计环境的特殊性,会计从业者整体素质偏低,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会计职业道德水平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会计准则体系刚刚建立完全,尤其是“可用来引导首尾一贯的准则”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尚未颁布,加之会计监管环境和法律环境还不完善,此种情况下,适当数量的规则引导也是对以原则为导向的会计准则的必不可少的补充。所以,综合权衡各种因素,我们认为“以原则导向为主、兼顾规则导向的混合模式”或许是我国当前会计标准制定更为现实合理的选择。事实上,从我国今年2月份发布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采取的基本上也是这样一种思路,只是它更强调“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一面,没有使用“以原则导向为主、兼顾规则导向的混合模式”一词而已。

四、建立我国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基本构想

基于上述几点分析,我们认为,随着我国进入会计职业判断的重要时期,应适时根据我国会计标准改革的进程需要,建立相应的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以构筑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的支撑环境,强化会计标准的执行机制。

1. 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及其理论定位

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是会计监管或会计执业界为引导会计执业者正确理解会计原则、执行会计标准、分析会计交易和事项,从而正确进行会计判断而建立的导引体系,它是会计执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从内容构成上主要包括各种指南、解释、公告和补充等;从发行主体和权威性两方面可分为权威性导引和非权威性导引。

权威性的导引是指会计标准制定机构针对会计标准及实务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和实施的有关解释、指南、问题解答及行业实务等。在我国,会计标准制定机构是财政部,所以权威性导引的制定与实施主体也应该是财政部。权威性导引的内容按层次划分包括:(1)根据准则本身制定的解释和实施指南等。如果我们选择以原则导向为主、规则导向为辅的准则制定模式,那么准则的顺利实施必然需要恰当的解释和实施指南,但又不能像美国那样过于繁多。(2)根据实务中出现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经过谨慎研究和征求意见而发布的公告。“数量有限的指南和解释不可能预见所有的情况,而原则导向为主的准则有时也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会计标准释疑委员会’”(王跃堂,2003)^[10]。当会计实务中出现特殊情况,这种特殊情况又将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具有普遍性时,会计标准释疑委员会就要针对这些情况,广泛收集证据并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公告或其他形式来解释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规范会计处理方法,当然这种公告的数量也需要控制。会计标准释疑委员会应直接隶属

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保证与会计准则制定精神的高度一致性。

非权威性导引主要包括会计行业组织、会计学术团体、企业内部会计机构的会计规定、办法、意见等。主要包括:(1)行业团体根据其行业特点制定的主要适用于行业内部的规定和办法;(2)会计组织机构健全的大型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内部会计核算办法、会计判断程序等;(3)会计学术组织针对某一问题的研究结论及建议等。但这些会计规定、办法和意见等,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仅在相应的范围内具有民间影响。换句话说,它是在会计准则和权威性导引的大前提下的一种执行性延伸,约束的客体具有定向性。

上述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其实质是会计执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延伸和扩展,发挥衔接会计标准和会计实务的桥梁作用,会有利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国际流行的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可表示成:会计目标到会计原则到会计标准。其中,会计原则起到联结会计目标和会计标准的桥梁作用,最终保证会计目标的实现。但会计准则与会计实务之间还缺乏一座桥梁,那就是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虽然会计标准与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都属会计的执行范畴,但毕竟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与会计准则不在同一概念层次上,而是具有前后的因果关系,所以 FASB 把它们不加区分统归于“详细的会计准则与程序”一类有些勉强。有鉴于此,会计准则与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在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中应该分开,把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作为会计准则执行的下一层次来安排,不仅为会计人员将会计标准贯彻到会计实务建立了引导,而且为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2. 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1) 为会计人员提供不确定性会计事项的处理引导程序。当企业会计人员面临不确定性会计事项时,首先判断该事项的性质与类别,然后判断是否存在相关的会计标准规定,若存在相关的会计规定,则根据常规的会计职业判断导引程序进行判断并作出相关的会计处理;若不存在相关的会计规定,则根据特殊的会计职业判断导引程序进行判断和处理。

(2) 为进一步明确会计责任提供了评价的判断标准。由于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建立的依据是会计标准及相关的政策规定,所以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体系为会计人员的责任衡量也会提供一定的标准,按照引导体系进行判断的会计处理行为可视同遵守了会计标准,引发的相关会计责任可以免除;而对于违背引导体系进行的某些会计处理及由此引发的会计责任则不能免除,必须依法处理。

参考文献

- [1] 张为国、徐宗宇. 实证会计. 会计选择. 证券市场 [J]. 会计研究, 1997, (10) 5 ~ 13.
- [2] 盖地. 大同小异. 中国企业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 [J]. 会计研究, 2000, (7) 34 ~ 41.

- [3] 王跃堂、赵子夜. 会计专业判断: 基于盈余信息治理的思考 [J]. 会计研究, 2003, (7) 20 ~ 23.
- [4] 夏博辉. 论会计职业判断 [J]. 会计研究, 2003, (3) 36 ~ 40.
- [5] 冯淑萍. 在 2003 年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Z]. 山东会计动态, 2003, (2) 2 ~ 7.
- [6] 徐经长、姚淑瑜、毛新述. 会计国际协调: 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J]. 会计研究, 2004, (4) 41 ~ 46.
- [7] 张世兴、孙丹等. 从会计准则的未来发展看会计职业判断 [J]. 税务与经济, 2003, (5) 37 ~ 40.
- [8] 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编译. SEC. 对美国财务报告采用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体系的研究 [Z].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 [9] 张世兴、孙丹等. 会计原则标准会计职业判断导引. 会计之友, 2004, (6) .
- [10] 张世兴、高洁. 会计职业判断: 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因素 [N].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03, (2) 41 ~ 45.
- [11] AcSC. Its a matter of judgment [J]. CA magazine, 1989, (5) 54 ~ 57.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Derivation System

ZHANG ShiXing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judgment of accounting is the basic factor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not be canceled even if in a perfect accounting standard.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in the threshold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Its just the time to establish an directing and guiding system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ment. Constructring and issuing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our present circumstances to cover the shortage of the low qualified accountants. It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our accounting reform, but also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Key words distor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ccounting professional judgement derivation

股权分置改革中财务经济学规律探讨^{* 1}

——基于不同对价方式市场反应的经验证据

崔学刚^① 刘婷^②

(北京工商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摘 要 股权分置改革为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务经济学规律提供了宝贵素材。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不同对价方式的市场反应,进而探讨了我国资本市场行为主体的决策规律与定价方式。研究表明,对价公告会引起显著的市场反应,其中送股和综合对价方式会引起较为显著的市场反应,而未发现权证和缩股方式明显的市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权证和缩股方案对市场冲击相对较小,资产重组方案对于 T 族摘帽是一举两得的最优选择。上述发现对于深入认识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务经济学规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财务经济学 股权分置改革 对价方式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许多研究表明,金融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控制着整个金融结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担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并非单纯的“投资融资”,而是信息流通、分散风险、价格发现、并购重组、改善公司治理的一个集合功能,而所有这些功能实现的基本保障是股权的自由充分流动。研究表明资本市场交易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上升 0.083 个百分点 (Atje 和 Jovanovic,1993)。

资本市场在经济中功能的有效发挥大大拓宽并深化了公司财务的研究领域,最终促进了财务经济学的诞生。财务经济学,也称为金融经济学,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是直到 90 年代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财务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投资者与厂商的财务决策问题,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06BJY014)、北京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 (SM200610011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060390351) 的阶段性成果。

① 崔学刚 男,博士后,北京工商大学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财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② 刘婷 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提供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两个方面的经济学基础。布莱恩·克特尔在《财务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我们将财务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财务学和投资管理学中涉及资本市场的那些方面……(它)主要关心投资者在不确定性市场中建立投资组合时如何建立所需要的确定资产价格的模型。”财务经济学的理论对象是同经济中的各类公司的资本结构相对应的“资本市场行为”,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不确定条件下的资本市场行为主体的行为决策;其二,作为资本市场行为主体决策结果的资本资产定价和衍生金融资产定价。

财务经济学的发展对于深入研究资本市场行为主体决策以及公司财务规律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财务经济学家,再度表明了财务经济学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20年来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期望理论、新经济理论、泡沫理论等方面的财务经济学研究成果为各国资本市场与公司财务主体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资本市场尽管建立得较晚,但发展较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创新了公司融资方式,而且促进了财务管理理念与决策规律的创新。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中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割,使得资本市场的功能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扭曲,市场主体的行为及其运行规律相对单一,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财务经济学规律的研究。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了市场基础制度的变革,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控股股东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趋向,股票交易市场的运行环境,市场创新发展的环境,以及市场监管环境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诸多金融工具的出现(如认股权证)与对价实践,使得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变得复杂起来,为探索我国的财务经济学规律提供了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而且深入认识这些规律,对于正确发挥我国资本市场功能,加强资本市场监管,提高市场主体决策行为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将基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方式的市场反应,研究对价过程中的财务经济学规律,以加深对我国资本市场主体的决策规律的认识,并为进一步探讨财务经济学规律提供必要的文献积累。

二、股权分置改革及其对价方式

尽管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然而,股权分置客观上割裂了股东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制度基础;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阻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无法建立有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科学考核标准和有效机理机制的市场基础。股权分置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能更好地体现市场公平原则。大量的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既是上市公司“融资饥渴症”产生的制度基础,又是市盈率虚高、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业绩不断下滑、虚假陈述、关联交易盛行、掏空上市公司等的重要原因。股权分置使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价格发现功能、经济“晴雨表”功能及

投资增值功能“都在全面紊乱、退化”。为此,我国自 2005 年 4 月起开始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并推广到全部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是要让不可流通的股票流通起来,实现真正的同股同权同价。非流通股参与流通会破坏原先的市场预期,造成股价下跌,从而损害原先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而且非流通股成本低,流通后必然获得溢价。因此,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权的同时应该付出代价,也就是向流通股支付弥补对方损失的费用。这项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取流通权所支付的成本叫“对价”。中央及有关部门均发文^①明确在解决股权分置进程中必须贯彻向流通股股东对价补偿问题。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涉及重新划定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利益,而这个过程是建立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市场化协商机制之上,并借此商定非流通股股东获取流通权的条件,也就是要讨论支付对价的方案及对价数量。在这一过程中流通股股东的投票权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

因此,股权分置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对价方案的确定。从我国已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来看,其对价方案体现出了多样化特征,主要包括派发现金、发行权证、送股、缩股、资产重组和综合对价等六种类型。

(一) 派发现金

派发现金是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一定数额现金的对价方式。派发现金包括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直接支付现金或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后非流通股股东将所获得的现金转送给流通股股东。这种对价方式不改变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

(二) 发行权证

权证是指标的证券发行人或其以外的第三人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约定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或出售标的证券,或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差价的有价证券。权证方案比较复杂,根据发行人的不同,权证分为股本权证和备对权证。股本权证是由上市公司发行的,而备对权证是由上市公司之外的发行人发行的。如长江电力对价方案中使用的权证属于股本权证,而宝钢股份方案中使用的权证属于备对权证。根据权证的性质不同,权证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认购权证是一种看涨期权,权证持有人以锁定的价格向权证发行人购买股票;认沽权证是一种看跌期权,权证持有人以锁定的价格向权证发行人出售股票。

(三) 送股

送股是指非流通股股东按照某一比例向流通股股东发放股票,使非流通股

^① 如《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2004)和《关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问题的通知》(证监会,2005)。

每股估值与流通股的价格基本一致,然后非流通股可在二级市场上减持。送股比例取决于非流通股的每股估值与流通股的每股市价,每股估值多以净资产为基础并参考效益指标进行适当调整,也可采取历史还原法、协议转让价、调整后发行价及贴现现金流等多种方法确定。

(四) 缩股

缩股的实质是上市公司以零回购价格,向非流通股股东回购并注销其所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公司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将对应股份予以注销的行为。非流通股股东根据缩股比例,相应减少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非流通股因缩股而使得权益相应增加的部分记入资本公积,由全体股东共享。

(五) 资产重组

已暂停上市、已连续两年亏损、2005 年已预亏或预警公司,如不能顺利通过股改,将面临暂停上市甚至退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部曾发布第七号备忘录称,证监会将把以资产重组作为对价方案的 T 族公司列入审核绿色通道,表示对资产重组方式的认同,但同时这也为非法或违规的资本运作提供了机会,应加强监管。

(六) 综合对价方式

由于上述各种对价方式各存在优缺点,随着股改经验的积累,许多上市公司选择了上述两种或多种对价方式组合,如采取“送股 + 派现”、“送股 + 权证”、“送股 + 资产重组”、“送股 + 缩股 + 派现”、“缩股 + 派现”等对价方式,本文将组合类对价方式称为综合对价方式。

上述对价方式的出现及付诸实践,大大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与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体现出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有规律。因此,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我国资本市场所体现出的财务经济学规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不同对价方式的市场反应

(一)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日在 2006 年 3 月 22 日以前的 202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见表 1。研究数据主要来自新浪网财经纵横版块 <http://biz.sina.com.cn/company/history.php> 以及新浪网中国股权分置改革专网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chinaggzw/index.shtml> 上有关股改实施情况的数据,上市公司股价数据来自国泰安 CSSMAR 市场交易数据库(2006 年版)。

表 1 样本及其对价方式分布

对价方式	送股	发行权证	缩股	派发现金	资产重组	综合方式	合计
样本公司数	175	4	2	1	1	19	202
占样本公司比重 (%)	87	2	1	0.5	0.5	9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通过计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反应来分析对价方式的财富效应及投资主体的行为规律。

本文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日定义为 0 日。由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该日申请停牌,为此统一不把第 0 日纳入各个指标的计算。以 0 日前,即公司股票停牌前的 10 个交易日和第 0 日后,即公司股票复牌后的 10 个交易日,分别构成事件期 $[-10,10]$ 。把 $[-30,-10]$ 作为估计期^①,每只股票的市场风险利用 $[-31,-11]$ 的个股收盘价和深证成指收盘价进行测算。计算步骤如下:

1. 股票日收益率的计算

计算各股票的日收益率 $R_{j,t} = \frac{P_{j,t} - P_{j,t-1}}{P_{j,t-1}} (t = -11, -10, \dots, 10)$ 。

P_{jt} (j 表示公司, t 表示时间) 是交易日收盘价。

2. 市场收益率的计算

本文把深证成指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公告日前后 40 天的波动作为市场收益率,记为,即:

$$R_{mt}, R_{m,t} = \frac{P_{m,t} - P_{m,t-1}}{P_{m,t-1}} (t = -31, -30, \dots, 10)$$

其中, $P_{m,t}$ 指深证成指在第 t 日的收盘价。

3. 超额收益率的计算

本文采用市场模型法,以下式进行回归:

$$R_{jt} = \alpha_j + \beta_j R_{mt} + \varepsilon_j$$

其中 R_{jt} , R_{mt} 分别为个股和市场指数的日收益率, β_j 是股票 j 的收益率对市场指数收益率的回归系数,也即股票 j 的系统性风险。假定 α_j, β_j 在检验期保持稳定,则预期正常的收益率为 $ER = \hat{\alpha}_j + \hat{\beta}_j R_{mt}$, 其中 $\hat{\beta}_j$ 和 $\hat{\alpha}_j$ 是根据估计期数据,用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而得。

4. 计算每日超额收益 AR_{jt}

超额收益是非预期收益,即 $AR_{jt} = R_{jt} - ER_{jt}$ 。

5. 计算平均超额收益率 AAR_t (Average Abnormal Return)

AAR_t 是对事件期内第 t 天各公司超额收益的平均数,

^① 本研究运用了 Excel 作数据的汇总统计,用 SPSS13.0 作实证分析和检验。

$$AAR_t = \frac{\sum_{j=1}^N AR_{jt}}{N}$$

N 为样本数。计算平均超额收益率 AAR_t 可以消除与事件无关因素的干扰。

6. 计算累计超额收益率 CAR_t (Cumulative Average Return)

累积平均超额收益代表该事件对所有公司至第 t 日的总体平均影响,即将事件期内首日 to 第 t 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进行累加,

$$CAR_t = \sum_1^t AAR_t$$

7. 对 AAR 和 CAR 进行 t 检验

若 t 检验值的相伴概率小于或等于一定的显著性水平,则说明 AAR_t 或 CAR_t 显著不为 0,即事件发生对市场有显著性影响,否则对市场无明显影响。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全部样本公司的市场反应

对全部样本市场反应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 AAR 在第 1,2 个交易日均值显著^①为负,第 -8, -7, -5, -4, -3,9 个交易日显著为正,且显著性水平均在 5% 以下。公告日前有 90% 的交易日均值为正,公告日后有 60% 的交易日均值为正。 CAR 在整个窗口期内均显著,公告日前均值全部为正,且一路上扬,公告日由正转负,之后全部为负。说明公告日前市场出现明显的正面反应,股东取得了不断增加的累计超额收益,公告后股价大幅下跌,随后又恢复到正常水平,说明市场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存在明显的过度反应,并且导致公告日后股东的累计超额收益一直维持在 -0.15 左右的水平。因此,整体上看,流通股股东对对价方案存在期望差距,从而导致对价方案公告后的负的 CA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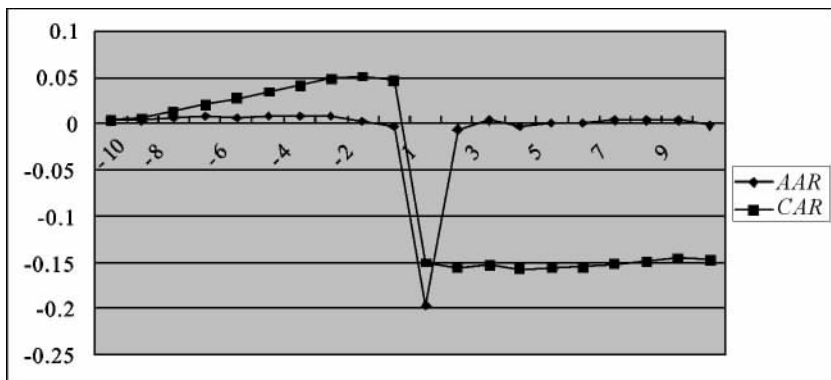


图 1 深市已实施股改上市公司 [-10,10] 市场反应

① 限于篇幅,所有市场反应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文中并未列出,但是在文中会涉及有关文字说明。

2. 不同对价方案的市场反应及分析

(1) 派发现金

样本中只有 G 江铃采用派发现金方式。在窗口期 $[-10, 10]$ 内对 AAR 和 CAR 进行计算^①。如图 2 所示,总体上 AAR 的波幅不大,说明该方式对公布日后的股价影响较小。AAR 在公布日前均值在 0 上下均匀波动,在公布日前后五日均为负,且第 -1 个交易日达到最低 -0.117,虽在第 1 个交易日有所回升,但第 3 日又出现下跌,随后是比前期更大幅度的振荡。CAR 除了第 -10, -3, -2 交易日均值为正外,其他日 CAR 均为负,在第 -1 日呈现大幅下跌,以后就一直在 $[-0.1, -0.17]$ 的低谷上下振荡。

派发现金的对价方式,投资者易于理解,比较容易对对价方案进行评估,其操作相对比较简单,实施程序相对较为容易,投资者愿意接受,尤其是机构投资者愿意接受,因此股改方案比较容易通过。但是,该种对价方式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需要有大量的现金支出,对于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大股东的生产经营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其二,流通股东无法享受到由公司价值升值所带来的好处;其三,流通股东实际获得对价在量上相对较少;其四,其股价容易受机构投资者操纵。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公告日后 AAR、CAR 出现了剧烈震荡,而这些震荡体现了流通股股东对该种对价方式优缺点的逐渐认识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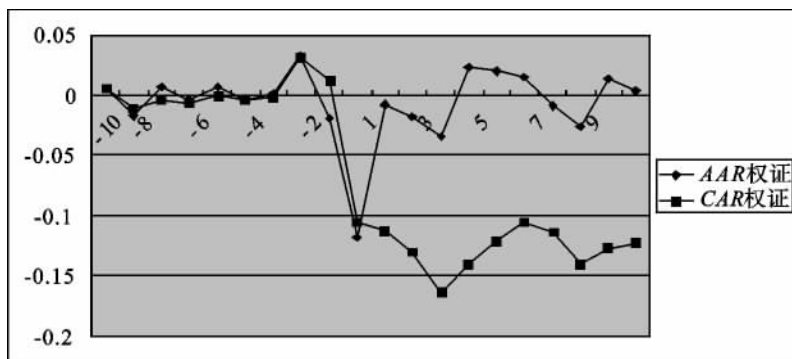


图 2 深市采用派现方式股改上市公司 $[-10, 10]$ 市场反应

(2) 发行权证

样本中有 4 家公司采用权证对价方案,其中 G 华菱和 G 万科使用认购权证,而 G 冶特钢和 G 农产品使用认沽权证。检验结果显示,AAR 在第 -9, -7, -6, -2, -1, 1, 2, 3, 10 个交易日均值为负,但除了第 -9 日较为显著外,都不显著。其他 11 日均为正,不显著。从图 3 来看,第 -2 日以前,均值在 $[-0.0108, 0.076]$ 内小幅波动,公告日前后 5 日,AAR 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下

^① 由于单一派现类方案只有一个样本,方差为 0,无法进行 T 检验,所以仅以 AAR 和 CAR 的均值分布图进行分析。

陷,第1日低至-0.0786,随后,继续在0附近小幅波动,在第9日形成一个明显的波峰。CAR的均值在第-10,-4,-3,-2个交易日为正,其他日均为负。除了第3日显著为负,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负面反应外,CAR在整个窗口期内都不显著。

由于权证赋予流通股股东一种期权,只会在未来权证执行期对股价产生影响,同时权证为流通股股东提供了更有保障的底价,持有人可运用其选择权规避投资风险,因此,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权证可以对国有股进入二级市场起到缓冲的作用。权证延迟了部分可流通国有股的实际上市流通时间,不仅减小了二级市场资金面的压力,而且市场预期股价下跌的幅度不会太大,这样,国有股存量发行的公允价格会相应提高,避免了非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溢出。但是由于其较为复杂,投资者难以把握其未来风险,从而造成谨慎预期,造成了公告后,CAR基本为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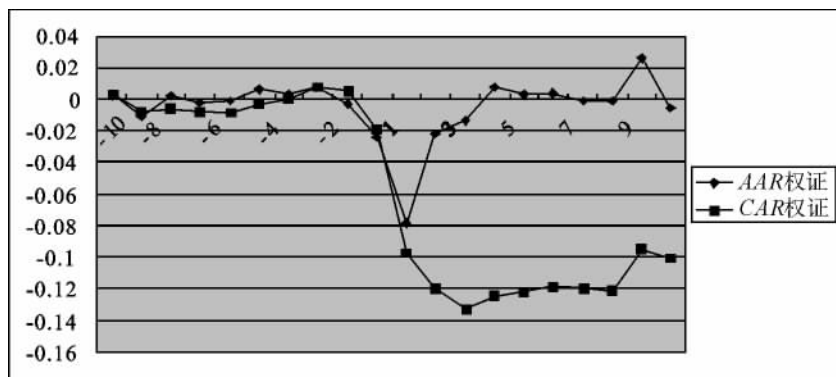


图3 深市采用权证方式股改的上市公司 [-10,10] 市场反应

(3) 送股

该方式可用于解决存量流通和新上市公司的新增存量流通问题,是一次性解决方案。方案简明,具有操作性,易评估效果,可以减少操纵。对于流通股股东,送股可使流通权称为含权股,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持股成本。从市场角度,送股引起的市场除权效应使股票价格重心下移,降低市盈率水平,能增加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投资者对“填权”的预期必将活跃市场交易。但送股可能会直接导致账面每股净资产和每股净收益降低,有损公司形象。非流通股股东虽然不用支付现金,但是送股后,其持股比例将下降,可能导致激励不足的问题(杨建平、李晓莉,2005)。

样本中有175家公司采用了送股对价方案。由于送股公司占总样本数的88%,所以显示出与全部样本极为相似的股价波动曲线和市场反应状况,AAR的变化基本一致,只是在第1日出现更低的负值,且高度显著;CAR除了第-10日外全部显著,且除了第-9日外,均高度显著,即[-9,-1]内累计超额收益

显著为正,公告日之后显著为负。受第 1 日股价大幅下跌的影响,较之全部样本,公告日后 CAR 维持在不到 -0.15 的水平。

以上说明市场对送股方式股改的实施存在更大幅度的过度反应,并且导致公告日后股东的累计超额收益一直显著为负。这可能与送股后直接导致账面每股净资产和每股净收益降低,短期内影响了投资者预期有关;虽然短期引起了过度的市场反应,但股价在公告日之后又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CAR 有向 0 靠近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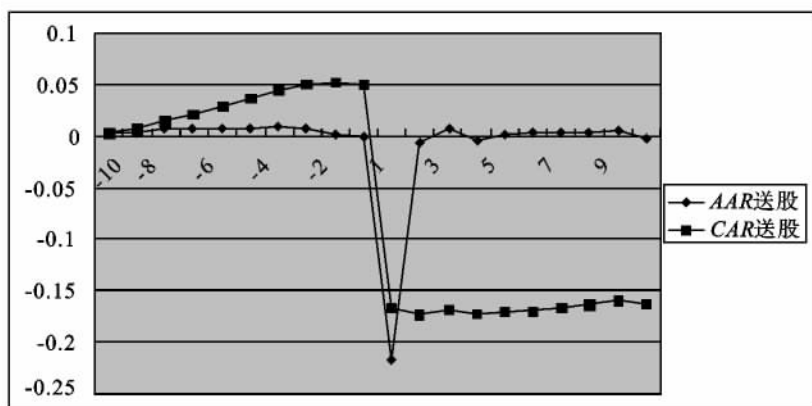


图 4 深市采用送股方式股改的上市公司 [-10,10] 市场反应

(4) 缩股方式

样本中 G 浪奇和 G 福星两家公司采用缩股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窗口期 [-10,10] 内 AAR 在第 -7, -6, -4, -3, -2, 6, 8, 10 个交易日为正,第 8, 10 日显著,第 10 日高度显著。其他 12 日均为负,第 7, 9 日显著。公告日以前 AAR 在 [-0.04, 0.01] 内大幅振荡,与其他几种股改方式市场反应不同,公告日前后均值没有明显起伏,从第 -1 日到第 5 日连续为负,小幅波动,第 6 日起又恢复为大幅振荡。CAR 在整个窗口期内为负,第 -9, 1 日显著,第 1 日高度显著。CAR 从第 -9 日起至第 10 日都与 AAR 无交叠,两条曲线呈喇叭放大状。说明公告日前期和后期股价一直不稳定,但没有出现显著的市场反应,在第 1 日股价并没有剧烈变化,然而 CAR 显示当日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负面反应。

以上分析证明了缩股不会对股市形成大的冲击。经过缩股,一方面,总股本大大缩小,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将大幅提高,有助于形成利好预期,而非流通股股份的缩小。流通股股东将拥有更多的表决权和收益权,可鼓励广大公众投资者投资的欲望。公告日后第 1 日的负面市场反应是市场对股改的一种正常反应,是人们面对无法预期的事件所持有的观望态度使然。缩股对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数量没有任何影响,只改变非流通股在总股本中的比例。缩股是通过缩小非流通股股东权益间接使流通股股东获得补偿,并不针对某个具体的投资

者,真正体现公平原则,克服了直接送股给在册的持有者对原有流通股股东造成的不公平问题。缩股可以极大地减轻股票市场扩容的压力,不需要市场有更多的增量资金。缩股使每股净资产和每股净收益提高,有利于提高公司形象,降低投资风险,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的恢复性增长。但是缩股比例的确定可能引起非流通股股东的极大争议,难以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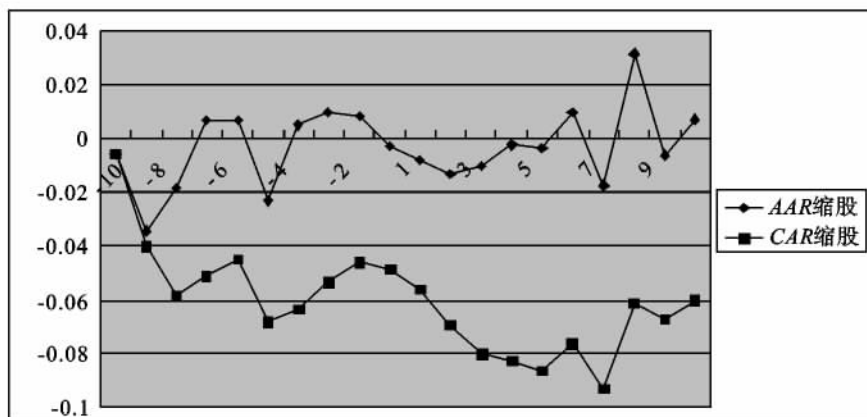


图5 采取缩股方案的上市公司在 $[-10,10]$ 的AAR和CAR及其检验

(5) 资产重组

样本中只有GST环球采用资产重组方式的对价方案。公告日前,AAR在第-8,-3,-2个交易日为正,公告日后第1,2,10日为正,其中,第1日的超额收益率高飙至1.7887,与其他股改方式的市场反应刚好相反,其他日均为负。公告日前,CAR一直为负,并在 $[-0.35,-0.07]$ 内基本呈下降态势,从第1日起,却从-0.3陡然上扬至1.49,并在1.28以上的高位呈缓慢下降趋势,说明在公告的利好消息带动下,累计超额收益保持为正。由于无法进行T检验,无法判断是否出现了显著的市场反应。

资产重组对于长期严重亏损的T族上市公司无疑是进行股改的唯一出路——注入优良资产并可能获得更有能力的控股股东,同时完成资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GST环球的股改方案就是苏宁集团通过收购*ST吉纸控股权,成为其股东,并对*ST吉纸注入经营性资产。从市场反应来看,该举措确实成为利好消息,使得公告第1日股价暴涨,后面10日股东获得了丰厚的累计超额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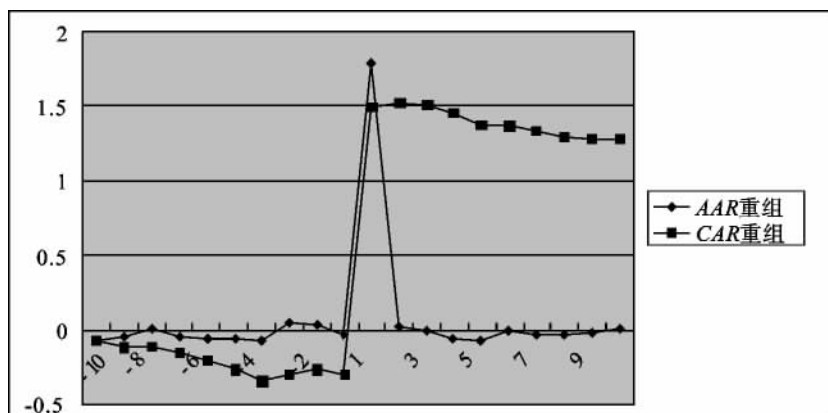


图6 深市采用资产重组方式股改的上市公司 [-10,10] 市场反应

(6) 综合对价方式

样本中有 19 家公司采用综合对价方式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其中有 9 家采取“送股 + 派现”的方式,3 家采取“送股 + 权证”的方式,4 家采取“送股 + 资产重组”的方式,1 家采取“送股 + 注资”的方式,1 家采取“缩股 + 派现”,1 家采取“送股 + 缩股 + 派现”的方式。窗口期 [-10,10] 内的 AAR 和 CAR 显示出与全部样本相似的波动趋势和市场反应状况。AAR 在公告前第 -6, -1 日为负,公告后第 1,2,3,4,6,9 日为负,第 3 日显著,第 1 日高度显著 均值为正的交易日,第 -10, -7, -5, -3,7 日显著;CAR 的均值经 T 检验全部显著,也是公告日前均值为正,公告日后为负。较之全部样本,第 1 日下挫幅度略小,且公告日前在 0 以上上扬幅度更大,而公告日后在 -0.1 附近小幅波动,比后者水平略高。CAR 在公布日前显著为负,而后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对组合方式股改的实施存在显著的过度反应。

综合对价方式充分借鉴各种方式的诸多优点,充分体现“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且,通过对技术参数的控制,可以避免出现明显的套利机会,抑制市场的非正常波动,维护市场稳定。组合方式体现证券市场的金融创新,可以提高投资者的主动性。对上市公司来说,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市公司业绩稀释的风险,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造成较大的压力。由于这 19 家公司的股改方案有 18 家采用的是以送股为主的股改方案,所以引起了相似的市场反应,这样,综合对价方式虽然也会引起市场反应,但是正面反应比送股方式大,而负面反应比后者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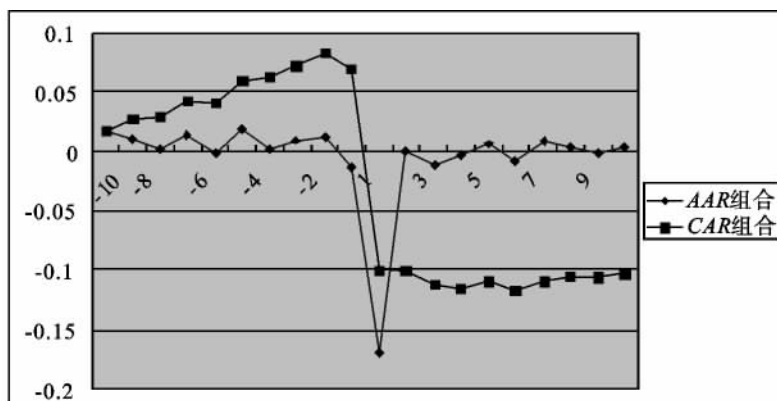


图7 深市采用组合形式股改 [-10,10] 市场反应

3. 各种对价方案市场反应的比较

我们把股权分置的六种对价方式的市场反应进行对比,如图8和图9所示,送股和组合方案的AAR和CAR显著,权证和缩股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市场反应,派现和重组方案因无法实施显著性检验而无从判断。各种方式下,在 $[-10, -1]$ 和 $[2, 10]$ 日平均超额收益都在0附近小幅振荡,在公告日前后,派现、权证、送股、重组、综合对价方式下的AAR都出现明显波动,除权证外都表现出显著的市场反应,只有缩股方式下的AAR没有明显的变化。在具体时点上,除派现方式是在第-1日提前反应外,另四种都是在第1日反应而与众不同是,重组方式表现出显著的正面反应,而其他五种都是负值,且送股和重组表现出高度显著的负面反应。除了缩股方式在整个窗口期的CAR都为负值之外,其他五种方式的CAR在公告日前后显示为正负相反,其中,重组方式的CAR公告前为负后为正,且前期下跌和公告期上扬的趋势都非常明显,在六种方式下CAR的数值中,重组方式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占据了最大值和最小值。另外四种的CAR都是前正后负,且呈现缓慢累进的态势,四种方式的累计超额收益差距不大,前期组合方式的CAR较高,后期送股方式的CAR较低。

各种方式股改方案实施的市场反应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都对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产生反应,特别是在公告日前后,反应最为强烈,且多为负面反应,说明投资者对股改影响市场的后果还持观望态度。经过公告日的变动之后,股价又会恢复到公告日前的水平。这说明投资者对股改方式的认识迅速得到提高,逐步区分了各种对价方式的财富变化,从而使得各种对价方式体现出不同的市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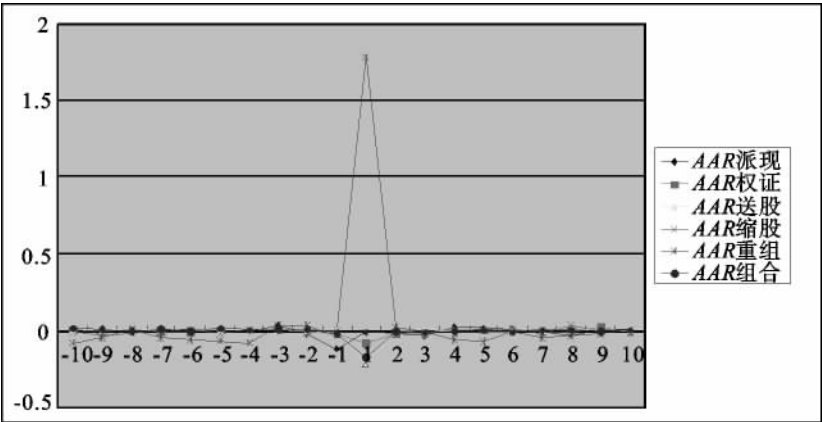


图8 深市各种股改方式 [-10,10] AAR 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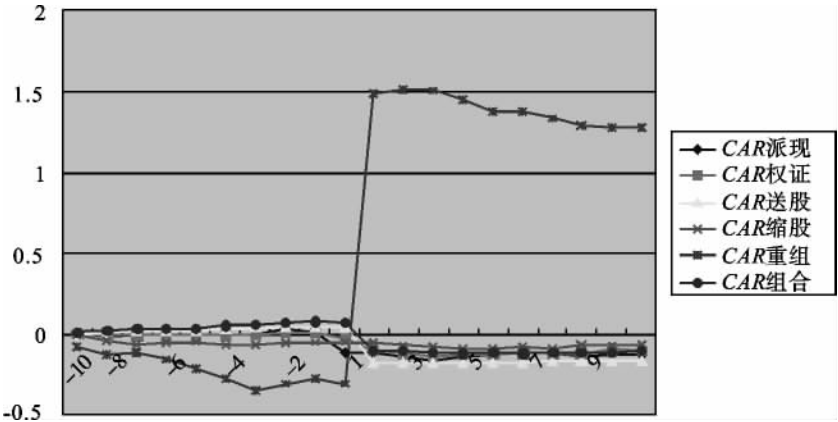


图9 深市各种股改方式 [-10,10] CAR 比较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股权分置改革大大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行为类型与运行规律,也为研究财务经济学规律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研究需求,深入研究这些规律对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加强市场监管,提高市场主体决策行为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财务经济学中的经典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研究了深市 202 家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行为所体现的财务经济学规律。

研究发现,202 家总样本在股改实施公告日前市场呈显著的正面反应,公告时股价大幅下跌,此后股东的累计超额收益一直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存在明显的过度反应,也体现了流通股股东对对价方案存在明显的期望差距。六种方案实施公告时,都会引起累计的非正常报酬,且除

发行权证外都显著,缩股方式市场反应显著但股价并未发生剧烈下跌;送股和综合对价方式造成市场明显的过度反应,而发行权证和缩股方式没有出现明显的市场反应;送股和以送股为主的综合对价方式是上市公司对价的主流方式,子样本所占比例高达 95.5%,由此导致这两种方案与总样本的股价变化趋势和市场反应高度一致,且较之其他方案,这两种对价方式都造成累计超额收益在公告前后大幅变化;资产重组方式显示出与其他方案相反的市场反应,即在公告时股价大幅飙升,公告前超额收益为负,公告后为正,且正负的幅度最大,说明资产重组方式的股改方案对于 T 族摘帽是一举两得的最优选择,进而说明了对价方案如果能够有利于上市公司价值的提高,会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

从短期看,发行权证和缩股方式对市场冲击相对较小,资产重组方式的股改是长期亏损公司扭亏为盈的契机,实践与理论预期一致。上述结论对于初步探讨我国财务经济学规律具有借鉴意义。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财务经济学规律的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扩大研究样本,对着重研究股权分置改革的中长期效应,尤其是对股权分置后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公司治理效应、价值发现功能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崔学刚. 上市公司重组绩效:理论与实证研究 [M]. 中国人民大学 04 级博士论文,2004, (8).
- [2] 崔学刚、荆新. 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预测研究 [J]. 会计研究,2006 (1).
- [3] 丁志国、苏治、杜晓宇. 股权分置改革均衡对价 [J]. 中国工业经济,2006 (2).
- [4] 寇文峰. 股权分置改革实务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9).
- [5] 李振明. 股权分置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 [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1).
- [6] 吴晓求. 股权分置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 [J]. 财贸经济,2006, (2).
- [7]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5 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 [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7).
- [8] 2005 - 2006 年上市公司股价数据 [DB]. <http://biz.sina.com.cn/company/history.php>.
- [9] 中国股权分置改革专网 [DB].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chinaggzw/index.shtml>.
- [10] Ball R. and Brown P.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68.

The Rule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in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of Market Reactions to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Methods

CUI XueGang & LIU Ting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supplies material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rule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in capital market of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market reactions to different methods of consideration by using standard event study methodology. Furtherly, the law of decision and pricing methods of the behavior entity in our capital market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announcements of consideration cause significant market reactions, of which the methods of presenting shares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cause more, while we find little for the methods of issuing warrants and reduction shares. Thus, in some sense, we conclude that the methods of issuing warrants and reduction shares influence capital market weakly, and the method of assets reorganization seems to be the best choice for ST companies to "uncap". The above results do have good inspira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la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in capital market of China.

Key words financial economics ;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 the method of consideration

股权分置改革 程序公正、参与和回报^{* 1}

张继袖^①

(南开大学商学院)

摘 要 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诸多改革都涉及利益分配,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对于评判改革的成败是相当重要的。本文从流通股东角度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的程序公正、流通股东参与股改及其回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大样本情况下,流通股东在参与股改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提高流通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可以改善流通股东参与股改的热情进而改善其回报。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 股权分置改革 程序公正 参与 回报

引言

在国外,法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管理学中有很多关于程序公正的研究。但是在我国,对程序公正问题的研究多见于法学和心理学中,在管理领域较少。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总是认为财富多比少好。但是,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最大意愿分配资源,这样,分配公正就相当重要。分配公正实质上是结果公正(Adams,1965)^[1],也是公正领域最初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分配公正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的特点,而程序公正具有确定性的特点。Thibaut 和 Walker (1975)^[2]认为个体重视公正的程序,因为当他们不可能直接控制决策时,程序公正提供了对决策间接控制的手段。即使特定的决策对个体产生不利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公正的程序能保证个体,得到从交换关系中应得的部分。本质上,公正的程序允许个体感受到他们的利益从长期来看得到了保护(Lind 和 Tyler,1988)^[3]。

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今天研究股改过程中的程序公正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股改中的程序是否公正及流通股东理解程序是否公正对股改的顺利进行、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意义重大。股改提出要以程序

* 本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号 70232020 与 70472051)

① 张继袖 女,辽宁阜新市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公司治理的研究。

公正来保证结果公正,评判股改成败的标准也许很多,但广大流通股东对股改程序是否公正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评判股改成败的标准之一,因为广大流通股东认为自己很少有能力控制结果,他们渴望通过程序公正保证自己的利益。所以,基于流通股东视角研究程序公正、参与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进行资本市场改革都是有意义的。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 程序公正的含义

1975年, Thibaut 和 Walker 发表了他们经典的专业论文——《程序公正: 心理学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争论者(和未卷入其中的当事人)经常关注过程的公正和关注结果的公正一样。这就促使了对程序公正进行实质性的研究,部分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有趣,还因为它似乎对设计和实施争端解决机制有重要的作用。

Thibaut 和 Walker (1975) 区分了“客观的”和“主观的”程序公正,前者是依据一些标准化的准则对程序的评价,后者是依据感知的公正而进行的评价。这两种评价程序的方式在理论上是互相独立的: 一种程序,客观上公正可以被理解为不公正,同样,一种程序,客观上不公正可以被理解为公正。Thibaut 和 Walker 的程序方法本质上是心理学的方法: 人类行为被看作是一种工具,通过这种工具行使程序,评价主观公正的维度包括态度和暴露在程序面前的人们的理解。

Folger 和 Konovsky (1989)^[4] 总结出组织中关于公正的关键区别,认为“分配公正指被理解的雇员收到补偿数量的公平,程序公正指被理解的用来决定这些数量的手段的公平”,并且指出研究显示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Lind 和 Tyler (1988)^[5] 研究发现,分配公正对于预测特定的、个体的结果,像案例裁决,优于程序公正。然而,当人们产生更一般的对法律制度或对它们代表的评价时,程序公正优于分配公正。

程序公正与下属对上级用来评价他们的业绩、交流业绩反馈和决定他们的报酬如提升和加薪,所使用的所有过程的公平性的理解有关 (McFarlin 和 Sweeney, 1992)^[6]。当下属理解组织程序和过程公平(不公平)时,高(低)水平的程序公正发生了。根据 Lind 和 Tyler (1988)^[5] 的观点,程序公正关心雇员是否相信程序和结果是公平的,而不是程序和结果在某种客观意义上是公平的,即程序公正是个主观概念。

(二) 程序公正和回报的关系

我们这里所指的回报是流通股东在资本市场上的回报,通俗地讲就是流通股东在资本市场的个股上是否赚到钱了。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市场反应方面的研究,探讨流通股东整体是否在股改中获得了回报。但是,我们是通过问卷的方式得到个别流通股东在股改中是否得到了回报及得到多少回报的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回报是“主观”回报——流通股东认为自己获得了回报。由于没有专门文献研究程序公正和回报的关系,我们只能借助于管理领域程序公正和个人报酬的有关研究。

Tang 和 Sarfield - Baldwin (1996)^[6]认为“如果经理能够适当地和一贯地对所有雇员使用基于业绩和价值给予报酬的规则,并且没有个人偏见,那么雇员将有一个积极的程序公正的理解,这将导致较高的满意度、组织承诺(对组织忠诚)和参与组织事务。”然而,Lind 和 Tyler (1988)^[3]则认为工作业绩和态度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他们认为业绩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期望任何态度变量——包括程序公正的判断,对业绩有简单的影响都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同样认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决定流通股东报酬的因素很多,流通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实证方面,程序公正和绩效之间的证据也是有冲突的。例如,Earley 和 Lind (1987)^[7]发现程序公正对与之有关的绩效有正向影响;Kanfer 等 (1987)^[8]发现程序公正判断和项目业绩之间有反向关系。Cornelius (1985)^[9]发现有混合的结果,而 Lindquist (1995)^[10]发现没有显著结果。Lau 和 Lim (2002)^[11]发现程序公正对绩效的影响比简单的直接关系更复杂,程序公正通过参与这个中间变量间接影响绩效。

管理领域关于程序公正研究已经显示出程序公正影响分配公正,某种程度上也会保证结果公正,而回报是分配的一部分,也是结果的一部分。借鉴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可以推测: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中的程序公正和流通股东回报之间有关系。所以,我们假设:

H1 流通股东对股改程序公正的理解对流通股东回报有正向影响。

(三) 程序公正和参与的关系

程序公正是参与的前因,这个结论在管理领域已有一定的基础。认为程序公正作为参与前因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认为程序公正重要的组织允许下属参与预算。成功的管理者能够意识到下属关注工作场所使用的程序的公平性(Lind 和 Tyler,1988)^[3]。让下属尽最大努力地提高业绩是管理者的责任,管理者要确保组织中使用的程序和过程被下属认为是公正的,即管理者要对维持工作场所的公正负责(Joy 和 Witt,1992)^[12]。

研究证据显示,公正的程序对程序偏好和程序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

外的大量研究都显示,被理解的程序公正是程序偏好和程序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Lind 和 Tyler (1988) [3] 认为公平很可能是程序偏好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承诺保持高程序公正的组织可能选择本质上有人参与的程序。相反,认为保持程序公正不重要的组织很可能选择参与率低的程序。这意味着程序公正是预算参与的前因。

借用管理领域的研究结论到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流通股东对程序(不)公正的理解是他们参与股改投票的前因。上市公司希望向社会公众展示公正,从根本上讲应该选择有人参与的程序,我国此次股改提供了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两个场所,两个场所都有一定的投票数量。当然,流通股东的参与是有不同目的的,但毕竟反映出他们对问题的关注,对过程的重视。在大量的网络文章中,我们发现,很多流通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对价方案或程序不满意而号召其他流通股东参与投票。所以,我们假设:

H2 流通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对其参与股改的程度有正向影响。

(四) 参与和回报的关系

在组织领域的研究中,Greenberg 和 Folger (1983) [13] 认为参与能够导致业绩的提高是因为:(1) 参与能够使下属和上级交流他们想要的东西;(2) 参与允许下属进行选择,并且选择的方案可以使下属承担义务和对选择的僭越责任。这意味着参与和管理业绩之间存在正的关系。

参与作为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交流的一种手段,不仅仅与股改相关事件有关,而且与其他双方都关心的事件也有关。它允许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交换信息并从非流通股东那里寻找信息,结果导致流通股东对更多的股改过程和其他企业事务的了解。参与允许流通股东影响股改方案,使方案更符合实际情况和广大流通股东意愿。流通股东可能更愿意接受自己参与过的方案,而不是由其他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方案。这样,流通股东对股改会有积极的预期,会促进市场交易,进而影响流通股东回报。所以,我们假设:

H3 流通股东参与股改的程度对其回报有积极的影响。

总之,程序公正向流通股东传递了企业希望股改顺利进行的信号。流通股东对股改程序公正的理解与其参与股改的程度及流通股东的回报存在正向关系,参与股改的程度与回报也存在正向关系,这意味着程序公正对流通股东回报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参与企业事务而间接进行的。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研究流通股东对股改程序公正的理解及参与股改的程度,要涉及到人的态

度与行为问题,所以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被调查对象是持有股票的广大中小流通股股东,不包括机构投资者。被调查的流通股股东所在城市涉及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南京、郑州等十几个城市。大部分问卷采用的是打印稿形式,少数问卷以邮件形式完成。打印稿形式的问卷共发出 460 份,截止到本文写作时收到 225 份,剔除不能使用的 39 份,可利用问卷 186 份,收到邮件形式的问卷 72 份,可利用的 57 份。可利用的问卷合计 243 份,涉及的上市公司共有 399 家(其中 139 家有两个以上的流通股股东回答问卷,我们采用均值代表流通股东对问题的回答)^①。

(二) 测量工具

问卷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形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问卷题目及有关符号表示见表 1。

1. 程序公正

本文根据 Leventhal (Leventhal, 1980^[14]; Leventhal 等, 1980^[15]) 提出的可能影响程序公正理解的五个准则和 Greenberg (2004)^[16] 提出的组织程序公正的四个来源设计了六个程序公正项目,要求应答者回答他们在股改中的发言权、股改过程对所有人的公平性等等。在本文中,我们用 proj1 到 proj6 表示。通过汇总流通股东对六个项目的回答形成样本的程序公正的衡量。Cronbach α 值为 0.87,表明了较高的内部效度。采用因子分析仅提取一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总的被解释方差为 61.22%,支持测量工具一维的性质。

2. 流通股东参与程度

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测量流通股东参与股改的情况,在文中我们用 pt1 和 pt2 表示。通过汇总流通股东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形成样本的参与程度的衡量。Cronbach α 值为 0.84。采用因子分析仅提取一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总的被解释方差为 86.15%,支持测量工具一维的性质。

3. 流通股东感知的回报

我们的问卷只一个问题测量回报这个变量,假设没有测量误差。

(三) 研究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简称 SEM), 它是一种综合性统计分析技术和模型方法,能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并容许更大弹性的测量模型,可以同时估计因子结构和因子关系并比较和评价不同的理论模型,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 (侯杰泰等, 2004)^[16]。

根据研究假设,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简图如图 1 所示。

^① 剔除数据缺失 50% 以上的问卷和对所有问题都回答 1 或 5 的问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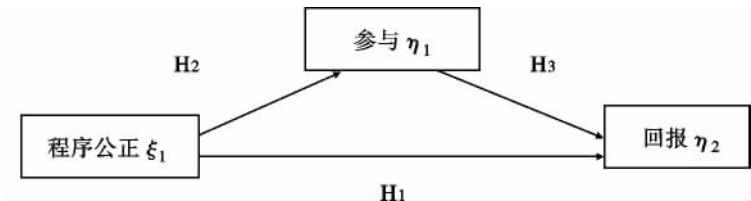


图 1 程序公正、参与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图

两个结构方程^①为：

$$\eta_1 = \gamma_{11}\xi_1 + \zeta_1 \quad (1)$$

$$\eta_2 = \beta_{21} + \gamma_{21}\xi_1 + \zeta_2 \quad (2)$$

其中： η_1 是内生潜变量，表示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 η_2 是内生潜变量，表示流通股股东感知的回报； ξ_1 是外源潜变量，表示程序公正； ζ 是结构方程的残差项，其他变量为系数，如 γ_{21} 表示外源潜变量 ξ_1 对内生潜变量 η_2 的影响，以此类推。有关变量类型及符号表示见表 1。

表 1 量表设计及符号表示

变 量	变量类型及符号表示	问卷题目 (指标)	符号表示
程序公正	外源潜变量, ξ_1	1. 股改程序对您和其他人是平等的	proj1
		2. 管理者在股改中没有既得利益	proj2
		3. 股改方案是依据正确信息制定的	proj3
		4. 您在股改中有发言权	proj4
		5. 股改程序符合您的道德标准	proj5
		6. 总体上该企业的股改程序是公正的	proj6
参与股改程度	内生潜变量, η_1	1. 您会参与该企业的股东交流会	pt1
		2. 您会参与该企业的股改投票	pt2
回 报	内生潜变量, η_2	1. 您在该股票股改中赚到钱了	return

三、实证结果

(一)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提供了有关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其中 Panel A 提供了指标 (或问题)

^① 由于本文的测量指标有 9 个,所以就产生 9 个测量方程,限于篇幅,作者在此不提供具体的测量方程。

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Panel B 提供了量表 (或因子) 的均值、标准差、Cronbach α 值和相关系数等。从 Panel A 的结果可以看出,取样的流通股东对股改的参与程度不是很高,均值不到 3,与股改参会率低的现状是相符的 ;流通股东感知的回报均值大于 3,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股改使股票市场焕发了生机,使部分流通股东“解套” 程序公正各指标的均值大体在 3 附近,说明取样的流通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基本上在中间水平。Panel B 提供的 Cronbach α 大于类似研究推荐的可接受信度水平 (0.70),略优于国外有关程序公正研究的信度水平。回报是单指标潜变量,无法使用 Cronbach α 测量其信度。量表和指标的相关系数均显著。

表 2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Panel A 指标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pt1	pt2	return	proj1	proj2	proj3	proj4	proj5
参与程度	pt1	2.723	1.214	1.000							
	pt2	2.914	1.245	0.723	1.000						
回报	return	3.127	1.139	0.366	0.383	1.000					
程序公正	proj1	3.029	0.985	0.255	0.288	0.407	1.000				
	proj2	2.847	1.071	0.299	0.227	0.243	0.493	1.000			
	proj3	2.994	0.995	0.301	0.306	0.416	0.594	0.526	1.000		
	proj4	3.004	1.068	0.405	0.371	0.225	0.482	0.344	0.472	1.000	
	proj5	2.962	0.940	0.326	0.390	0.426	0.623	0.393	0.592	0.528	1.000
	proj6	3.065	0.988	0.325	0.400	0.533	0.646	0.420	0.628	0.502	0.698

注 所有的相关系数均在 1% 水平下显著。

Panel B 量表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等统计量

因子或潜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指标数	Cronbach α	参与程度	回报
参与程度	5.64	2.28	2	0.84	1.00	
回报	3.13	1.14	1		0.44	1.00
程序公正	17.90	4.70	6	0.87	0.51	0.54

(二) 测量模型结果

表 3 提供了测量模型 (验证性因子分析) 的一些统计量,即指标与因子之间的完全标准化的因子负载和误差方差。因子负载是指标对因子的回归权数,通常越大越好。如果因子负载太低,说明这一指标不属于该因子。表 3 提供的数
据中,proj2 的因子负载是 0.56,proj4 的因子负载是 0.62,说明相比其他问题,

用程序公正解释这两个问题不是很理想,但总体上因子负载都不低并且显著。

除了表 3 提供的数据外,测量模型的 χ^2 等于 109.75,自由度为 25, $P < 0.001$,RMSEA 等于 0.092,NFI 拟合指数等于 0.96,NNFI 拟合指数等于 0.96,CFI 拟合指数等于 0.97,这些指标显示出测量模型拟合得较好,只是 RMSEA 有些偏大。Steiger (1990) [6] 认为 RMSEA 低于 0.10 表示好的拟合,低于 0.05 表示非常好的拟合,低于 0.01 表示非常出色的拟合。

表 3 测量模型结果

指标	所属因子	因子负载	测量误差	指标	所属因子	因子负载	测量误差
pt1	参与程度	0.82	0.33	proj1	程序公正	0.77	0.40
pt2		0.88	0.22	proj2		0.56	0.69
				proj3		0.76	0.42
return	回报	1.00	0.00	proj4		0.62	0.62
				proj5		0.81	0.35
				proj6		0.84	0.29

(三)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表 4 提供了利用结构方程估计的饱和模型(图 2)、直接模型(图 3)和间接模型(图 4)的主要统计量和模型对比情况。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统计量和模型对比

模型	卡方	自由度	NFI	NNFI	CFI	RMSEA	模型对比	卡方之差	自由度之差
饱和模型 M1	109.66	25	0.96	0.96	0.97	0.092	1vs.2	15.21	1
直接模型 M2	124.87	26	0.96	0.95	0.97	0.11			
间接模型 M3	167.94	26	0.94	0.93	0.95	0.12	1vs.3	58.28	1

注 直接模型和间接模型不能对比,因为它们是非嵌套关系。

表 4 的数据显示,三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基本要求,模型拟合得较好。M2 与 M1 对比,增加了一个自由度,卡方却增加了 15.21,应保留 M1。M3 与 M1 相比,增加了一个自由度,卡方增加了 58.28,应保留 M1^①。对于其他拟合指标,M1 也略优。我们认为饱和模型优于直接模型($\chi^2_{diff} = 15.21, P < 0.05$)和间接模型($\chi^2_{diff} = 58.28, P < 0.05$),同时支持我们的假设 1 到假设 3,是合适的模型。这些分析显示偏中介模型(预测变量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提供了

^① 侯杰泰等(2004)认为,对于嵌套模型,自由度增加 1,卡方增加的部分小于 6.63 ($\alpha = 0.01$ 时卡方的临界值),则认为简化是值得的。

数据的最好的拟合。图 2 ~ 图 4 显示了三个模型及其未标准化系数和 t 值 (括号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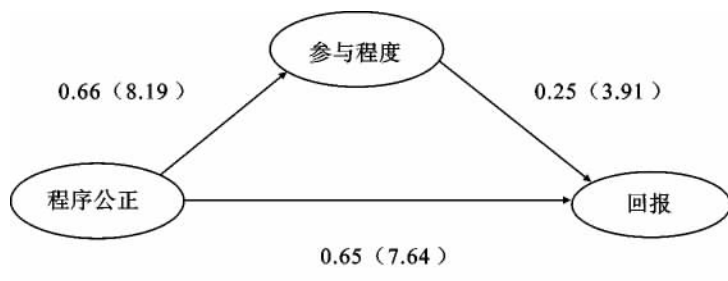


图 2 饱和模型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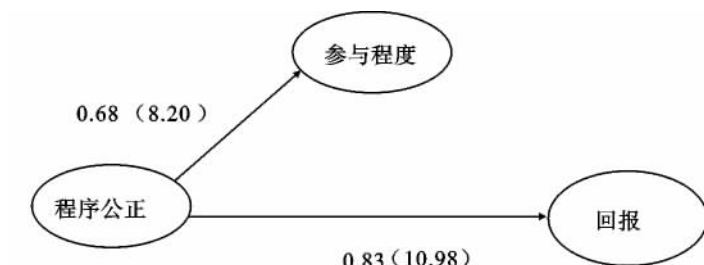


图 3 直接模型 M2



图 4 间接模型 M3

根据饱和模型我们得到结构方程：

$$\text{参与程度} = 0.66 \times \text{程序公正} + \zeta_1 \quad R^2 = 0.26 \quad (1)$$

$$\text{回报} = 0.65 \times \text{程序公正} + 0.25 \times \text{参与程度} + \zeta_2 \quad R^2 = 0.33 \quad (2)$$

从方程 (1), 我们发现, 程序公正对参与程度有着正向影响, 流通股股东感知的程序越公正, 其参与股改的热情越高, 越有可能参与股改投票、参与股东交流会。所以, 要提高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事务, 需要提高流通股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 至少客观上要保证程序公正。

在方程 (2) 中, 程序公正和流通股股东参与程度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但前者大

于后者,说明前者对流通股东感知的回报影响更大。图 4 的间接模型也说明了参与程度对回报的作用低于程序公正对回报的作用(图 3),程序公正对流通股东的回报更是显著。所以,提高流通股东对股改程序公正的理解对于使流通股东感知结果满意是非常重要的,也间接验证了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关系。

表 5 提供了饱和模型的因果关系分解。从表 5 可以看出,程序公正对流通股东回报的总作用是 0.81,其中,通过参与的间接作用是 0.17(t 值是 3.68, $P < 0.01$),可见参与发挥了中介作用;参与程度对回报的直接作用是 0.25。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在股改中,提高流通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可以提高其感知的回报,其中一部分是程序公正对回报的直接作用,另一部分是程序公正通过参与股改事务的间接作用;在股改中,提高流通股东的参与程度也会提高其回报水平,所以,对于流通股东而言,关心企业事务对提高其自身报酬是有用的,要珍惜自己的权利,拿出自己的热情,毕竟股改是所有股东的事情,更何况股改与流通股东的报酬是息息相关的。

表 5 饱和模型的因果关系分解

变量	作用类型	符号	系数	t 值
程序公正	直接作用	γ_{21}	0.65	7.64
	间接作用	$\beta_{21} \gamma_{11}$	0.17	3.68
	总作用		0.81	10.74
参与程度	直接作用	β_{21}	0.25	3.91

注:作用类型所在列是指对流通股东回报的作用; t 值大于 2 表示显著。

(四) 参与的中介作用检验

在提出假设时,我们考虑了参与的中介作用,下面需要检验成为中介变量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通过直接模型的路径系数,我们发现预测变量与中介变量相关,即程序公正与参与程度相关。因此,参与中介了程序公正的效应。第二,在间接模型中,参与和因变量(回报)存在显著的关系。第三,通过检查饱和模型中程序公正的路径系数,我们发现当包括中介变量时,程序公正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有实质性的减少(0.83 到 0.65)。所以,我们认为参与是程序公正对回报的中介变量。但是,在饱和模型和直接模型中,程序公正对回报的直接作用都是显著的,说明参与没有完全中介程序公正的影响。然而,在饱和模型中,程序公正对回报的间接效应(通过参与程度的路径系数是 0.17)也是显著的。这些结果意味着参与程度部分地中介了程序公正对回报的影响。

(五) 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取样中有的上市公司只有一名流通股东回答问卷,为了避免由于

被调查者原因引起的样本偏差,我们对有两名以上流通股股东回答问卷的公司(共 139 家)再次进行了检验。模型整体上拟合得较好,卡方为 62.37 ($P < 0.01$),自由度是 25,NFI 是 0.96,NNFI 是 0.98,CFI 是 0.98,RMSEA 等于 0.10。程序公正对参与的总效用是 1.13 ($t = 6.98$) 程序公正对回报的总效用是 1.12 ($t = 7.35$),间接效用是 0.20 ($t = 1.59$,不显著) 参与对回报的总效用是 0.18 ($t = 1.61$,不显著)。这说明假设 3 没有得到完全支持,参与和回报之间的系数符号与假设相符,但系数不显著。两个结构方程如下:

$$\begin{cases} \text{参与程度} = 1.13 \times \text{程序公正} + \zeta_1 & (3) \\ \quad t = 6.98 & R^2 = 0.43 \\ \text{回报} = 0.92 \times \text{程序公正} + 0.18 \times \text{参与程度} + \zeta_2 & (4) \\ \quad t = 4.76 & t = 1.61 & R^2 = 0.41 \end{cases}$$

对于参与和回报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可能的解释一是样本量较少;二是可能与股改的实际情况有关。股改是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推动了新一轮的行情,股指上扬,即使流通股股东不参与股改事务也会顺着股改东风而解套;三是可能由于流通股股东普遍存在搭便车行为,参与企业事务的热情不高,导致参与程度偏低,而回报有客观的成分在内,致使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换句话说,决定回报的因素有很多,我们根据理论考虑了流通股股东参与企业股改这个变量,在小样本下,这个变量表现不显著。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样本量。

四、结论和建议

(一) 本文结论

本文调查了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下的程序公正、流通股股东参与及其回报之间的关系。把程序公正问题的研究扩展到我国资本市场背景下,验证了程序公正理论,同时也检验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程序公正与流通股股东回报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过程体现的,参会率过低很可能是程序公正方面出了问题。

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本文提出的假设 1 和假设 2,即流通股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影响其回报和流通股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影响其参与股改的程度,在两个样本检验下都成立。假设 3 只在大样本条件下成立,增加样本量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的方面。

第二,在大样本下,我们发现了参与的中介作用。这说明,在股改中,流通股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通过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事务影响回报,所以提高程序公正一方面可以激发流通股股东参与企业事务,发挥企业主人意识,另一方面可以改善自身回报,进而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发展。

第三,程序公正是流通股东参与股改的前因,股改的参会率低的原因可能是程序方面出了问题。这个结论部分地解释了我国股改参会率低可能缘于频频出现的“投票门”事件(程序不公正)。

这些结果对于广大中小流通股东是重要的。流通股东要积极主动发挥自己的权利,提高参与意识,要认识到自己是股改的当事人、社会的一员,应该积极参与企业事务,参与社会事务,因为他们的努力有可能使股改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有可能使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更加光明的明天。

这些结果对于上市公司也是有意义的。企业要想股改中的股价有个好的市场表现,就应该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使企业的股改程序透明、公正,使信息披露公开,这样才能得到流通股东的支持和理解,不致使股价出现波动。

(二) 建议

从本文的研究发现,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充分关注流通股东的发言权,要将这种发言权落到实处。政策确实给了流通股东发言权,但是没有将宣传工作做好,流通股东不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等于没有发言权,这是今后改革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坚决制止“投票门”事件、“拉票”和“贿票”事件发生。对程序公正的理解是一种价值判断,其他人是无法代替的。流通股东的投票目的不同,如果其他人强加于流通股东一种意愿,让他投赞成票,他可能会很反感,势必影响他对整个股改的看法,影响他对社会的看法。所以,我们认为,上市公司要想保持和投资者良好的关系,不要搞小动作,应该充分与股东交流,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对价方案,得到广大流通股东的理解,保证股改的顺利进行。

3. 我们认为此次股改的一个重大成功就是注意到了流通股东的权利,力争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一次创举。虽然股改已接近尾声,但后股权分置时代的问题依然很多,继续保持公平、公正并非易事,这需要监管部门的有力监督、上市公司的诚实守信和广大流通股东的积极参与。

五、本文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限制主要在于所采用的方法。假设的实证检验是基于调查问卷。研究方法可能导致未知的样本偏差,并且限制了研究发现的信度和一般性。其他的研究方法,比如实验研究,可以提供更精确、更易控制和较高的内部效度。因此,本文所用的方法可能限制了发现的正确性。然而实验研究在增加内部效度时却损失了外部效度。更何况,股权分置改革是本文研究的背景,使用调查问卷这种实地研究方法是合适的。

但是,在问卷设计上,只有一个指标测量流通股东感知的回报,并假设没有测量误差;只有两个指标测量流通股东参与股改程度,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结

合资本市场实际的回报率和流通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参会率来完善检验过程。同时,研究的样本量也不是很大,进一步获得大样本会增加发现的可信性。

我们的研究根据已有理论只是选择了流通股东参与股改事务作为中间变量,选择流通股东对程序公正的理解作为外源潜变量。除此,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也可能成为参与企业事务的前因。

本文是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上市公司流通股东感知的程序公正和回报之间的关系。如果将研究的背景换成整个社会变革,研究的问题仍以程序公正、参与程度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此,不知结论是否适用。虽然国外早已将程序公正的研究扩展到政治领域,但在中国,这项研究仍很匮乏,需要多方的准备工作,也许我们的研究可以抛砖引玉。

总之,本文提出的问题远远少于股改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提供一个程序公正的视角,说明程序公正是重要的,它会影响流通股东的参与热情和回报。股改提出的“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是有科学根据的。

参考文献

- [1] 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 [2] 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Z]. vol. 4 : 267 ~ 299.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1965.
- [3] Thibaut, J. & Walker, L. *Procedural justice :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Z]. Hillsdale, NJ : Erlbaum, 1975.
- [4] Lind, E. A. & Tyler, T. R.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Z]. New York : Plenum, 1988.
- [5] Folger, R. & Konovsky, M. A. Effects of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on reactions to pay raise decis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9, (32) : 115 ~ 130.
- [6] McFarlin, D. B. & Sweeney, P. D. 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as predictors of satisfaction with personal and organisational outcom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35 (3) : 626 ~ 637.
- [7] Tang, T. L. & Sarsfield - Baldwin, L. J. Distributiv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as related to satisfaction and commitment [J]. *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61 (3) : 25 ~ 31.
- [8] Earley, P. C. & Lind, E. A.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articipation in task selection : the role of control in mediating justice judgemen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52 (6) : 1148 ~ 1160.
- [9] Kanfer, R. , Sawyer, J. , Earley, P. C. & Lind, E. A. Participation in task evaluation procedures : the effects of influential opinion expression and knowledge of evaluative criteria on attitudes and performance [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987, (1) : 235 ~ 249.
- [10] Cornelius, G. W. *Evaluation Fairness and Work Motivation*. Masters thesis [Z]. Champaign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5.
- [11] Lindquist, T. M. Fairness as an antecedent to participative budgeting :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referent cognitions on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1995, (7) : 122 ~ 147.
- [12] Chong M. Lau, Edmond W. Lim. The intervening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cedural justice and managerial performance [J].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02, (34) : 55 ~ 78.
- [13] Joy, V. & Witt, L. A. Delay of gratification as a moderator of the procedural justice-distributive relationship [J]. *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1992, (17) : 297 ~ 308.
- [14] Greenberg, J. & Folger, R. Procedural justi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fair process effect in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Z]. In P. Paulus (ed.), *Basic Group Process*. New York : Springer - Verlag, 1983.
- [15] Leventhal, G. S. What should be done with equity theory? New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fairness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Z]. In K. Gergen, M. Greenberg & R. Willis (eds), *social exchange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 Plenum Press, 1980.
- [16] Leventhal, G. S., Karuza, J. & Fry, W. R. Beyond fairness : A theory of allocation preferences. In G. Mikula (ed.), *Justi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Z]. New York : Springer - Verlag, 1980.
- [17] Greenberg, J. Stress fairness to fair no stress : managing workplace stress by promoting organizational justice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04, 33 (4) : 352 ~ 365.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 Procedural Justice, Participation and Returns

ZHANG JiXiu

(Business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society has been doing the reforms, some of which involve benefits allocation.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of the reforms are important to judge of their effect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radable shareholder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ocedural justice, tradabl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the reform procedures and their returns under the reform of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In the research of big samples, we find that tradabl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the reform procedures mediate the effects of procedural justice on returns, and that improving tradable shareholders comprehension of procedural justice can improve tradable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the reform procedures and their returns. Finally, some advice are suggested.

Key words nontradable shares reform procedural justice participation returns

论企业柔性财务管理

王棣华^①

(东北财经大学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摘 要 研究柔性财务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对柔性财务管理进行了研究 起源与概念、基本特征、目标、职能与原则、主体与组织结构、理念与内容。

关键词 柔性财务管理 理念 资源

老子说：“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者强，莫之能胜；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时至如今，当我们以一种现代的眼光和观点去体味其中的含义时，感触则更加深刻。

19 世纪末，被称为现代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最早提出了美国的科学管理理论，认为科学管理的中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提高生产率，必须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使工人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并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即形成后来的“福斯特”式生产线。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使个人和群体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丧失殆尽。这种“刚性管理”的不足在许多企业濒临崩溃中暴露无遗。柔性管理日益成为 21 世纪管理的主流，是人本管理和文化管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它代表着新技术革命时代企业管理的发展方向。

一、柔性财务管理的起源与概念

现代管理的代表——日本，它的“家族”管理理念，协调人际关系，树立企业平易近人的作风等等管理思想，无处不体现着以“仁”为核心，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的观点。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结合，在亚洲创下一个个奇迹，人们的眼光开始投向亚洲，投向这种非刚性化的管理。这种管理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人们自觉行为的柔性管理。作为管

^① 王棣华，男，江苏沛阳人，东北财经大学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会计学与财务管理的研究。

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柔性财务管理也应运而生。

知识经济的到来,信息革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网络化,企业业务虚拟化,无疑使财务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财务管理的柔性化要求更为突出。柔性财务管理是集现代财务管理意识与传统文化思想于一体,它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充分调动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发挥个人的潜能,提高各种财务资源的利用程度,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柔性财务管理以人为本,崇尚价值思辨论,是在没有任何企业资源差异的情况下能产生很大差异的理财效果的财务管理。

权变理论认为,管理行为和方法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在企业财务管理中要根据所处的内外部条件随机应变,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财务管理模式和方法。柔性财务管理正是为了适应当今企业所处的环境而发展起来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共享的信息技术网络遍布全球,企业的竞争更加剧烈,一切以顾客为导向,追求个性化的消费观念,顾客创造企业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一切使得企业由传统的流水线生产转向柔性生产、定制生产。柔性财务管理是一种灵活的财务管理模式,正好适合了这一生产经营特点,财务组织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柔性财务管理是财务管理科学的一个新领域,但尚未引起财务管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充分重视。柔性财务管理是相对于传统的刚性财务管理而言的。古往今来,人们往往只强调带有强制色彩的刚性财务管理,只强调遵守和服从各种财务管理制度,完成各项财务指标,否则便给予惩处。显然,这种刚性财务管理具有强制性特征。而柔性财务管理则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诱导性力量,从而实现组织的管理目标,把组织的意志转化为大家自觉的行动。可见,这是一种更加高级,更加人性化、民主化的财务管理,也是一种更加理性化、科学化的财务管理。

二、柔性财务管理的基本特征

首先,在质的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柔性财务管理不强调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更重视模糊逻辑的应用。因为财务管理的对象不仅仅是资金,还涉及到大量的人的管理,而人的心理倾向和行为强度往往是模糊的,是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处于两个极端状态的情况较少,往往处于某个中间状态。柔性财务管理体现人本管理特征,强调员工参与企业财务管理。

其次,在量的方面表现为非线性,即不可加性。此时叠加原理失效。因为财务管理中人的潜能是有很强弹性的,组织利用好人的潜能,财务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就会大大增加,相反,就会造成很大损失。因此,财务管理效率的取得,决不是简单的算术叠加。

第三,在方法上表现为感应性。柔性财务管理不强调权力、等级观念,不强调我命令你执行的财务管理方式。在财务管理中,人与人之间强调的是理解与

尊重,靠对真理和美好未来的向往,靠高尚人格和心灵的互动,靠真诚和激情去把各种财务问题处理好。它强调的是感情管理、人本管理、文化管理。

第四,在职能上表现为塑造性。各个组织的各种财务管理制度只具有外在的作用,只有让大家从内心深处接受才能产生“效忠行为”。柔性财务管理在于塑造人高尚的理财精神,而一旦这种精神塑造成功,便会在实际财务管理工作中产生持久的效力。

第五,在效果上表现为滞后性。柔性财务管理往往不会像刚性财务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柔性财务管理有一个“外在——内在——行动”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做大量的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它的效果往往不会马上显现出来。

三、柔性财务管理目标

关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归纳起来,财务界先后出现了三个代表性观点:

1. 利润最大化。在早期,企业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企业财务管理的任务是赚取超额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增加业主投资收益,扩大经营规模。

2. 股东财富最大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所有者为了扩大竞争优势,聘请专门的经理人员进行管理,并让渡部分所有者权能,如使用权、占有权、处置权等,但保留了财产权益和最终处置权。于是,一些财务理论研究者站在所有者的角度提出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目标。

3. 企业价值最大化。公司制企业尤其是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得企业股权由原来的少数几个人迅速分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内部人为控制等因素,他们也无法全面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法人——公司董事会成为独立的财务主体,拥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财产权。很显然,股东财富的增加并非企业理财的全部目标,企业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可以通过举债、募集股本,扩充企业的法人财产。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集中体现为企业价值最大化。

由于柔性财务管理主体的扩大,柔性财务管理目标不再是以前那些狭义的财务管理目标,而是追求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资本配置最优化以及保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时获取优秀人才,形成最佳知识结构及良性知识流。具体说来有:

1. 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型企业中,最重要的不是财务资本而是知识、信息与创造能力。因此,知识拥有者是企业最重要的人。而且利益相关者合作理论认为,企业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其中,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向企业投入专用性资产,都对企业剩余的形成作出贡献,按照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这些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产权主体,都有权参与剩余分配。因此,企业的利益是所有参与签约的各方的共同利益。

2. 社会利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和社会环境的联系更为广泛

深入,企业是社会大网络中的连接点和中继站。企业的社会性日益突出,要求企业高度重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如保护生态平衡,防止公害污染等。这给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企业通过财务管理活动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则不仅有利于实现其经营目标,而且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使企业在良好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3. 保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时,获取优秀人才,形成最佳知识结构和良性知识流。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企业更多地存在于社会中,由于企业大量采用新技术、新能源,将减少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耗费,企业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并更注重售后服务,企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得到较好的体现。企业意识到,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和员工队伍就有了获得财富和更多知识的可能,但是由于知识的飞速发展,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众多的知识,因此,获得优秀人才,形成最佳知识结构及良好的知识流动程序,便成为企业的柔性财务管理目标。

4. 财务的本质是一种对资本要素的配置,柔性财务管理下资本要素范围的扩大,使财务对资本要素的配置功能进一步加强,追求各项资本的最优化配置理所当然地成为柔性财务管理目标。

资本配置最优化包括对企业全部资本的配置,一方面对企业未来的财务活动,如筹资、投资、收益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企业的不同成长期和理财环境下,可调节财务目标的部分标准,激励企业财务不断创新,提高优化配置资本的才能。如在企业发展期,考虑到智力资本的风险性和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以物质资本的筹集和资本收益作为衡量资本优化配置的主要指标,而在企业成熟期,企业物质资本已非常雄厚,智力资本的比重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柔性财务管理职能与原则

财务管理职能是什么,虽然理论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一般认为有财务计划、财务协调、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考核等职能。柔性财务管理职能与财务管理职能有较大的不同,它主要是指财务教育职能、财务协调职能、财务激励职能、财务互补职能。

财务教育职能是由柔性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把组织的财务意志和目标转变为人们自觉的行动所决定的。只有让大家从被动的执行变成积极主动的参与,组织的财务目标的意志才容易实现。而这一切需要教育,需要把管理对象当作人而且是现代人去理解、关心、爱护,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组织的财务管理工作才能更加出色。

财务协调职能是柔性财务管理中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柔性财务管理中的协调与传统财务管理中的协调是不完全相同的。传统财务管理中的协调手段主要是指指挥和控制,即靠管理者制订的财务规范、政策达到协调目的。而对

于人们的思想、意志及人们之间的财务矛盾方面的协调,靠传统的财务管理的协调手段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柔性财务管理协调职能发挥作用的领域。

柔性财务管理的互补职能是相对于刚性(传统)财务管理的强制性而言的。在刚性财务管理中,强调外在的财务规范为主,通过各种财务规章制度形成有序的财务行为,通过统一的财务指标评价人们的功过。刚性财务管理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刚性财务管理的形式化和外在性,难免有机械、肤浅和简单化的负面效应,出现理财的低效率和低效益现象。柔性财务管理通过各种调适手段,调整好组织中成员的理财心态,弥补刚性财务管理的不足,使之成为更加全面协调和完美无缺的财务管理。这就是柔性财务管理的互补职能。

柔性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以下内容:

1. 内在重于外在原则。财务管理工作千头万绪,方法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对人的财务管理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外在的,诸如通过财务法规和制度进行严格管理。这种财务管理形式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拒性,无论是理解还是不理解都要执行。另一种是内在的,诸如通过说服教育、感情投资、形象影响、舆论宣传、激励尊重、心理沟通的形式进行更加能动的管理。柔性财务管理更加重视内在的管理,更加体现“以柔克刚”思想,管理成效将更加持久,更有影响力。

2. 直接重于间接原则。财务管理的工作方式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所谓间接财务管理方式就是财务管理者借助于一般意义上的财务管理方法和手段所开展的管理活动。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针对性不强,对财务关系人的心态没有深入分析。所谓直接财务管理方式就是财务管理者在一般性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特殊性,因人、因事而异做针对性财务管理工作。它的特点是财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直接见面进行思想交流,因而解决起问题更加直接而彻底,而这种管理方式是柔性财务管理更加强调的。

3. 心理重于物理原则。传统财务管理往往更注重“物理”,即客观的物质条件,靠资金去推动和激励企业的各项活动。在柔性财务管理中,“物理”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作用,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广阔而神秘的世界。资金是有限的,而人的创业精神、奋斗精神才是无尽的资源。过分强调资金等物理因素,就必然压抑甚至窒息人们心中的热情,这恰恰是柔性财务管理的大忌。没有资金等物质条件当然不行,但如果广大员工没有了心理动力和干劲,没有奋斗和奉献精神,仅仅剩下物欲和贪欲,资金等物质因素可以化为乌有。有了心理动力,没有资金可以创造出资金!这就是心理重于物理原则的基本道理。

4. 个体重于群体原则。在柔性财务管理中强调个体重于群体的原则,是因为柔性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财务关系主要从个体开始。传统的作用于群体的财务管理往往停留在一般的管理制度、一般的口号阶段,很难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能做到点点入心、深刻具体。我们知道,不同

的个体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求,有不同的性格、态度和理想,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这就是个体的复杂性、特殊性的一面。财务管理若不从这些方面入手去理清个体这种复杂性,那就很可能误用有关财务规章制度的一般原则,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尽管一切外在的财务管理措施的制定都是针对所有的人,而在贯彻落实的时候又恰恰不能用同样的力度去影响所有的人。解决了组织中那些对组织意志不理解、有成见或执行起来有困难的人的问题,财务管理才能更加和谐,财务管理目标才更容易实现。

5. 肯定重于否定原则。肯定与否定是财务管理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在柔性财务管理中肯定重于否定不单是个方法问题,同时也是管理艺术问题,是个原则问题。在评价一个部门、一个人的工作业绩时,大多数部门和人在本质上还是积极进取的,应当充分加以肯定。就是对存在问题的部门和人,也应当在肯定其成绩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这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容易被接受。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柔性财务管理中把握好肯定与否定的度,在信息准确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时机与场合,充分肯定成绩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6. 身教重于言教原则。传统财务管理对被管理者的教育运用较多的是言教,而柔性财务管理更强调的是管理者的身教。管理者以自身良好的形象去营造一个优化的财务管理环境。财务管理者能否做到知行统一、廉洁奉公,能否起模范带头作用,对一个组织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而潜在的影响。

7. 务实重于务虚原则。在柔性财务管理中,我们会发现影响组织内成员积极性的因素往往是些实际问题,不加以解决或不能作出客观的解释,工作就难以进行甚至一筹莫展。解决的办法第一步是务虚,即调查研究,探索讨论,但更重要的是第二步,即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问题,多办实事,即务实。如果仅仅是坐而论道,就会形成恶习,使财务管理丧失群众基础,走向恶性循环。

8. 执教重于执纪原则。在柔性财务管理中的执教工作是最基本的工作。财务行为是由人操纵的,柔性财务管理要想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激励人的精神,改变人的意志,控制人的行为,只能通过感情交流、舆论宣传、典型引路、分析信息、因势利导来解决,而这一切都属于执教的范畴。当然传统的财务管理更强调执纪,执纪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执纪的目的还是为了克服消极因素。如果能用执教的方式解决,效果往往会更好。在柔性财务管理中,执纪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关键还是在于执教。

五、柔性财务管理主体与组织结构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是以企业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仅对企业的资金流动过程进行管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网上公司”、“远距离多主体网上合作体”不断涌现,使得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财务管理主体对应于两个空间。一个是“物理空间”,即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另一个是虚拟的“媒

体空间”,各种网上实体便处于“媒体空间”中。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知识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加强,“媒体空间”中的财务管理主体会越来越多,外延也越发难以界定。如当若干个企业共同投资于同一大型项目时,该项目的财务主体将不再是一个企业法人,而是一个超越企业法人的机构。

柔性财务组织结构是一种灵活简洁的管理体系。财务管理扁平化缩短了最高层和最底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企业信息反馈和决策的中间环节,从而使企业对市场变化能作出灵敏快速的反映,能使上下级之间的沟通相对容易,员工的创造力、闪光点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被捕捉到,并得到充分运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法宝。

财务管理扁平化将有越来越多跨部门、跨地区的协作小组取代传统的逐级汇报的等级制度,这些协作小组灵活、机动,可随时为解决突出问题而组合在一起。企业可以有效地控制人、财、物、信息四大要素,避免因多级管理造成四大要素的配置不当。财务管理扁平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现代化信息体系,它能使知识、信息的传输和管理极为快捷和严密,从而大大降低管理成本,同时,还要求企业的管理层比过去更富创造力,更具协调和组织能力。

扁平化的网络结构是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了信息的远程处理、集中式管理,极大地延展了财务管理的能力和质量。这种财务管理实行从源头管理,标准化信息则可以通过信息网络由计算机实时处理和提供共享,非标准化信息则可以通过信息网络由人脑决策,企业之间所获得的信息与竞争都可以在网上进行。通过远程处理、在线管理、实行对财务的动态管理,真正实现了财务的事前计划、事中控制和事后反馈。因此,以集权为特征的管理分工细密、管理环节复杂、成本高、效率低的金字塔形纵向层次结构,必将被以分权为特征的管理层次少、结构紧凑、反映灵活的扁平网络结构所取代。

六、柔性财务管理理念与内容

柔性财务管理理念应当遵循以下一些基本理念:

1. 泛财务资源理念

传统财务学中的资源概念通常指资本,基本上属于硬资源的范畴,而泛财务资源的理念是对企业有用或有价值的所有部分的结合。从形态上看,泛财务资源可分为硬财务资源和软财务资源两大类。硬财务资源的构成主体是自然资源和传统的财务资源。软财务资源的构成主体是以智力为基础的资源 and 无形资产,包括知识资源和时间资源。

2. 以人为本的理念

长期以来,财务管理被看成“钱的管理”,认为财务管理的对象就是资金,其主要职能就是搞好企业的资金营运,规划筹资投资活动、利益分配等。事实上

财务管理本身就是门艺术。

首先,财务管理活动中,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漠视管理客体的人性,仅强调管理对象的可控性和制度性,必然会在实践中遇到阻碍。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财务管理的客体是人以及因此形成的内外部财务关系,其次才是财务资源(资金、人力、信息或现金流转)。应在实施财务管理过程中,发挥人本管理的最大效用,如:在制定财务预算时,通过常规会议加强参与者的交流,使预算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形成统一认识,明确各自的职责。

其次,企业的发展要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活动本身是人的活动,并且与其他活动相比,人的作用更加突显,另外,科技活动的不断创新与进步,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唤起了人类的自我意识,人类的自我发展成为了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

以人为本的观念反映到财务管理当中,就是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围绕人的价值管理开展财务活动,协调好财务关系,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企业的发展。

3. 知识管理、信息管理理念

未来企业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知识的竞争,谁先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谁就拥有了竞争的优势。知识管理的出发点是把知识视为最重要的资源,把最大限度地掌握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财务人员必须推动财务管理的知识化,同时增加自身的知识含量,包括信息网络技术知识、财务管理知识等,将其融会贯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以使企业适应多变的知识经济环境。另外,信息的价值不仅与其自身的内容有关,而且与和它有关的其他信息有关,同时对信息的选择角度不同,利用力度不同都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假发业之父”刘文汉在一个饭店与两个美国进口商人一起吃饭,边吃边聊,当那两个美国人说现在在美国青年非常爱戴假发,做假发可以发财时,“假发”这两个字的信息成为刘文汉办假发厂的开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假发的出口总值达到10亿港元,成为香港排名第四位的出口产品。

4. 和为贵理念

人是企业中的基本要素,人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加上企业内在分工,每个人的地位、享有的利益不同,这样必然会在企业内部形成各种矛盾和冲突。协调这些矛盾和关系,使之协调平衡,从而使企业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影响企业的发展,是柔性财务管理的重要职能,也是衡量财务管理人员管理水平的尺度之一。

由此可见,“人和”是企业内部管理极为重要的因素。只有人和了,才能调动企业成员的工作热情,不断为企业作出贡献。人和在企业财务管理的人际关系管理中的作用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作用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从而有利于企业的稳定。第二层次的作用则在于企业成员间通过彼此的理解和沟通,实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这种状态下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互为

目的、互相尊重的关系,但各自的价值并未融入他人之中。它表明企业成员间应通过交往达到普遍沟通,在交往中要超越一己私利、小团体利益,而达到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牢固的人际和谐——“人和”。

人和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不是人云亦云,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多样事物的统一,它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矛盾,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是有原则的和睦相处。

全球经济成为一个整体,供产销各环节上的利益主体的利益息息相关,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机制正在出现,企业财富的创造完全依赖于各环节的及时通讯、及时数据、思想符号的传递。企业理财人员应使企业的经营为整个供产销链条上的所有相关利益主体服务。另外,还必须考虑到企业经营的社会效应。

5. 行仁义利理念

义利问题,它反映的是人们对意识形态与物质利益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是人们的哲学思想在经济问题上的反映。在处理义利关系时,采取义利分裂的指导思想是不可行的,不管是重义轻利,还是重利轻义都不利于企业财务管理。柔性财务管理主张以义生利,把义和利长期被对立起来的两端有机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对传统管理思想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对财务管理者在处理义利关系时提出了新的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经济利益是驱动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起因,要肯定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这种对利益的追求要合理、合法,更要合乎道德,反对唯利是图。因此,主张把义利统一起来,最低限度能做到利己不损人,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要先义后利。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财务管理只有先承认国家、社会的利益,才能使自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变成现实。

企业由于有其独立的利益,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全球经济一体化、网络化的发展,使得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及个人之间,一方面通过信息的快速传播与反映,加剧了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又通过信息的网络化、科学技术综合化进行沟通和合作。财务管理人员要树立竞争与合作观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正确处理和协调好企业各种财务关系,使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达到和谐统一,实现企业的双赢策略目标。

6. 适中与权变理念

中庸是柔性财务管理“和”的管理思想的必然产物,也是柔性财务管理的重要基石。柔性财务管理在管理形态上力求进行动态管理,而在一个动态的均衡体系中,若偏执一端,没有中庸思想牵制,必然会走向极端,导致事物性质的转化,破坏原有平衡。

柔性财务管理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以人为本、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已成为企业谋求竞争优势和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柔性财务管理的内容将有以下变化:

1. 走出了“投资与筹资”的管理程式,实现了“筹知与投知”的管理转变

现代市场是知识、科学技术的竞技场,谁掌握了高新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

市场,这是知识经济同工业经济最本质的不同点。企业不仅需要具有维护生产能力的实物资本,更需要有具备创新能力的知识资本。企业具有大量的知识资本,就有了发展生产的主动权,可以从高层次上优化产品结构,创造符合时代需要、符合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这对企业财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紧密结合市场实际,为企业所需的知识资本的管理进行合理规划,制定经营方案,加强对企业无形资产及人力资本的管理,支持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其知识资源,不断创造和增加企业价值。

2. 走出“管财与管物”的管理程式,实现“管人与管财”的有机结合

人是生产要素中最积极的因素,是知识的载体,是增强企业超群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源泉。财务管理要注重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通过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强化对人的激励与约束,把人的知识潜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实施按实物投资分配与知识资本分配相结合的新模式,使企业的财务管理成为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效手段。

3. 柔性财务管理过程

财务管理作为一项价值管理工作,其注意力不能总停留在价值层面上,财务管理工作的价值目标——价值增值的实现必须在生产和流通的循环中进行,价值的物质载体的生产和组织所采用的技术将决定企业投入的价值能否增加或增加多少。首先,企业柔性财务管理以引入外界的科学技术或组织科学技术创新活动为着眼点或起点,然后引入生产,看是否能构成可行性的投资项目,最后把经过详细论证的可行投资项目提供给投资者,以其高额回报为条件筹集资金。这样形成一个新的财务工作过程:

科技创新→寻找可应用该技术的项目(投资规划)→筹资

以前的过程可表示为:

已有投资项目→解决项目中的技术问题→筹资

已有资金→寻找投资项目→解决项目中的技术问题

从这三个过程互补性角度看,采用这三个过程的企业将长期并存,但科技创新的作用日益突显,第一类企业占尽优势。

4. 以人为本的柔性财务管理

柔性财务管理观念的确定,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的价值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中心。而这并不是要将每个人的价值都量化以后才可以进行。而在于招徕外来人才,留住已有人才,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以激发其创造力和工作热情。

以大连三洋制冷为例,该公司员工管理的精髓是“爱人”,以尊重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才能,承认人的劳动,通过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带来产品的高质量、生产的高效率、企业的高效益、员工的高收入。这种“五高”模式是以人为本,以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为目标,最终又以员工的高收入为归宿的价值链。

5. 柔性分配制度

北大方正的创始人王选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迎接知识经济的代表人物,创办 10 年,从 40 万元人民币投资办厂,发展到 1998 年产值达到 60 亿,利税 3.3 亿元,而在工业时代这样惊人的发展速度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高级人才即使不向企业投入物质资本,理所当然地也要成为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者。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人力资本的利润分享制度,除支付给劳动者正常薪金外,还要将企业利润按知识进行分配。

丰田汽车公司的能力工资制体现了柔性分配制度。公司按照人员的职务分工将他们分为事务职员和业务职员两种。前者属管理部门和间接部门,后者属生产部门和技术部门。对事务职员,新工资制度下工资总额的 60% 由基本工资构成,再加入 40% 的能力工资。其能力工资主要由以下五个要素组成:创造力,占能力工资的 20%;人力利用能力,占能力工资的 20%;声望,占能力工资的 10%。对业务职员,新工资制度下工资总额的 80% 由基本工资构成,再加入 20% 的能力工资。其能力工资中 50% 由专业知识与能力确定,而余下的 50% 与事务职员考核指标相同,只需进行等比例缩小即可。具体内容见表 1。

表 1 事务职员与业务职员的工资构成表

工资构成 人 员 (%)	基本 工资	专业知识 与能力	创造 能力	贯彻 能力	组织 能力	人力利 用能力	声望	合计
事务职位	60	0	8	12	8	8	4	100
业务职位	80	10	2	3	2	2	1	100

工资构成确认之后,其实际发放情况由职员工作目标的完成程度来确定。具体做法是事先由职员提出自己一年的工作目标,然后根据这个目标的完成程度确定能力工资的发放百分比。这种工资发放制度有其独特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能力工资构成明确科学。年龄和进入企业的年限在工资中的权重减小了,而工作表现和工作能力等要素将职员的工资收入与其为公司所做的实际贡献紧密联系起来,充分体现了投入—产出分析思想。另外,还充分考虑了能力因素在不同职员对公司的贡献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第二,能力工资制度具有明显的激励效果。能力工资的构成要素是员工提升的决定因素,从而将物质激励与权力激励直接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从员工个人来看,引入能力工资后,工资差别充分体现了工作绩效和能力的差别,使员工能自发提高自身素质,展开良性竞争。为此,公司相应完善了鼓励职工研究和进修的制度,员工适应多样化环境的能力明显增强了。另外,这种工资分配制度,适应了公司组织结构的扁平型、简单直线性的需要。

七、结语

柔性财务管理充分体现了财务管理的灵活性、创新性,但并不抛开财务管理制度。柔性化财务管理也是以“刚性财务管理”的一些内容为前提和基础的,可以想象,没有财务规章制度约束的企业必然是无序的、混乱的,柔性化财务管理也必然丧失其立足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柔性化财务管理是刚性化财务管理的“润滑剂”,是刚性财务管理的“升华”。

柔性财务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进步成果,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个条件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科学健全的刚性财务管理体系;二是良好的社会风尚和领导者形象。离开这两点,柔性财务管理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效果。

柔性财务管理和刚性财务管理在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管理思想等方面有显著差异而已。我们在此论述柔性财务管理,绝没有否定刚性财务管理必要性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刚性财务管理是柔性财务管理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刘光明.《企业文化》[M].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 [2] 吴锐等.《生存竞争与人际协调》[M].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 [3] [美] E. 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M].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 [4] 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M]. 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 [5] 汪丁丁.《记住“未来”》[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Discussion on Corporate Flexible Financial Management

WANG LiHua

(Internal Control and Risk Management Study Centre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flexible financial management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This paper involves in such following aspects of the research as origin and concepts, basic features, objective, functions and principles, entity and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ideas and contents.

Key words flexible financial management philosophy resource

美国内部控制执行机制研究

陈志斌^① 何忠莲

(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

摘 要 本文深入研究了美国内部控制的执行机制,对我国当前的内部控制标准建设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本文系统分析了萨奥法案颁布前后美国内部控制执行机制的特点和作用机理,并针对我国实际提出在我国的内控标准体系建设中应强调责任主体的落实,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惩戒机制,以保证内部控制标准的有效实施。

关键词 COSO 报告 执行机制 借鉴

一切制度的核心在于执行,再完备的制度如果离开了执行,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随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的正式成立,我国统一的内部控制标准建设也驶入了快车道。然而,制定统一的内部控制标准体系并非我们的最终目标,内部控制标准的有效实施才是内控标准建立与完善的终极目标所在。内控标准制定之初,深入研究与制度执行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很有必要。美国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机制引起世界关注,对美国内部控制执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当前的内部控制标准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审计视角内控执行机制的演变

COSO 报告发布以前,内部控制概念在美国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结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注册会计师出于其审计工作的需要,首先提出了内部控制的概念,并不断对其进行发展。同时,立法机关、企业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等都表现出对内部控制的极大关注。

1936 年美国会计师协会在《独立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查》公告中,首次提出审计师在制定审计程序时,应审查企业的内部牵制和控制,他们认为内部控制就是为保护公司现金和其他资产、检查簿记事务的准确性而在公司内

^① 陈志斌,男,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厦门大学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内部控制和财务理论的研究。

部采用的一系列手段和方法。1949 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所属审计程序委员会出版了内部控制的研究报告——《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素及其对于企业经理班子及独立审计师的重要性》，第一次把内部控制的范围拓展到会计和财务部门功能之外，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了定位，内部控制的范围涵盖管理当局的所有管理工作，这对管理当局加强其管理工作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注册会计师对这一过于广泛的定义感到无所适从。考虑到限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审计程序委员会将内部控制的目标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内部会计控制目标，另一部分为内部管理控制目标。1963 年，审计程序委员会在《审计程序公告第 33 号》指出，独立审计师要对企业的会计控制进行评估，而管理控制一般只是间接与财务记录有关，因而一般不需要评估。

1972 年水门事件后，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再度引起美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国会 1977 年通过了《反国外行贿法案》（FCPA），严格规定凡受《证券交易法》管制的上市公司必须具备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FCPA 成为强制内部控制的成文法规。

美国会计师协会对内部控制的理解，从表面上看减轻了审计师的责任，但实质上却增加了审计风险，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公司倒闭和陷入财务困难，审计诉讼随之呈现爆炸式局面，“会计控制”已不能满足历史的发展要求。1988 年 4 月，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了《审计准则公告第 55 号》，首次以内部控制结构取代原有的“内部控制”，不再区分会计控制与管理控制，指出“内部控制结构要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在 COSO 内部控制框架发布之前，证券交易法和 FCPA 就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提出了要求，1934 年《证券交易法》就规定证券发行人应维持能为相关目的提供合理保证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1977 年，根据 SEC 的建议，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国外行贿法案》（FCPA）规定拥有根据《证券交易法》12 节进行注册的证券或根据《证券交易法》需要提交报告的公司要设计并维持上述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而不建立充分的内部会计控制就是违法。

从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到内部控制结构，美国以审计为主导的内部控制实现了以零散到系统的转变和发展，为后来 COSO 报告与统一的内控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二、萨奥法案前内控强制披露机制处于争论之中

COSO 报告是建立统一的内控标准的成功尝试，但它显然不能包罗万象，而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在 COSO 框架公布不久，美国审计总署（GAO）也曾指责这个框架有缺乏保障资产的严重缺陷，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也强调不够。由于美国审计总署的影响巨大，COSO 报告若不根据其要求进行修改，从一

开始就可能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因此,COSO 委员会在 1994 年修订后的报告上,提出了“保障资产的内部控制”的概念。此外,COSO 框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外披露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不涉及战略计划、目标设定、保持核心竞争力、董事会责任等要素,而后者恰恰更多的是公司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是内部控制的实际应用者和执行者,但在内部控制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不是内部控制概念的最先提出者,在 COSO 内部控制框架的制定过程中,也远未起到主导的作用。而 COSO 报告作为一个由民间机构制定的概念框架体系和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不具备法律效力,其执行必须得到公司管理层的支持。

从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者公司管理层来看,内部控制的执行机制可以分为内在激励和外部约束两类。内在激励指的是公司管理层有主观动机去严格地执行相关内部控制标准。管理层的这种动机主要是资本市场、经理市场竞争条件下声誉发挥作用的结果。外部约束则包括立法和监管的要求,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审批、法定审计、公众和舆论监督等。声誉机制是一种“软”机制,如果声誉在市场上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的话,声誉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内部控制的准公共品性质就可能弱化内部控制的有效供给。这时,就需要外部约束。

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和有效性,美国政府监管部门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公司经营的透明度,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具体一点就是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可靠的财务报告,因此,对内部控制的要求也主要体现在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上,即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但在萨奥法案发布以前,由于强制披露的成本与收益的不确定性等原因,各方对于是否要强制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评估报告,以及是否要经注册会计师鉴证还存在较大争议。

早在 1978 年,审计师责任委员会(Cohen 委员会)就建议管理当局提供报告确认管理当局对财务报告的责任,并要求管理当局对控制系统进行评估,财务主管协会和 Treadway 委员会也建议管理层报告内部控制。SEC 也分别于 1979 年和 1988 年提议要求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并要求审计人员加以审核。但是,SEC 收到了众多的反对意见,最后只得收回提议。

1991 年美国众议院甚至通过了一项立法提案,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并由审计人员进行审核。而该建议之所以没有成为一项法律是因为参议院未能通过。

尽管 SEC 没有强制要求提供内部控制报告,但一些公司已开始自愿在财务报告中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如 McMullen, Dorothy 和 Ragahunandar (1996) 对 1993 年 2221 家公司的年报的研究表明,有 742 家提供了内部控制报告,占 33.4%。Ragahunandan 和 Rama (1994) 对财富(Fortune) 100 家公司的年报进行检验发现,有 80 家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报告。由此可见,美

国公司有较强的自愿提供内部控制报告以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公司质量的信号的动力。

三、萨奥法案推动的内部控制强制实施

2001 年后,美国发生了安然、世通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丑闻和破产事件,广大投资者、公司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随之而来的就是实施严刑峻法以加强公司治理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呼吁。

美国国会于 2002 年颁布了以条款严苛而著称的萨奥法案,该法案规定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宣誓,一旦公司提供了不实财务报告,这两名高管就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该法案还全面提高了对内部控制的要求,要求管理层提交经注册会计师鉴证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报告。

为响应萨奥法案的相关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在 2002 年发布了 33 - 8138 号提案,并于 2003 年 6 月正式发布了 404 最终规则,对管理层评价与报告内部控制进行了指导,而 PCAOB 则根据 404 条款和 SEC 最终规则的要求,于 2004 年 9 月发布了第 2 号审计准则《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以下简称 AS2),就审计人员根据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报告进行审计进行了具体、详尽的指导。

(一) SEC 最终规则与萨奥法案相呼应的实施机制

SEC 最终规则选用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这个术语,认为它是公司和审计师使用的一个主要术语,很好地概括了萨奥法案的目标。

SEC 最终规则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定义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或者公司行使类似职权的人员设计或监管的,受到公司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影响的,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满足外部使用的财务报表编制符合公认会计原则提供合理保证的控制程序,具体包括以下控制政策和程序:

1. 保持详细程度合理的会计记录,准确公允地反映资产的交易和处置情况。

2. 为下列事项提供合理的保证:公司对发生的交易进行必要的纪录,从而使财务报表的编制满足公认会计原则的要求;公司所有的收支活动经过公司管理层和董事的合理授权。

3. 为防止或及时发现公司资产未经授权的取得、使用和处置提供合理保证,这种未经授权的取得、使用和处置资产的行为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重要影响。

定义中的 1、2 两点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¹⁰³ 条款中要求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或鉴证报告中进行内部控制评价的内容保持一致,第 3 点则是

针对公司资产的使用和处置提出的,表达了投资者关心资产安全状况的要求。

除了考虑投资者的需要外,SEC 还要考虑内部控制披露的成本因素,因此与 COSO 报告中对内部控制的定义相比,SEC 在最终规则中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定义仅包含了与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相关的部分,而省略了经营活动的效率效果的目标,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目标中也仅保留了诸如证券交易委员会财务报告要求这类与财务报表编制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定义与《证券交易法》第 13 (b) (2) (B) 款对内部会计控制的描述保持一致。因此可以说,SEC 提出的管理层需要评估和报告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只相当于 COSO 内部控制框架的一个子集。

在萨奥法案前关于是否强制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争论中,各方关注的也主要是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因此,COSO 委员会在 1992 年发布《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时,就设“对外部各方的报告”专章讨论了与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的编制之内部控制的相关的问题,对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报告提供指导。

关于管理层进行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估时采用的框架,SEC 最终规则没有强制规定管理层评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时采用的标准,但认为管理层应当在一个适当的、公认的控制框架基础上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该框架由遵循正当程序的专家团体制定,包括将该框架广泛地散发以征求公众意见。

SEC 认为 COSO 框架满足其要求,可以作为管理层评估和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框架。但最终规则并不强制要求采用某种框架(比如 COSO 框架),因为 SEC 认识到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存在其他的标准,而美国也可能在将来会出现 COSO 框架以外的其他框架,而这些框架或标准能适应法案的要求,且不会有损投资者的利益。采用公认的标准可以提升内部控制报告的质量和不同公司间内部控制报告的可比性。最终规则要求管理层报告评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时采用的标准——一个适当的框架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 (1) 不带任何偏见。
- (2) 可以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合理一致的定性定量测量。
- (3) 足够完整,以保证那些可改变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结论的相关因素未被省略,且与评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相关的。

(二) AS2 所规定的执行细则

二号准则(PCAOB AS NO. 2,以下简称 AS2),就审计人员根据公众公司管理当局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报告进行审计,提出综合审计的理念,明确指出了公众公司的审计人员需要在财务报表审计时同时进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AS2 的出台,将对构成有效公司治理基石的董事会、管理层、外部审计师与内部审计师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 PCAOB 主席 William J. McDon-

ough 所称,“该准则是委员会采用的最为重要、意义最为深远的审计准则。过去,内部控制仅是管理当局考虑的事情,而现在审计人员要对内部控制进行详细的测试和检查。这一过程将对投资者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稳固的内部控制是抵御不当行为的头道防护线,是最为有效地威慑舞弊的防范措施”。SEC 于 2004 年 6 月 18 日发表了《SEC 同意 PCAOB 关于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审计准则》,同意实施 AS2,并于 2005 年 5 月 16 日发表声明,明确了初次采用萨奥法案 404 条款的要求。同一天,PCAOB 公布了 AS2 的应用指南。

AS2 并未强行规定适用的内部控制评价标准,而是规定了适用框架要符合的条件,这些条件与 SEC 在最终规则中规定的管理层评估和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框架的条件类似。AS2 中规定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应当出具 COSO 报告等类似标准的内部控制报告,为该单位实施财务报表审计的审计人员以此标准作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依据发表审计意见。这与以公认会计原则作为会计报表公允性评价依据相类似。

PCAOB 指出,在美国,COSO 委员会已经出版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即著名的 COSO 报告,它基于管理层评估的目的提供了一套适合和可用的框架。因此,AS2 准则中的执行和报告指引也基于 COSO 框架。其他适合的框架在其他的国家已经发表,或许在将来会被编制。其他的适合框架可以用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尽管不同的框架可能不包含和 COSO 完全相同的要素,但一般而言,它们应当包含了在 COSO 中的所有主题。因此,审计师应当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在审计准则中运用这些概念和指南。

SEC 对该标准的认同等于从另一个侧面承认了 COSO1992 年内部控制框架,这也表明 COSO 各发起机构多年的不懈努力使这个框架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COSO 取得了重大胜利,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得以强制执行。

四、务实、究责 美国内部控制强制执行机制的特征解析

美国内部控制执行机制一方面是由企业自愿实施,另一方面,有关法律法规又对企业执行内部控制规范或公认的框架进行强制约束。

(一) 强制执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COSO 内部控制框架进行了统一内控标准的尝试。但从内控内容上来看,SEC 在最终规则上选用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而未采用内部控制的概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 萨奥法案 404 节主要关注的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要素;(2) 许多评论者认为,即使提出与财务报告有关的更有限的内部控制定义,也将使公司增加相当大的报告与成本负担;(3) 在传统上,独立会计师没有负责对财务报告以外的内部控制进行复核、测试和鉴证管理作出的评估。这就

是说,SEC 只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管理层评价和报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强制要求注册会计师审计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而非内部控制的所有方面。

一般来说,在规则制定或立法过程中,需要考虑管制的范围与管制的强度的匹配问题,管制范围越大,出于成本的考虑,管制的强度就会越弱。对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由于其与财务报告高度相关,因此适合以立法和监管的形式来约束,而内部控制的其他方面则更多地采用自愿的形式。美国对于内部控制的强制性要求是在萨奥法案这部严刑峻法中提出的,因此也就只选择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这一相对较小的管制范围。

(二) 明确归咎相关各方的作用和责任

在美国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执行机制中,监管机构通过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和报告,并规定由注册会计师审计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评价报告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使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暴露在阳光之下,从而实现了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监管,这与要求上市公司提供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会计报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萨奥法案要求担任公司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层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测试和鉴证,并出具鉴证报告。而 AS2 进一步提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要求审计人员获取证据,对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估报告进行评价,判断其是否与 COSO 报告等评价标准一致,并发表审计意见。服务性质由鉴证转变为审计。AS2 指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目标是审计人员对管理当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估报告发表意见,指出审计人员要合理保证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 COSO 报告或类似标准。而注册会计师通过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可以有效缩小审计期望差,增强公众对财务信息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萨奥法案、SEC 最终规则以及 AS2 都明确规定并强化了公司管理当局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责任,主要包括建立和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使用合适的评价标准(如 COSO 框架或其他适当的标准)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估和报告,对评估提供充分的证据等。

(三) 区别不同对象的多层次执行机制

萨奥法案、SEC 最终规则以及 AS2 都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无强制性要求。而对于上市公司,也有不同的要求:

1. 国外私人发行者和小公司

萨班斯 404 条款并没有区分国内外的发行者,也没有区分规模大小,但是与加速编报者相比,SEC 为国外发行者和小公司规定了延迟的执行时间。

SEC 最终规则为国外私人发行者、小型公司和其他不属于加速编报者的公司提供了延期,另外,SEC 没有强制规定管理层评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时采用的标准,这种方式也为国外私人发行者和小型公司满足披露要求提供了灵活性。

同时,SEC 建议 COSO 委员会致力于制定小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指引,以更好的指导小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施内部控制。

COSO 委员会 2005 年 10 月底制定并发布《小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指引(征求意见稿)》(简称“《指引》”)。《指引》的发布,更加有利于小企业按照萨奥法案和 SEC 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和报告,也有助于审计师对小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

2. 银行和参保存款控股公司

根据 1991 年联邦储蓄保险法案 36 条的要求,总资产超过 5 亿美元的被联邦保险的存款机构需要提供年度管理报告。虽然 SEC 的最终规则与 FDIC 的内部控制报告要求很类似,但是,在一些重大方面却有所不同。SEC 与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和其他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进行了协商,以尽可能地消除 SEC 最终规则和 FDIC 有关内部控制报告要求间的不必要的重复。

在与 FDIC、联邦储备董事会、储蓄机构监管局和货币监理署协商后,SEC 决定被保险存款机构既要遵循 FDIC 的 363 部分的规定,又要遵循 SEC 的萨奥法案 404 条款最终规则的要求。但在怎样更好地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时应享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他们可以从下面两种选择中任选其一:

- (1) 可以准备两份管理层报告以分别满足 FDIC 和 SEC 的新要求;
- (2) 可以准备一份管理层报告以同时满足 FDIC 和 SEC 的新要求。

如果被保险存款机构或它的控股公司,选择一份管理层报告以同时满足 FDIC 和 SEC 的新要求,机构或控股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管理层评估报告须包含以下内容:

(1) 管理层的责任的陈述,这些责任包括 提供年度财务报告;为登记机构建立和维持一个适当的内部控制和结构,遵循 FDIC 和适当的联邦银行代理机构指定的符合安全和健全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2) 管理层确定按照《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13 节(a)或 15 节(d)的要求进行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估时采用的框架的陈述。

(3) 管理层对于登记机构在最近财政年度结束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包括管理层是否推断登记机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是否在财政年度管理层遵守了符合安全和健全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讨论必须包括管理层识别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的披露。

(4) 管理层关于审计登记机构的年度报告,已经出具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管理层评价的鉴证报告的陈述。

另外,机构或控股公司在其按交易法提供的年度报告中,须提供注册会计

师事务所关于内部控制财务报告的管理层评估的鉴证报告。为了管理层的评估报告和注册会计师的鉴证报告,财务报告须包括按 GAAP 要求和按监管目的提供的财务报表。

(四) 制定与执行相互促进和与时俱进

COSO 委员会于 1992 年就提出了内部控制框架,2002 年后,针对一系列财务欺诈事件对国际资本市场造成的不利影响,美国国会出台萨奥法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提出要求,即外部审计师对管理层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鉴证意见。SEC 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为配合萨奥法案第 404 条款的有关规定,制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规则,对内部控制提出具体要求。PCAOB 通过制定第 2 号审计准则,明确了外部审计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的计划和实施。从 1992 年 COSO 内部控制框架的提出到 2002 年后萨奥法案等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经历了 10 年之久,COSO 报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得以强制执行,执行力得以提高。

针对小型上市公司对法案遵循和成本考虑的问题,SEC 建议 COSO 委员会发布针对小企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指引,COSO 接受了建议,于 2005 年出台了《小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指引(征求意见稿)》,以利于小企业对法规的执行。

不管是先有内部控制的相关标准,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进而要求上市公司强制执行某些标准 还是先有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的强制性要求,COSO 委员会发布相关的指引,COSO 内部控制框架均在多方的参与下赢得了权威性,也在各方的要求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制力。

(五) 及时而务实的对待执行中的争议

为落实萨奥法案 404 条款,公司需要加强以下工作:记录内部控制的过程、记录会计政策和程序、审核内部控制、弥补控制缺陷、鉴证内部控制,以及相应的员工培训和购买外部咨询服务。

按美国《减少文书工作法》要求,2002 年 SEC 曾对 404 条款执行成本进行了初步估计:“所有上市公司年信息揭示成本最多为 4950 万美元,每家公司年报和季报平均增加 5 小时额外工时。”2003 年 8 月,SEC 修正其估计:执行 404 条款年度总成本约为 12.4 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 9.1 万美元,新增 383 工时^①。但随后调查显示,该条款执行成本远超过此预计。财务经理协会就 404 条款执行成本进行了四次调查,2005 年 3 月调查结果为:平均执行成本 436 万美元,

^① 此估计的基础是:估计总的执行人工为 5396266 小时,假设内部人工占 75%,外部人工占 25%;内部小时费用率为 200 美元,外部为 300 美元。该估计不包括任何因执行和验证管理当局内部控制报告引发的额外成本。

94% 受访者认为执行成本远超出其可能带来的收益。普华永道公司在 2003 年 3 月至 2004 年 3 月有关萨奥法案执行情况多次调查结果显示,对预期执行成本的估计持续走高,其中,认为内部控制执行成本增加幅度偏高的比例也一直在提高。86% 考虑下一年度对内部控制执行过程系统化,以降低成本;有 61% 的人认为此执行成本是不必要的负担;七成人难以确定执行 404 过程的记录和测试究竟应进行到什么程度。

其他机构进行的相关调查也表明 404 执行成本极其高昂,另外,萨奥法案 404 条款还会给企业带来间接成本——如提高了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本的成本,管理层因害怕承担风险而放弃极好的投资机会等。

而 404 条款的支持者认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几百个公众公司已经报告在他们控制中的重大缺陷,这些披露说明 404 条款已经在发挥作用。监管系统调查的 222 个财务高管中的 79% 的报告称他们的公司在遵守 404 条款后,公司的内部控制更加有力;74% 的报告说他们已经受益于 404 法案的遵守,其中 33% 的报告说遵守减少了财务舞弊的风险。而批评家认为,不管收益怎样,由于 404 条款的成本原因而变得有问题。但参加圆桌会议的几乎每个人都强调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表达了对实施 404 条款的支持,很多公司代表说,404 条款突出了他们控制的弱点和无效性;同时,很多报告公司觉得第一年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指出内部和外部的遵循成本是高昂的。相比较而言,财务信息的使用者一般都持称赞态度,认为从投资者最终承担成本的角度看,比较可靠报告的收益是值得这个昂贵的价格的。

SEC 认为:从长远角度看,一旦发生公司丑闻,投资者的损失将远远超过公司目前付出的成本,因而 404 条款带给美国公司的利益远大于现在公司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尽管代价高昂但也是必要的。SEC 和 PCAOB 无意提议削弱萨奥法案,而是考虑是否可以通过修改或增加更多的指导原则,使企业和会计事务所更容易地遵守 404 条款。

美国政府实施 404 条款的决心是很坚定的,毕竟萨奥法案的最终目的是恢复投资公众对于财务报告和美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 404 条款能够增加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提高公众的信心,也就是说,404 条款的最终检验标准是美国政府能否在恢复和维持公众对于证券市场的正直和透明度的信心上取得成功。

五、他山之石可攻玉 美国内控执行机制对我国的借鉴

(一) 制定机构的统一和独立有积极的作用

美国的内部控制研究与开发由 COSO 委员会这个独立的民间机构担当,无疑提高了其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度。COSO1992 年提出的内部控制框架不仅在美国有极大的权威性,在国际上也享有声誉。COSO 委员会还不断发展其报告,随

着衍生产品的使用,企业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1996年,COSO委员会发布了“衍生产品使用中的内部控制问题”的报告,这表明COSO委员会不断根据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的财务失败案件对其整体框架进行补充和解释,也标志着其已逐渐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风险管理。2004年9月,COSO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把内部控制包含在企业风险管理之中,从而更广泛地关注于企业风险管理领域。

我国目前尚不具备由民间机构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条件,因此,政府应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有关内部控制制度的指导原则、指引、规范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人民银行制定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证监会制定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财政部制定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等等。不同利益团体从各自的需求出发,出台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所采用的内部控制标准框架不尽相同,对内控的定义、范围、内容和目标等的表述和理解很不一致,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与实施。

所幸的是,随着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内部控制制度政出多门的局面也即将得到改善。

(二) 内控责任主体落实到个人是制度落实的前提

内部控制由谁负责是关系到内部控制能否发挥实效的根本问题。对于内部控制的评价必须从公司治理环境的角度进行审视,考察内部控制责任是否落到实处。否则,推行强制性信息披露仅仅徒具形式。

COSO报告认为,内部控制应由公司管理层负责。这种观点承认内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明确划分。内部公司治理解决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制衡关系。是用来约束、激励和监督经营者的控制制度;内部控制则是管理当局与其下属之间的管理控制关系,是面向次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控制。但是,将内部控制职责交由管理层的最大问题在于,管理层控制下的内部控制也许能够按照经营者的意志有效运行,但可能对维护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失效。近年来不少案件表明,很多舞弊行为都直接来自公司高层,高层舞弊活动大大限制了传统内部控制的作用。

而萨奥法案进一步把有关内部控制的责任落实到实际执掌公司权力的关键人物身上,规定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及类似职能人员对于内部控制的责任。这就从美国公司的现实情况出发,突破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机械分割,加强了董事会和管理层的责任。

萨奥法案之所以将内部控制之责落实到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身上,这反映了美国立法高度务实的态度。美国公司分散的股权导致股东难以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监控,形成了“弱股东、强管理层”的格局。美国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董事长身兼首席执行官十分普遍,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实际控制董事会的局面难以避免。考虑到首席执行官执掌大权的现实情况,在立法上将

内部控制责任落实到首席执行官身上更具有现实意义,使其责任与权力相匹配。

与萨奥法案中强调上市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对财务报表可靠性和内部控制的责任相比,我国的政策法规中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责任主体的定义。而我国上证所和深证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规定董事会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负责,属于集体负责,在确立内部控制的责任主体方面并未有重大突破。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受到管理层控制或大股东控制的问题较严重,突出表现在公司治理不健全的情况下控制环境薄弱,关键人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

我们认为,应进一步把董事会、管理当局对内部控制的责任落实到人——实际执掌公司大权的关键人和实际负责公司资产安全和财务可靠性的高级管理人员身上。借鉴萨奥法案,考虑我国法律现实,应该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或财务总监)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有效运行负责并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上签字盖章。^①

(三) 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惩戒机制是有效实施的重要机制

萨奥法案的第 302 条和第 906 条分别在民事和刑事方面直接规定了对上市公司 CEO 和 CFO 的特别要求,对违反财务报表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处罚额由 5000 美元提高至 10 万美元,并将判处的监禁期限由 1 年延长到 10 年,对团体的处罚额由 10 万美元提高到 50 万美元,数额之高足以给个人和公司产生震慑力。法案还规定,如果公司财务报告在 12 个月之内被宣布需要修改,无论修改是基于何种原因,CEO 和 CFO 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述规定建立了严格的问责机制和惩戒机制。萨奥法案颁布后,美国司法机构起诉了安然公司及世界通讯公司包括 CEO、CFO 在内的数十位高级管理人员,并对部分人员处以数十年的监禁,这是美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改善的重要推动因素。

而我国对于财务造假的经济处罚力度和刑事处罚力度都还有很大的差异,从经济处罚力度来看,《刑法》规定可以单处或并处 2 万 ~ 20 万元罚金,《公司法》规定可以处 1 万 ~ 10 万元罚款,《证券法》的规定是 3 万 ~ 30 万罚款,《会计法》规定是 1 万 ~ 5 万元罚款,而实际处罚还要低,数额不一,各法的不协调着实让执法部门无法判案。从刑事处罚来看,我国除少数严重案件适用刑法外,大多数案件以行政处分和罚款为主,而且对公司的处罚力度要比有关管理层的力度更大一些。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虚假信息披露的刑事责任,最高是 3 年有期徒刑。

一般来说,民事赔偿是解决证券市场虚假信息泛滥的最好的方法。而在我国曾一度缺乏对虚假信息披露相关责任主体的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虽然 2002

^① 《美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发展及其借鉴》。

年1月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和2003年1月发布的《规定》,已经允许有条件地进行民事侵权的诉讼,但实践表明,绝大多数股民由于不具备《规定》所界定的诉讼条件^①,因而不能行使相关诉讼权利,从而不能使原告的损失得到切实的保障,也不足以对造假个人和公司产生威慑力。

我国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也缺少对相关罚责的规定,这将对制度的实施造成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国应完善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逐渐形成完善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为内控监管提供有力保障。

(四) 统一和协调的内控标准有利于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萨奥法案和 SEC 的最终规则对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的要求与 FDIC 对于总资产超过 5 亿美元的被联邦保险的存款机构的内部控制报告的要求很类似,但是,在一些重大方面却有所不同。为了消除 SEC 最终规则和 FDIC 有关内部控制报告要求间的不必要的重复,减轻报告人的负担,SEC 与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FDIC) 和其他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进行了协商,决定总资产超过 5 亿美元的被保险存款机构既要遵循 FDIC 的 363 部分的规定,也要遵循 SEC 的萨奥法案 404 条款最终规则的要求,但在怎样更好地满足两方面的要求时应享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他们可以从下面两种选择中任选其一:可以准备两份管理层报告以分别满足 FDIC 和 SEC 的新要求;可以准备一份管理层报告以同时满足 FDIC 和 SEC 的新要求。

而反观我国实际,且不说对于银行和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要求之间的协调问题,就是同为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提出要求的上证所与深证所,其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执行时间、范围上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一致。因此,我们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注意各执行要求之间的协调,以减轻企业的负担。

值得强调的是,在对 COSO 内部控制框架执行机制进行借鉴的过程中,我们需保持十分的谨慎,美国从 1992 年 COSO 内部控制框架的提出到 2002 年后萨奥法案等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经历了长达 10 年广泛的争论,萨奥法案后由于 404 条款高昂的执行成本也广受诟病,我们应密切关注 COSO 内部控制框架的执行动向,深入分析其执行环境,因为对美国适用的东西,对中国未必适用,而在美国还有很大争论的东西,我们则更要谨慎,这才是借鉴的真谛所在。

^① 《规定》中规定,诉讼必须在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了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的处罚,或在财政部、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公布了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或在虚假陈述行为人未受行政处罚,但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有罪的,并且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生效的情况下才能提起诉讼。诉讼只能由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的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主体可以采用共同诉讼方式而不能采用集体诉讼方式等。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的通知 [Z]. 银发 [1997] 199 号.
- [2] 证监会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期货经纪公司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的通知 [Z]. 证监期货字 [2000] 12 号.
- [3] 证监会关于印发《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 [Z]. 证监发 [2001] 15 号.
- [4] 证监会关于做好证券公司内部控制评审工作的通知 [Z]. 证监机构字 [2001] 202 号.
- [5] 财政部关于印发《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试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 (试行)》的通知 [Z]. 财会 [2001] 41 号.
- [6]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的通知 [Z]. 会协 [2002] 41 号.
- [7] 财政部关于印发《内部会计控制规范—采购与付款 (试行)》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销售与收款 (试行)》的通知 [Z]. 财会 [2002] 21 号文.
- [8]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 [Z]. 2006 年 6 月 5 日.
- [9]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 [Z]. 2006 年 9 月 28 日.
- [10] 陈志斌. 现代企业战略现金流管理的三维均衡 [J]. 管理世界, 2006, (3).
- [11] 陈志斌. 内控规范的嵌入与超越 [J]. 会计研究, 2005 (11).
- [12] 陈志斌. 企业内部控制战略目标: 构建与自然资本的和谐机制 [J]. 江海学刊, 2005, (1).
- [13] 陈志斌. 问责机制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 [J]. 会计研究, 2004, (7).
- [14] KPMG. Sarbanes-Oxley section 404: management assessment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the proposed auditing standards [M]. 2003. 3.
- [15] McGladrey&Pulle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404 of the Sarbanes - Oxley Act of 2002 [M]. 2003. 3.
- [16] SEC release No. 33-8138. Proposed rule: disclosure required by sections 404, 406 and 407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M]. 2002. 10. 22.
- [17] AICPA. Auditing an entity's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audit and reporting on an entity's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M]. 2003. 3. 18.
- [18] SEC. Final Rule: Management's Reports o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Certification of Disclosure in Exchange Act Periodic Reports [M]. 2003. 6. 5.

The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l Control in U. S. A

CHEN ZhiBin & HE ZhongLian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ep research of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rnal control in U. S. A is very meaningfu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internal control standar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se the character and mechanism of U. S. A's internal control operation mechanism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With the insight of the Chinese reality, some treatments are suggested to guarantee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tandard, including that the responsible entity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implemented, strict responsibility-asking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COSO report operation mechanism model

审计意见与会计稳健性

——来自管理舞弊(风险)样本的实证检验

刘兴华^① 杨舒先^②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 青岛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摘 要 会计稳健性是会计报表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惯例,它隐含着在确认和计量收入与资产时应保持谨慎。独立审计作为一种约束管理层行为的机制,可用于防止管理层不正当地利用其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本文采用分段线性回归的方法重新探讨 Ball and Shivakumar (2005) 模型,进一步探索审计意见类型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在研究样本的选择上,从政府监管公告中选取了 232 家管理舞弊样本,运用修正琼斯模型测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从过度盈余管理公司中选取了 232 家管理舞弊风险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获得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管理舞弊(风险)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存在显著差异:即获非标意见的管理舞弊(风险)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显著地低于未获非标意见的管理舞弊(风险)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关键词 会计稳健性 审计意见 分段线性回归

引言

会计稳健性(accounting conservatism)一直是会计实务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惯例,它要求在确认、计量损益和资产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性,不夸大当期利润和虚增所有者权益。Basu (1997) 将会计稳健性定义为会计盈余对收益等好消息与损失等坏消息的不对称确认程度,并采用 Beaver, LamberL 和 Ryan 使用的逆回归来测度会计稳健性,逆回归以盈余作因变量,收益作自变量来度量会计的稳健性。Holthausen 和 Watts (2001) 发现在会计准则出现之前的 1927 ~ 1941 年,就已存在会计稳健性。按 Beaver, W. H. 和 S. G. Ryan (2005) 给出的解释,会计稳健性包括无条件稳健性(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和条件稳健性

^① 刘兴华 男,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讲师,西南财经大学 2004 级博士生,主要从事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② 杨舒先 女,青岛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计算数学与应用数学的研究。

(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两种。^① 前者重点研究的是特定种类的经济资产和负债的估价,要求净资产账面值较市值低,例如,自创无形资产开发成本的费用化、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等等。后者的研究重点放在防止经理可能高报会计盈余的契约效率方面,预期损失(坏消息)在被预见时就被立即确认,而预期收益(好消息)只能在实现时才能确认,即会计报告对坏消息的确认比好消息更及时,例如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核算存货、计提各种资产减值等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稳健性是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谨慎反应,并指出了稳健性的合理性。Chatfield (1974) 甚至认为,稳健性原则在会计原则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其他原则与其相冲突时都要服从于它。

会计稳健性在我国曾一度作为资本主义的会计原则受到批判,被认为是操纵会计数字的工具而受到责难。1993 年实行新会计制度以来,会计稳健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1998 年 1 月 27 日财政部颁布实施了《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会计稳健性突出体现在“四项计提准备”,并成为我国会计制度进一步与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一大特征。1999 年财政部和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对长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和短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1999 年 10 月 31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从法律层次上为稳健性的实施提供了保障。2000 年 12 月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制度》取代《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将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委托贷款。2001 年 1 月财政部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充分贯彻了稳健性原则,将减值范围扩大到八项,并采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近的会计要素的定义,使中国会计稳健性与国际惯例进一步接轨。

管理舞弊^②风险的存在极有可能影响到会计稳健性。契约理论把企业看作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组合体,在企业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管理舞弊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当会计盈余对管理层的报酬具有重要影响时,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管理层极有可能隐瞒不利的会计盈余信息。

所以,存在管理舞弊(风险)时审计师有理由重视会计稳健性问题。审计师肩负着社会公证的职责,独立审计职业的发展历程直面了无数的破产、倒闭、舞弊和争议,这使得审计界充满了强烈的风险甚至灾难意识。张龙平(2004)认

① Beaver, W. H. and S. G. Ryan. Conditional and 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Concepts and modeling.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5, 10 (2-3) 269-309.

② 王泽霞(2004)认为,管理舞弊是管理层故意通过重大误导性的财务报表来伤害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舞弊行为。据此,管理舞弊的实施者是管理层(top and middle management levels),他们拥有足够高职位可驾驭日常内部会计控制或不受内部会计控制;受害者是投资人的债权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而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舞弊工具是财务报表,因此舞弊会计报表(fraudulent reports)是管理舞弊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定义为本文选取管理舞弊(风险)样本提供了指示。

为“对于查出的问题不报告,对于审计意见而言,这实际上相当于未查出,这种情况性质上属于审计师欺诈。”^①可见,会计稳健性应当成为影响审计意见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计稳健性与审计一样,都是一种约束管理者行为的机制,用以防止管理者不正当地利用其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近年来已有文章专门研究了会计稳健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例如刘峰和周福源(2006)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比较了“四大”和非“四大”的审计质量,研究表明,“四大”审计质量并不比非“四大”高,从会计稳健性角度而言甚至比非“四大”还低。考虑到管理舞弊风险带给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和审计师对管理舞弊风险的应有关注,把审计意见与会计稳健性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探讨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审计质量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近年来管理舞弊引发的会计质量和审计质量问题已经广为关注。然而,基于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还不多,关于中国会计改革后是否具有稳健性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Ball, Robin 和 Wu (2000) 应用中国 1992 ~ 1998 年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基于国内的企业会计制度还是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表,都缺乏会计稳健性,并且将这种会计稳健性的缺乏归咎于国内相关的制度背景。Lee 和 Cao (2002) 应用 1992 ~ 1999 年的数据,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盈余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是普遍存在的,该研究将这种不对称性同样归咎于中国缺乏会计稳健性。另外,也有研究结果提供了中国资本市场存在会计稳健性的证据。李增泉和卢文彬 (2003) 对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1995 ~ 2000 年间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与消息性质进行分析后发现,总体上中国上市公司具有会计稳健性。Jia (2004) 基于中国市场数据,研究了 1993 ~ 2001 年间中国会计稳健性的时序变化以及中国制度背景特征是否能够解释会计稳健性的变化规律,结果发现随着中国注册会计师诉讼风险的增加,会计稳健性有增强趋势。国有股少的上市公司和银行贷款多的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程度增强。上述研究结论和解释并不完全一致,也未对具有稳健性和不具有稳健性公司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研究。

为分析中国的会计稳健性在实证上的特征,陈旭东、黄登仕 (2006) 采用中国上市公司 1993 ~ 2003 年的数据,运用 Basu (1997) 模型,计算了上市公司分年度的会计稳健性以及行业特征,发现随着中国会计制度改革的深化、证券市场监管和处罚力度的强化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脱钩改制,会计稳健性在 1998 年

^① 张龙平 (2004), 试论我国国家审计的三个问题,《新经济时代的会计、财务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 1 版,第 420 页。

后逐渐增强,尤其是 2001 年以后上市公司的会计更具有稳健性,而且会计稳健性具有行业特征,在制造业尤其明显。Zucca 和 Campbell (199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提取减值准备的美国公司中制造业多于服务业,并将这一发现解释为制造业比服务业更具资本密集型的特点。Giner 和 Rees (2001) 研究德国、英国和法国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发现不同的产业分组,其会计稳健性有差异。Easton 和 Pae (2004) 发现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也存在行业差异,并发现各行业中制药业的会计稳健性最强。

既然国内外的实证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存在行业差异,受此启发,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获得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是否也存在稳健性差异呢?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 获得不同审计意见的管理舞弊(风险)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存在差异

二、研究样本

(一) 政府监管与管理舞弊样本的选择

政府监管为本研究选择管理舞弊样本提供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沪两地证券交易所在行使证券市场监管的过程中,近年来也为上市公司的诚信状况形成并发布了大量的诚信记录,并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发布了谴责公告。这些处罚公告和谴责公告成为国泰安“CSMAR 违规处理数据库”的信息来源,也学术理论界研究证券市场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经验来源。

本文以国泰安“CSMAR 违规处理数据库”中的违规公司作为研究管理舞弊的主要的样本信息来源,此外,还参考和验证了以下信息来源:(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网站(www.csrc.gov.cn)中有关涉案上市公司的处罚决定和通报批评;(2) 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www.szse.cn)在各自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上市公司诚信记录。该栏目记录了两家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失信行为进行谴责的记录,通过对谴责记录的阅读确定了发生管理舞弊行为的公司样本。

根据姜虹(2006)对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处罚公告、通报批评的统计分析,处罚决定在 1998 年以前较少,1997 年为 15 项、1996 年为 15 项、1995 年为 10 项、1994 年为 7 项,共计 47 项,而且绝大多数是对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决定,针对公司管理舞弊行为的处罚决定仅有 12 项,而从 1998 年开始,处罚决定增多,仅 1998 年的处罚决定就为 61 项,随后几年数量也有所增多。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是 1996 年公布并从 1997 年开始实施的,样本选取起点的选择,必须考虑到排除审计准则执行标准的不同所导致的审计意见差异。另外,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现金流量表也是从 1998 年开始的。从样本数量集中度和研究数据可获取性角度考虑,本文选取 1998 ~ 2004 年涉及违规的上市公

司作为样本,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再剔除处罚决定中对证券公司、期交所和个人的处罚决定,共获得存在管理舞弊样本案例 232 个。违规公司样本的行业与年度分布见表 1。

表 1 管理舞弊样本的行业与年度分布表

年度	房地产类	工业类	公用事业类	商业类	综合类
1998	2	13	3	3	5
1999	2	12	2	3	4
2000	7	27	6	3	7
2001	9	42	10	4	11
2002	1	25	6	2	4
2003	0	12	2	1	2
2004	0	2	0	1	0
小 计	20	133	29	17	33

(二) 盈余管理与管理舞弊风险样本的选择

1. 盈余管理与管理舞弊风险

实证会计理论提出的三大假设指出,企业的内部人会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盈余管理,扭曲真实的盈余。Kinney 和 McDaniel (1989), DeFond 和 Jambalvo (1991), Sloan 和 Sweeney (1996) 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舞弊性会计政策选择 (fraudulent accounting choices) 与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盈余管理具有相同的经济动机,管理舞弊的动机和影响与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的盈余管理具有同质性。徐浩萍 (2004) 指出,盈余管理并不都是有害的或违规的,但是大规模的盈余管理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给投资者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说,盈余管理中潜伏着管理舞弊风险。这一点也可以由会计信息的公共产品属性导致的会计信息供给不足上得到说明。会计信息的供给主要是由企业外部利害关系人——股东、债权人、政府、潜在的投资者等的需求决定的,它与私人产品不同,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性质。于是会计信息市场是一个非均衡的信息市场,主要表现在:外部的巨大需求与供给不充分的冲突;上市公司与利害关系人信息劣势的冲突。会计信息公共产品的特征必然导致外部性的存在,从而加剧了会计信息的供给不足,市场失效,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满足其自身的利益需要肆意地进行盈余管理。另一方面,不完备契约的存在加剧了盈余管理转向管理舞弊。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将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准确无误的写进契约,即存在不完备契约。由于存在着不完备契约,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当双方目标不一致时,如果契约是

完全的,未来完全按契约的预期进行,即使存在冲突,因为契约是明确的,管理者也无法通过盈余管理实现自己的目标。

可见,盈余管理终究是出于管理层的自利目的,这一点上与管理舞弊是完全相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盈余管理是对报表使用者的一种欺骗,只不过披着一层“合法”的外衣。所以,当管理舞弊的幅度过大,由量变到质变时,就很难说盈余管理没有构成一种利润操纵行为,不论其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以及会计准则的规定,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管理舞弊风险。

2. 盈余管理程度计量与管理舞弊风险样本的选择

会计盈余 (Earnings) 包括经营现金流量 (Cash From Operations, CFO) 和总体应计利润 (Total Accruals, TA) 两部分,从理论上讲,盈余管理可通过控制 CFO 和 TA 两条途径来实现。但由于 CFO 一般与企业营销政策、收款政策密切相关,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关系不大或无关,所以,CFO 的可控性不强。而在 TA 各组成项目中,有些是按照现行会计规范强制处理的结果,如固定资产折旧,有些则是利用现行会计政策留给企业可以选择的余地进行调整、操纵的,并且其增减变动又直接影响到会计盈余的多少,例如应收应付款项、存货等流动性较强的应计利润项目,通常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首选工具。因此,按照 TA 的可控程度又将其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 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 NDA) 两部分。DA 的大小就代表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高低的问题就转化为了计量 DA 的大小。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利用“操控性应计利润 (Discretionary Accruals, DA)”来衡量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

会计盈余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可以从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直接获得,因此,计量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关键就落在了对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的计量上。有关 NDA 的计量模型常用的有希利模型 (Healy Model)、迪安吉洛模型 (DeAngelo Model)、琼斯模型 (Jones Model)、修正的琼斯模型 (Modified Jones Model) 和行业模型 (Industry Model) 等。Dechow, Sloan 和 Sweeney (1995) 曾就上述 5 种模型对各种期望应计项 (expected accruals) 与非期望应计项 (unexpected accruals) 的区分效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结果表明,5 种模型都能成功地探测盈余管理,其中修正的琼斯模型的效果最佳,迪安吉洛模型效果最差。Haw 等 (1998) 对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账面利润的操纵,很大部分集中于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等“线下项目”,如果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持续降低,或者远远低于同行业水平,说明该公司存在管理舞弊的可能^①。鉴于前述研究,本文 DA_t/A_{t-1} 作为测度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刘淑璐

^① Haw In-Mu, D. Qi, W. Wu. Value-releva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Disclosures in an Emerging Capital Market: The Case of B-shares and H-shares in China, Working Pap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2006) 在修正的 Jones 模型基础上将线下项目纳入了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加入新变量后的 Modified Jones Model 如下:

$$TA_t / A_{t-1} = \beta_0 \times (1 / A_{t-1}) + \beta_1 \times (\Delta REV / A_{t-1}) + \beta_2 \times (PPE / A_{t-1}) + \beta_3 \times (IBL_t - IBL_{t-1}) / A_{t-1} \quad (1)$$

$$NDA_t / A_{t-1} = \beta_0 \times (1 / A_{t-1}) + \beta_1 \times (\Delta REV / A_{t-1}) + \beta_2 \times (PPE / A_{t-1}) + \beta_3 \times (IBL_t - IBL_{t-1}) / A_{t-1} \quad (2)$$

$$DA_t / A_{t-1} = TA_t / A_{t-1} - NDA_t / A_{t-1} \quad (3)$$

上述模型中各个变量含义如下:

TA_t 应计利润总额,为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差额;

A_{t-1} 上一年末总资产;

ΔREV 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与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差;

PPE 本年末固定资产总额;

NDA 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IBL_t 第 t 年的投资收益、补贴收入、营业外收支之和。

计算操控性应计利润时,先通过 (1) 式回归得出 β_0, β_1 和 β_2 的估计值,再将其代入 (2) 式计算得出 NDA_t / A_{t-1} 值,最后通过 (3) 式计算得出 DA_t / A_{t-1} ,再进一步得出 DA_t 。

DA_t / A_{t-1} 为操控性应计利润总额与期初资产总额的比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盈余管理程度,但这一比率不能说明管理层通过操控性应计利润对经营业绩(如营业利润)的操纵程度。为此,本文在盈余管理程度计量与管理舞弊风险样本的选择中,实际上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总额/营业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高低的指标。“营业利润”在国泰安“CSMAR 数据库”中的代码是 B130101,选择管理舞弊风险样本时,先计算各家上市公司的“ $DA_t / B130101$ ”比值,然后按如下标准具体选择过度盈余管理样本(即管理舞弊风险样本):(1) DA_t 为正值, $B130101$ 为负值且“ $DA_t / B130101$ ”比值越小则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2) DA_t 为正值, $B130101$ 为正值且“ $DA_t / B130101$ ”比值越大则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为降低管理舞弊风险样本选择的主观随意性,所选样本的分布与表 1 相一致,以房地产行业为例,选择 1998 年盈余管理程度最大的 2 家上市公司,1999 年 2 家,2000 年 7 家,2001 年 9 家 涂者依此类推。五大行业总共得到 232 家管理舞弊风险样本。232 家违规处理样本与 232 家管理舞弊风险样本合称“管理舞弊(风险)样本”。

三、研究模型

Ball, Kothari 和 Robin (2000) 与 Ball (2001) 都认为会计稳健性是财务报告最重要的特征,会计稳健性差异应当体现在审计前后的会计报表之中。回顾前

人研究成果,在 Watts (1993) 提议对稳健性进行研究和 Basu (1997) 提出稳健性的计量后,出现了大量会计稳健性方面的实证文章。虽然李增泉和卢文彬 (2003) 已经表明了 Basu (1997) 对会计稳健性的计量在中国的适用性,但 Ball, Robin 和 Wu (2000) 利用 Basu (1997) 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却没有发现存在会计稳健性的证据。在中国长期实行股权分置的情形下,使用股票回报的计量偏差会相对较大,因此本文借鉴 Ball 和 Shivakumar (2005) 的分段线性回归方法来计量稳健性水平。国内学者的研究尝试方面,刘峰和周福源 (2006) 以会计稳健性为视角研究了“四大”和非“四大”的审计质量的差异。

Ball 和 Shivakumar (2005) 使用的计量稳健性的分段线性回归模型 (piecewise-linear regression model) 如下:

$$\Delta NI_t = \beta_0 + \beta_1 \times D\Delta NI_{t-1} + \beta_2 \times \Delta NI_{t-1} + \beta_3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NI_{t-1} \quad (4)$$

其中 ΔNI_t 为第 t 年总资产收益率减去 $t-1$ 年总资产收益率,其中除数都采用期末总资产。 $D\Delta NI_{t-1}$ 为虚拟变量,如果总资产收益率下降 (即 $D\Delta NI_{t-1}$ 为负值) 则为 1,否则为 0。该回归等式的意义在于,在稳健性原则下,亏损比盈利更不具有持久性,更可能反转,即 β_3 应该显著为负。

胡奕明、杨华军 (2006) 为考察政府干预和国家所有权对“四大”的审计质量研究,在 Ball 和 Shivakumar (2005) 回归设定的基础上纳入政府干预 (Interv) 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设定如下回归等式 (5)。根据其研究假设,政府干预将降低“四大”审计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因此预期回归等式 (5) 中 β_7 的值显著为正,即意味着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则“四大”审计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越低。

$$\begin{aligned} \Delta NI_t = & \beta_0 + \beta_1 \times \Delta NI_{t-1} + \beta_2 \times D\Delta NI_{t-1} + \beta_3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 \\ & \beta_4 \times Interv + \beta_5 \times Interv \times D\Delta NI_{t-1} + \beta_6 \times Interv \times \Delta NI_{t-1} \\ & + \beta_7 \times Interv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end{aligned} \quad (5)$$

本文受胡奕明、杨华军 (2006) 的研究启发,在 Ball 和 Shivakumar (2005) 的回归设定基础上,纳入审计意见对会计稳健性的识别,设定回归式 (6),其中,OPINION 代表审计意见,当样本公司获非标意见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其余变量设定与 Ball 和 Shivakumar (2005) 的回归式 (4) 相同。根据本章的研究假设,对于存在管理舞弊 (风险) 的上市公司,获得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存在稳健性差异,因此预期回归式 (6) 中的 β_6 显著为正; β_6 显著为正即意味着获得非标意见的样本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比未获得非标意见的样本公司低。

$$\begin{aligned} \Delta NI_t = & \beta_0 + \beta_1 \times \Delta NI_{t-1} + \beta_2 \times D\Delta NI_{t-1} + \beta_3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 & + \beta_4 \times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 \beta_5 \times OPINION \times \Delta NI_{t-1} \\ & + \beta_6 \times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end{aligned} \quad (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对管理舞弊样本(违规公司)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管理舞弊样本代入回归式(6)中, ΔNI_t 、 ΔNI_{t-1} 和 $D\Delta NI_{t-1}$ 的计算需要用到最近三年(从样本选择起点 1998 年上推两年,即 1996 年)的数据,部分样本(计 21 家)缺少 1996 年的数据,最终纳入回归样本数量实际上为 211 家。SPSS12.0 软件得出的回归式(6)的回归结果详见表 2 和表 3。

表 2 ANOVA (b)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1	Regression	18.896	6	3.149	182.548	0.000 (a)
	Residual	3.519	204	0.017		
	Total	22.416	210			

a Predictors: (Constant), ΔNI_{t-1} , $D\Delta NI_{t-1}$,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OPINION \times \Delta NI_{t-1}$,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b Dependent Variable: ΔNI_t

表 3 Coefficients (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0.057	0.019		-3.053	0.003
	ΔNI_{t-1}	0.348	0.184	0.322	1.896	0.059
	$D\Delta NI_{t-1}$	-0.009	0.024	-0.013	-0.378	0.706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1.414	0.188	-1.219	-7.528	0.000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0.088	0.023	-0.124	-3.804	0.000
	$OPINION \times \Delta NI_{t-1}$	-0.411	0.206	-0.228	-1.991	0.048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0.393	0.218	0.193	1.799	0.073

a Dependent Variable: ΔNI_t

结论与分析:从表 3 可以看出,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的系数显著为正 ($B=0.393$, $Sig.=0.073$),这表明 相对于被出具标准意见的违规公司而言,被出具非标意见的违规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高。同时也说明了,注册会计师通过其出具的非标意见,揭示了违规公司在会计稳健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 对管理舞弊风险样本 (盈余管理过度公司) 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同前文对违规公司的实证结果及分析,将管理舞弊风险样本代入回归式 (6) 中, ΔNI_t , ΔNI_{t-1} 和 $D\Delta NI_{t-1}$ 的计算需要用到样本起点年最近三年 (即最早为 1996 年) 的数据,部分样本 (计 3 家) 缺少 1996 年的数据,最终纳入回归样本数量实际上为 229 家。SPSS12.0 软件得出的回归式 (6) 的回归结果详见表 4 和表 5。

表 4 ANOVA (b)

Model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1	Regression	0.882	6	0.147	22.148	0.000 (a)
	Residual	1.474	222	0.007		
	Total	2.356	228			

a Predictors: (Constant), ΔNI_{t-1} , $D\Delta NI_{t-1}$,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OPINION \times \Delta NI_{t-1}$,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b Dependent Variable: ΔNI_t

表 5 Coefficients (a)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 0.012	0.009		- 1.293	0.197
	ΔNI_{t-1}	- 0.355	0.114	- 0.281	- 3.118	0.002
	$D\Delta NI_{t-1}$	- 0.005	0.012	- 0.025	- 0.443	0.658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 0.118	0.153	- 0.070	- 0.774	0.440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 0.049	0.018	- 0.148	- 2.689	0.008
	$OPINION \times \Delta NI_{t-1}$	- 1.601	0.248	- 0.588	- 6.443	0.000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2.663	0.330	0.737	8.063	0.000

a Dependent Variable: ΔNI_t

结论与分析:从表 5 可以看出, $OPINION \times D\Delta NI_{t-1} \times \Delta NI_{t-1}$ 的系数显著为正 ($B = 2.663$, $Sig. = 0.000$),这说明:相对于被出具标准意见的过度盈余管理公司而言,被出具非标意见的过度盈余管理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高。同时也说明了,注册会计师通过其出具的非标意见,揭示了过度盈余管理公司在会计稳健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五、研究结论、局限性与后续研究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获非标意见的管理舞弊(风险)公司比未获非标意见的管理舞弊(风险)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从整体上而言审计师识别了会计报表的稳健性差异。作为外部审计人员,注册会计师无法控制管理层实施的舞弊行为和由此产生的风险,但作为会计报表的鉴证者,他应当认识到标志会计报表信息质量的会计稳健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审计师能够以出具非标意见的方式认识到客户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问题,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审计师能用出具非标意见的方式提示会计信息使用者关注客户会计稳健方面存在的隐患。本研究为考察管理舞弊(风险)和审计质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文章局限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研究样本数量偏低,本文总计选取了464个管理舞弊(风险)样本,扣除数据缺失的24个样本,最后纳入实证的共计440个样本,再加上所选样本限于违规公司和过度盈余管理公司,这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所以,如何选择更有代表性的管理舞弊(风险)样本是有待深入的研究的问题。另外,行业、年度和监管部门针对管理舞弊风险出台的具体政策等多种因素是否影响了审计意见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也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陈旭东、黄登仕. 会计盈余水平与会计稳健性——基于分量回归的探索分析[J]. 管理科学, 2006, (8) 52~61.
- [2] 陈旭东、黄登仕. 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时序演进与行业特征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 2006, (4) 59~65.
- [3] 胡奕明、杨华军. 国家所有权、政府干预和四大审计质量[Z]. 首届(2006)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 2006.
- [4] 刘峰、周福源. 国际四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初步证据[Z].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工作论文, 2006.
- [5] 刘淑璐. 基于管理层自身利益驱动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D]. 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6] 李增泉、卢文彬. 会计盈余的稳健性: 发现与启示[J]. 会计研究, 2003, (2) 19~27.
- [7] 张龙平. 试论我国国家审计的三个问题: 新经济时代的会计、财务问题研究[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 [8] 王泽霞. 论风险导向审计发展创新——管理舞弊导向审计[J]. 会计研究, 2004, (12).
- [9] 徐浩萍. 会计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J]. 会计研究, 2004, (1) 44.
- [10] Basu S.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1997, 24 (1) 3~37.

- [11] Ball R, L Shivakumar. Earnings quality in UK private firms :comparative loss recognition timeless [J] .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05, 39,83 ~ 128.
- [12] Beaver, W. H. and S. G. Ryan. Conditional and unconditional conservatism :Concepts and modeling [J] .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5,10 (2-3) 269 ~ 309.
- [13] Dechow, P. , R. Sloan, and A. Sweeny.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J] .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5,70,193 ~ 225.
- [14] Haw In-Mu, D. Qi, W. Wu. Value-relevance of Financial Reporting Disclosures in an Emerging Capital Market :The Case of B-shares and H-shares in China [Z] , Working Pap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8.
- [15] Holthausen,R. W. and R. L. Watts. The relevance of the value-relevance literature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ing [J] .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2001,31 (1-3) 3 ~ 75.
- [16] Jia, Y. Essays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Z] . Ph. D.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04.
- [17] Jones, 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 [J] .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1, (29) 193 ~ 228.
- [18] Zucca, L. J. and D. R. Campbell. 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downs of impaired assets [J] . Accounting Horizons,1992, 6 (3) 30 ~ 41.

Audit Opinions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Empirical Study on Management Fraud (Risk) Samples

LIU XueHua & YANG ShuXian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s an important convention of financial reporting. It implies that prudence should be held in the recog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revenue and assets. Usually, management's advantages in information asymmetry are restricted by CP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opinion and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the paper adopts piecewise-linear regression approach to reexamine Ball and Shivakumar (2005) Model. 232 samples of management fraud are selected from the declarations of CSRC. And then, Modified Jones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and select 232 companies of excess earnings management as management fraud risk samples. We find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of management fraud (risk) sampl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non-clean opinions group and clean opinions group. The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of companies got non-clean opinions i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at of those got clean opinions.

Key words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udit opinions piecewise-linear regression

试论价值链会计师能力框架的构建

刘秀丽^①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摘 要 价值链会计是一种新的价值管理理论,它对会计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借鉴了传统会计师能力框架的研究成果,结合价值链会计的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了由知识结构和职业胜任能力组成的、有机的、系统的价值链会计师能力框架。

关键词 价值链 会计师 能力框架 构建

价值链管理是进行价值管理的一种有效的理论与方法,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广泛的关注。实行价值链管理的关键就是进行价值分析,而会计是进行价值分析的最有效的工具。因为,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其本质内容可以抽象为“价值管理”^[1],通过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可以分析整个价值链上的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以及价值分配整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各种信息以及各项价值活动背后的经济关系。价值链会计是价值链管理理论与会计理论结合的产物,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理论,不仅为价值链管理服务,成为价值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会计理论,从而也对会计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价值链会计师应具有传统会计师所不具备的各种新的能力,而传统会计师所具备的能力将被赋予新的含义。与传统会计师能力要求相比,价值链会计师的能力将要求深度上的延伸和广度上的拓展。本文通过对价值链会计职能的分析,研究价值链会计管理中会计师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构建价值链会计师的能力框架,以期为会计师的能力培养提供依据。

一、价值链会计师能力框架构建的思路

本文所构建的能力框架是参考了现有的有关会计人员能力框架文章中的结论,并结合价值链会计的理论分析得出的。

(一) 传统会计师能力框架的借鉴

从现有的有关会计人员能力框架的文献来看,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在新的

^① 刘秀丽 女,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时期会计师的能力要求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终生学习的能力。会计的变化越来越快,对会计人员在适应性、灵活性、知识更新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不断学习,吸收新知识,才能适应和跟上知识时代的发展步伐^[2]。第二,善于协调的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会计人员人际交往的范围将突破时间、空间、年龄和社会地位的界限,极大地扩张。会计人员必须善于交友,善于协调,妥善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以优化会计工作的内外环境。第三,善于沟通的能力。会计人员必须时常维持沟通的渠道,倾听顾客的声音,无论是服务前对问题的了解,还是服务进行中的互助,沟通技能的作用绝不亚于专业知识能力的作用。第四,创新能力。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复杂化,会计工作会遇到许多新问题。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应具备开拓性思维,掌握新知识,在会计实践中不断创新,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及获利能力。第五,组织管理能力。包括组织和实施内部控制的能力、财务管理能力、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等。

以上能力中的前四项能力属于会计师所应具备的基本能力,这些能力要求是为更好地实现会计师的职能,发挥其组织管理能力服务的。这些能力的含义是基于对会计师的职能分析而作出的,这里的会计师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会计师。因此,这些能力也应该成为价值链会计师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但价值链会计师的这些能力要求的含义应该基于价值链会计师的职能来进行分析,从而为其赋予新的含义。而会计师的组织管理能力是与会计师的工作内容直接相关的,由于价值链会计师与传统会计师相比,将发挥新的职能,具有新的工作内容,因此,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有新的组织管理能力,这也是价值链会计师的核心能力。

(二) 价值链会计理论对会计师的能力影响

价值链会计是对企业价值信息及其背后深层次关系的研究。具体可表述为:是收集、加工、存储、提供并利用价值信息,实施对企业价值链的控制和管理,保证企业的价值链能够合规、高效、有序运转,从而为企业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增值和分配的一种管理活动^[1]。价值链会计的目标是提供价值创造的动态信息,借以制定协调和优化价值链、实现价值增值的决策,并进行相应的管理控制。价值链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对价值链上的各种信息进行实时地反映和评价^[3]。价值链会计的内容不仅包括价值信息管理还包括增值活动管理。

从上述价值链会计的基本理论可以看出,第一,价值链会计属于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它必须有系统论、信息论等基本理论的支撑,又要有会计理论的运用,还要有价值链等管理理论的引入。这就要求会计师必须具有跨学科的、复杂的、多元化的知识结构。第二,价值链会计要对价值链进行控制和管理,保证其有效运转,也就是说价值链会计要对企业乃至超出企业界限的整个价值链条进行价值管理。因此,与传统会计师的能力相比,对于价值链会计师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将有更高的要求。第三,价值链会计师将站

在更高的战略高度来对价值链进行管理,这将要求其具有更高的综合能力,对会计而言就是信息整合的能力。第四,价值链理论提升了企业的战略高度,要求价值链上整体与部分的协调性,各环节的目标都将是追求价值链价值最大化基础上的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作为价值链管理者的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备战略的思维,具有一定的战略管理能力。第五,价值链会计是一种价值管理活动,对于价值链会计师而言,更为重要的能力是价值运作的能力。第六,实行战略管理和价值运作靠的是制度的保障,价值链会计师还必须具备制度设计的能力。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价值链会计师的能力框架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知识结构,二是职业胜任能力。其中,知识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核心知识层次,主要指会计理论与方法。第二,理论支持层次,包括管理理论与方法,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第三,基础学科层次,主要包括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等。职业胜任能力包括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核心能力,主要有战略管理能力、价值运作能力、制度设计能力。另一部分是基础能力,主要有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交际能力和信息整合能力。整个能力框架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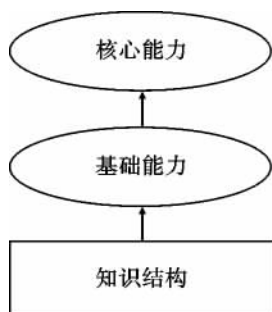


图1 能力框架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知识结构是会计师能力发挥的前提和基础,它与各项能力的关系是相互的,知识结构的不断完善能够不断地提高会计师的各项能力,而随着能力的提高也会使知识结构进一步的完善。能力框架中包括基础能力和核心能力,基础能力的培养为核心能力的实现提供了养分。

(三) 价值链会计师能力框架与传统会计师能力框架的不同

价值链会计师能力框架是在借鉴传统会计师能力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价值链会计理论对会计师能力的影响确定出来的,因此,价值链会计师的能力框架与传统会计师能力框架既有其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其相同点体现在价值链会计师同传统会计师一样需要具有学习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其不同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价值链会计理论为会计师基础能力赋予了新的含义

从价值链会计的职能上来看,价值链会计师要以实现价值链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对价值链上的各项价值活动及整个价值增值过程进行控制和管理,管理的范围甚至突破了企业界限。这就对价值链会计师的基础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价值链会计是不能只对有会计的知识进行学习和应用,还要求价值链会计师能够了解企业及整个价值链的业务流程,分析行业特点,甚至了解产品的生产等技术问题,所以,他们必须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不断地进行多种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价值链会计要在整个价值链范围内实现协调和沟通的职能,因此,其沟通协调能力将区别于传统会计师的单一环节的沟通形式,而是要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沟通与协调。另外,要想实现对价值链的有效价值管理,应该整合各方面的信息为管理服务,因此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有较强的信息整合能力。

2. 价值链会计理论对价值链会计师应具有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价值链会计属于跨学科的综合理论,会计师的职能也不再以简单的反映为主,还要实现管理活动的其他各项职能。价值链会计师除了像传统会计师那样掌握会计专业知识及相关的经济管理理论,还必须具备多层次、多元化、全面的、综合的知识结构。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在重点扎实地学习经济管理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会计专业知识,另外,还要广泛地学习哲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基础知识,进一步加深对其他知识的理解。

3. 价值链会计理论形成了价值链会计师新的核心能力

传统会计的职能和工作内容决定了会计师应该具有组织和实施内部控制的能力、财务管理能力、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等组织管理能力。价值链会计的职能和工作内容与传统会计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要动态地反映价值链运作过程的各种信息,还要对这些信息进行评价和分析;不仅要记录各项活动发生的结果,还要识别价值活动,设计和构建价值链,对价值链进行价值分析,实现价值链的不断优化。这就形成了由战略管理能力、价值运作能力、制度设计能力组成的价值链会计师的核心能力。

二、价值链会计师应具有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能力发挥的前提和基础,完善的合理的知识结构是价值链会计师所必需的。由于价值链会计本身属于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就决定了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备多层次的、多元化的、全面的、综合的知识结构。会计理论与方法是任何会计师都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它处于知识结构的核心理层次。管理理论与方法以及经济理论与方法是会计学的支撑理论,处于知识结构的理论支撑层次。哲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基础知识为上两个层次奠定基础,这一基础奠定的好坏将会影响其他层次知识的积累及发挥。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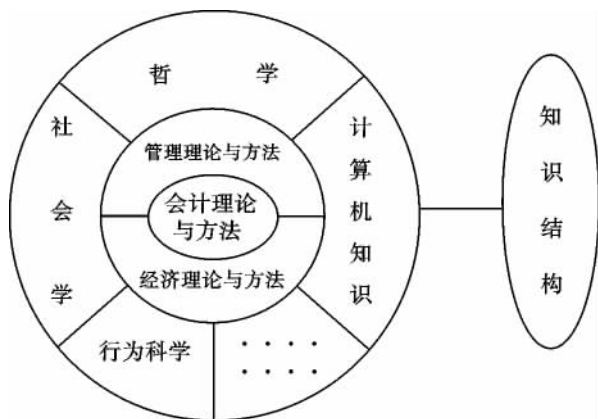


图2 知识结构的关系

（一）核心知识层次：会计理论与方法

与传统的财务会计不同，价值链会计的工作没有什么具体的准则和制度，可以直接照做。而且价值链会计师们所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他们必须将会计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同价值链管理的思想结合起来，灵活地运用到企业的实际管理中去。因此，价值链会计更强调对会计理论的掌握，价值链会计师必须掌握会计的灵魂，并让其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具体地讲，掌握簿记的原则以及会计处理的方法，将成为对价值链会计师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他们必须扎实地掌握成本管理、业绩评价、薪酬管理、预算管理以及财务管理的原理，尤其是将它们与价值链相结合，予以实施。

（二）理论支撑层次

这一层次的知识都是会计学的基础理论，会计学中的许多理论与方法都来源于这些理论。价值链会计的支撑理论有管理理论与方法以及经济学理论与方法。

1. 管理理论与方法

价值链会计的产生是基于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而且更加强调其管理的职能，而非信息提供的职能。价值链会计本身就是价值链管理的一个部分，并且具有管理的各项职能。要想实现这些职能，会计师必须通晓各种管理理论与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实际的价值链管理中去，更为有效的实现目标。因为，管理理论是会计学的基础理论，会计学上的很多原理都来源于管理理论。而在经济环境瞬息万变，企业管理更加战略化、信息化的今天，价值链会计师要实时的对价值链进行控制，并对价值链优化的方案作出评价，并作出各种判断，只有真正的掌握了管理学的原理，才能把握经济规律，实现其目标。尤其是一些与价值链相关的管理理论与方法，要做到不断地学习和研究，例如，供应链管理、业务流

程再造等。

2. 经济学理论

价值链会计师不仅要提供价值链上的成本及价值增值信息,而且还要对整个价值增值过程进行事前的预测、事中的控制和事后的考核。最重要的就是预测,预测的失误将会导致整个企业战略的失误,从而导致经营的失败。而预测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把握经济规律,把握市场的规律,因此,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就为会计师摸清规律提供了依据。没有经济学的扎实功底,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就会迷失,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 基础知识层次

这一层次与前两个层次相比更为基础,但却是非常必要的,这些知识的缺乏,将导致整个知识结构的不全面,导致在其他理论学习中出现障碍,影响其他理论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基础知识包括哲学、社会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知识等。

哲学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它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价值链的思想是寻找价值链上各环节上的联系,寻找价值链上的种种规律,价值链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规律的把握。因此,哲学为价值链管理过程中把握规律提供了理论指导。例如,哲学中普遍联系的理论是更好的识别价值链上各种联系的关键。价值链上价值的界定也必须有哲学的思想指导。

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学科,它将揭示社会发展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并研究当前社会各阶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链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价值链价值最大化前提下各价值环节价值增值的最大化,整个价值链联盟就是社会的缩影,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关系是价值链管理以及价值链会计的首要任务。不了解社会学就无法真正地摸清各环节的需求,就无法正确地处理各环节间的关系。

行为科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揭示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行为间的互相影响。任何一种管理都是对人的管理,具体而言就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而价值也是由人的行为创造出来的,没有人的行为就不可能有价值的产生。价值链管理要想行之有效,必须研究价值链上的各种行为也就是各项价值活动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价值链会计师作为价值链管理者之一,不了解行为科学是不可能对价值链进行有效的管理的。

价值链会计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实时反映和评价,而且价值链会计对象也扩展到了整个价值链,要想做到实时地对整个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的各种信息加以反映和评价,必须依赖于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撑。作为价值链会计师不能仅仅是学会使用几个会计软件,而是要学习网络技术,掌握信息系统的原理,只有这样,当出现异常情况时,才能妥当的予以处理,否则,就会延误时机甚至导致更

大的损失。

除了以上所述的哲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基础知识外,价值链会计师知识结构还必须具有其他的广泛的基础知识的支撑,例如逻辑学、心理学等等。

三、价值链会计师的职业胜任能力

价值链会计师的职业胜任能力是建立在上述知识结构之上的,要与上述知识结构相适应,并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知识结构的完善。作为价值链会计师,应该具备一般会计师所具备的学习、交际及创新等基本能力,但这些能力应被赋予新的含义。价值链会计作为一种价值信息管理活动,信息整合能力应该成为价值链会计师的又一基础能力。建立在这些基础能力之上的是价值链会计师的核心能力,与价值链会计的工作内容相适应,这些核心能力至少应该包括战略管理能力、价值运作能力、制度设计能力。因此,价值链会计师的职业胜任能力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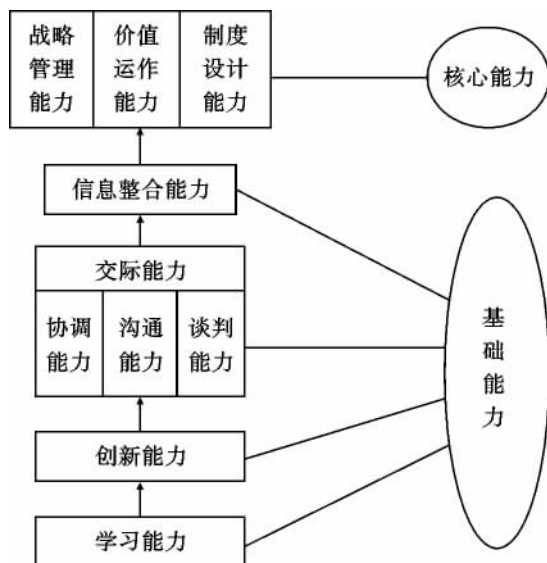


图3 价值链会计师的职业胜任能力

(一) 基础能力

这部分能力是为实现价值链会计师核心能力服务的。主要包括:学习能力是其他一切能力的前提和灵魂;创新能力能够使其他的能力的发挥更为有效;交际能力是中间层次的能力,是会计师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是更为有效的完成会计师工作,实现价值链会计目标的能力;信息整合能力处于基础能力的最上层,是会计师知识结构的体现,是其他各项能力的综合体现。

1. 学习能力

价值链会计不仅是理论层面的而且是操作层面的,会计师面临的是企业的实际,要将理论的东西真正地运用到实践中。价值链会计没有像财务会计那样的具体的准则与方法,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准则和方法。正如前面所说,价值链会计师要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与方法,并使之与价值链会计相结合。价值链会计是对整个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会计师首要的任务就是识别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分析各项活动间的联系,并且通过价值分析提供价值链优化的方案。价值链会计师还必须了解整个流程上的各项工作,甚至了解有关的工艺。因此,价值链会计师就必须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不断地在干中学,学中干。

2. 创新能力

价值链会计管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而每个企业在不同的时期所面临的环境都不尽相同,价值链会计要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进行价值分析,提供价值链构建及优化的方案。而且,价值链会计内容中的预算管理、成本管理、业绩评价等都要有一定的制度作支撑,这就要求价值链会计师能够作出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所以,价值链会计师必须拥有创新性的思维,发展地运用价值链会计的理论及各种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整个价值链会计管理画龙点睛。可见,创新能力对于会计师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3. 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是指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一般来说,包括协调能力、沟通能力、谈判能力和信息整合的能力。

(1) 协调能力。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各项价值活动之间的联系。价值链会计就是对价值链上的价值信息及价值活动背后深层次的联系进行研究,识别各项活动之间的联系,使各项活动能够协调一致,使整个价值链能够得到优化,从而实现目标。换句话说,价值链会计的管理过程就是使各项价值活动协调一致的过程。所以,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使各项活动的目标与企业的战略目标协调一致,调节各环节间的利益冲突。

(2) 沟通能力。价值链会计的对象是整个价值链上的各项价值活动。那么,价值链会计的信息使用者将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包括内外部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政府机构,还包括每一项价值活动的执行者。每一个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都互不相同,他们的个人能力也参差不齐。要想使价值链会计所提供的信息能够真正地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依据,就必须对各种数据加以解释。可见,价值链会计师的沟通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较强的沟通能力才能保障信息通道的畅通无阻。

(3) 谈判能力。价值链会计已经突破了企业的界限,价值链上的各个组织形成了新的契约关系。契约的签订过程是价值链会计师必然要参与的过程,因为价值链会计师要为契约签订提供有关价值方面的信息以及经过价值分析后

的各种方案。因此,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备一定的谈判能力,为核心企业争取更多的主动性。

4. 信息整合的能力

价值链会计所提供的信息,大到支持整个战略的价值信息、价值链构建及优化过程的价值信息,小到每一个价值活动的成本信息,每一个信息都要有其依据,并且拥有一定的勾稽关系。而且,价值链会计在实现其预测、控制、评价等职能的时候,必须考虑企业内外部的各种因素,如企业外部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和企业内部的制度及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等因素,否则,将无法实现科学合理的预测、控制和评价。另外,价值链会计的对象已经突破了企业的界限,管理更具战略性,在管理过程中还要考虑各价值链联盟及其之间的种种联系。因此,作为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备较强的信息整合能力,运用各种理论与方法整合分析各种信息,最终形成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为管理者所用。

(二) 核心能力

价值链会计师的核心能力是由它的职能和主要内容所决定的,是建立在基础能力之上的,基础能力的培养有利于更好地提高价值链会计师的核心能力,实现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及各项职能。通过前述对价值链会计的职能及主要内容的分析,价值链会计师的核心能力至少由战略管理能力、价值运作能力和制度设计能力组成。

1. 战略管理能力

战略是对企业未来时期的经营所作出的长期的规划,它强调的是时间上的长度以及空间上的广度。价值链管理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一种提升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管理。价值链会计作为价值链管理的组成部分也应该被看成一种战略管理。陈亚民教授在第二届“价值链管理与价值链会计”研讨会上就曾指出:价值链会计是战略管理时代的必然产物,对于企业内部战略管理来讲,价值链会计是通过“参与”战略管理的全过程而实现的。价值链会计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其所有工作都必须围绕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服务。比如,构建价值链时对战略伙伴的选择,要求价值链会计师进行价值分析,分析的基础必须是长期的战略目标,而不能仅看当前企业的利益。价值链会计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进行价值链优化方案的评价,作为价值链会计师如果只盯着眼前的利益,缺乏战略的思想,将会导致整个决策的失误。因此,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有战略思维,站在战略的高度来完成各项工作。战略管理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如何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战略,价值链会计就是要把企业的战略有效地贯彻到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使之高效、有序、协调地实现战略目标。战略管理能力是价值链会计师的核心能力之一,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有战略的思想而且具有较高的协调控制能力,来保证价值链的有效运转,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2. 价值运作能力

价值链会计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价值管理,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在价值链价值最大化基础上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战略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核算企业各种价值活动的成本与价值;分析各种价值活动、价值链环节之间的联系,以制定价值链优化的方案;评价各种价值链优化方案;制定价值链预算方案,实施价值链预算管理;进行价值链绩效评价;实施价值链成本控制;完成价值链财务管理等。换句话说,价值链会计就是对企业的各项活动从价值的角度予以管理,价值链会计要运用会计的思维以及会计的手段和工具参与企业乃至整个价值链的价值运作的全过程。价值链会计管理活动就是一种价值运作活动,价值链会计师必须具备价值运作能力。

从价值链会计的内容可以看出,价值链会计师应具备对价值的识别能力,对价值的计量和比较能力以及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等价值运作能力。价值识别能力要求价值链会计师能够敏锐地识别出具有价值产出潜力的价值活动及价值活动组合。对价值的计量和比较要求计量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比较具有针对性,从而为各种方案提供依据。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是价值运作能力的最高要求,价值链会计师要通过提供经过整合的价值信息以及对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从价值的角度进行管理和控制来实现价值的增值。这种价值不仅包括以财务指标体现出来的价值增值,还包括以非财务指标体现的价值增值。

3. 制度设计能力

制度是实现有效管理的方式之一,任何管理都需要制度的保障。因此,制度设计能力是管理者所必备的能力之一。价值链会计也不例外,价值链会计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制度的保障才能有效实施。价值链会计贯穿了整个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因此,价值链会计师的制度设计能力也不同于传统会计师。传统会计师的制度设计能力主要指的是与财务和会计有关的各种制度的设计。价值链会计管理是关于价值链的全方位的管理,涉及到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还涉及到整个价值链的优化与改造,流程管理也是价值链管理的核心内容。所以,价值链会计师所具有的制度设计能力不能仅限于对财务与会计工作相关的各种制度的设计,还要参与企业各种制度的设计,例如价值链信息共享制度、价值链预算管理制度、价值链成本控制制度、价值链业绩评价制度以及价值链联盟企业间的协调制度等等的设计。

参考文献

- [1] 阎达五. 价值链会计研究:回顾与展望[J]. 会计研究,2004(2): 3~7.
- [2] 郑德、张立东. 谈知识经济对会计人员能力的要求[J]. 济南大学学报,2002(12): 58~69.
- [3] 慕好东、杨志强. 价值链会计的目标确定和职能定位[J]. 会计研究,2004(2): 71~74.
- [4] 尹美群、胡国柳. 解读价值链管理与价值链会计的关系[J]. 海南大学学报,2004(12): 392~396.

- [5] 陈检生. 论会计人员能力框架 [J]. 邵阳学院学报, 2005 (6) 35 ~ 37.
- [6] 王明虎. 价值链会计的内容和方法初探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2005 (3) 38 ~ 39.
- [7] 贺茂清、冯浩. 总会计师知识框架及能力要求研究 [J]. 财会通讯, 2005 (8) 33 ~ 35.
- [8] 李永红. 会计人员职业能力结构研究 [J]. 经济与管理, 2005 (9) 90 ~ 92.
- [9] 尹美群、何广涛、张妍. 从价值链管理到价值链会计 理论框架与实务问题 [J]. 会计研究, 2004 (12) 84 ~ 86.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 Chain Accountants ' Capability

LIU XiuLi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Value chain accounting is a new theory of value management. It comes up with more requirements for the accountants' capability. This paper referred to the study achievement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accountants' capability, and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chain accounting, then constructed a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value chain accountants' capability which consists of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Key words Value chain accountant capability framework construction

《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投稿指南

《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杂志以推动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发展为办刊宗旨,侧重发表关于中国会计发展前沿问题及中国会计教育改革重大问题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和具有重要推广价值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投稿要求如下:

1. 论文研究领域应符合本刊的定位,对符合国际规范的实证研究和符合国情的规范性研究兼容并蓄,特别欢迎文献综述性文章、书评和典型案例分析。

2. 来稿需用单独一页(作者信息页)提供下列信息:篇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电子信箱等,以便匿名审稿。

3. 来稿请按如下顺序书写(作者信息页除外):

(1) 篇名:不超过20字,小2号加粗宋体。(2) 作者姓名:5号楷体。(3) 作者单位:单位全称,5号楷体。(4) 摘要:摘要两个字为小5号加粗黑体;摘要不超过300字,小5号楷体。

(5) 关键词:关键词三个字为小5号加粗黑体;关键词不超过3-8个,小5号楷体。(6) 正文:5号宋体,二级标题为小4号加粗楷体并居中。(7)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四个字为小4号加粗楷体居中,中文文献为小5号宋体,英文文献用小5号Times New Roman体。(8) 英文篇名:小4号加粗Times New Roman体。(9) 作者姓名的英文或拼音:小4号Times New Roman体。(10) 英文作者单位:5号Times New Roman斜体。(11) 英文摘要:小5号Times New Roman体,摘要标题加粗。(12) 英文关键词:小5号Times New Roman体,关键词标题加粗。

4. 获得科研基金资助的文章请在标题处用脚注的形式,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号内注明项目编号。脚注用小5号宋体。

5. 注释使用需规范。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脚注在全文范围内顺序编号,序号用①②等格式、小5号宋体在页面底端标示。

6. 图表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图1、图2,表1、表2。图和表应有简短确切的题名,图序图题应置于图下,表序表题应置于表上。图表应居中,内部的文字用小5号宋体,图序图题和表序表题用小5号加粗黑体并居中。

7. 凡引文出处一律列入“参考文献”。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以“[1]、[2]、[3]”形式列于正文末,并在文中引用处用方括号“[]”标注。同一条文献的重复引用只使用同一序号。所引著作中的页码一律写在文中引文序号后面,用小圆括号标示,如“[3](P562)”等。参考文献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M为专著,C为论文集,N为报纸文章,J为期刊文章,D为学位论文,R为研究报告,S为标准,P为专利;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先中文后外文。其格式为:

(1)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起止页码。

(2) 期刊文章:[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J]. 刊名,年,(卷或期) 起止页码。

(3) 论文集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A]. 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 原文献题名[C].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4) 报纸文章:[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5)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6) 电子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 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7) 各种未定类型的文献:[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Z].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8. 来稿字数以10000字左右为宜,稿件要严格遵守规定的格式要求,投稿请采用电子邮件形式,投稿专用邮箱为:careouc@yahoo.com.cn。

中国海洋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简介

中国海洋大学于 1988 年开始设置工商管理学科,经过近 20 年的积淀和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学科专业和培养规格齐全、学科层次和发展水平较高、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较为突出的强势学科。目前,该学科设有会计学博士点,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会计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旅游管理四个硕士点及工商管理硕士(MBA)和会计硕士(MPAcc)两个专业学位点,还设有工商管理、会计学、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电子商务和财务管理六个本科专业。企业管理是山东省重点学科,会计学专业是山东省首批品牌专业。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企业管理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会计研究与教育》编辑部也都设置在该学科内。在教育部组织的 2006 年工商管理一级学科评估中,中国海洋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名列第 26 位(前 25 位均为已具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

目前,中国海洋大学工商管理学科拥有教师 87 人,其中,教授 21 人(含博士生导师 8 人),副教授 2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2 人,同时,还有 21 位教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教师中有 2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2 位教师担任国家级学会理事以上职务,8 位教师受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的通讯评审专家,9 位教师担任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和特约审稿人。

近三年,该学科共招收培养全日制研究生(含 MBA 专业学位、高校教师及中职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567 人。研究生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12 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 117 篇,获得校、省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2 篇,在“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金奖 1 项、银奖 2 项、铜奖 3 项。所培养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深受社会好评,在政府机关、高等学校、金融机构、大型中介机构和企业等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海洋大学工商管理学科注重研究方向的凝练和整合,经过长期研究和积累,逐渐形成了企业战略管理、企业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管理、公司财务管理、营销管理、利益相关者会计与企业价值管理、人本会计与行为价值管理、品牌经营与管理、区域旅游开发与管理等具有较强特色的研究方向,并通过人才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着力加强研究团队的建设,使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梯队结构合理、战斗力强。近三年,共获得国家和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资助 42 项,获得山东省教育厅、青岛市人民政府及横向课题资助 50 多项,累计科研经费达到 876 万元。近三年,共发表学术论文 696 篇,其中,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68 篇,出版学术专著 16 部,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 21 项,获得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和国家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30 多项。